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概论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概论

序

邓小平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创建人民军队，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人民军队的具体实践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并依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判断，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和我军建设的新情况，精辟地论述了我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地提出了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产生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队建设的学说，奠定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列宁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如何创建自己军队的问题；毛泽东建军思想，系统地解决了把一支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和高度军事素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方针和原则问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人民军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纲领、实际工作的指南。毫无疑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全面加强我军建设，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探索和系统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充分认识它的科学价值，是我们全党、全军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概论》，是海军指挥学院组织几位同志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结合部队建设的实际，用两年多时间撰写而成的，是目前海军部队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理论专著。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思想；关于以革命化为前提、现代化为中心、正规化为重点，全面建设军队的思想；关于适应国力，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思想；关于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努力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关于搞好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的思想；关于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实现军队正规化、科学化管理的思想；关于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思想等等。尤其是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的新变化，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我军政治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等重要思想。从上述这些方面出发，本书着重探索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联系，进

而说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特征、内容及指导作用，体现了完整的科学性；分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发展的历史由来，力求通过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的研究，挖掘其实践渊源，概括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这是研究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繁荣我国军事理论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因此，本书的出版不论对探讨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还是对人们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军事理论都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本书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概括。

思想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目前我军正面临着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相对和平环境的考验，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尤为重要。我们务必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持之以恒地深入下去，切实地把新时期军队建设坚定地置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指导之下，为圆满履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神圣职责而努力奋斗。

魏金山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于北京

第一章 绪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其革命的胆略和气魄，冲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从而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三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轨道。我军建设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切都与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指导紧密相连。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历史的经验，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1975年以来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著作、讲话和指示，从他亲自领导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

1975年1月至12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这时期，其思想内容可以说是以“全面整顿”为特色的。通过全面整顿，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行径作坚决的斗争，试图把军队建设重新引到正确轨道。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初步产生，其特点是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完整准确地揭示毛泽东建军思想，进行军队建设思想的拨乱反正，同时着手研究新问题，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规律、方针和原则。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提出为标志，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这期间，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途径道路。

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以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在改革开放和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实践中，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特色人民军队建设道路的思想，1989年6月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就是集中的体现。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对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体回答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问题，是我军新时期建设的理论指南。

第一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又把毛泽东建军思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邓小平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经过 20 多年的革命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赢得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打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天下。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相结合，造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产生和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同志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对这一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 在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最早投身于创建红军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同时，党中央作出了“应当努力地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的决定。遵照党的指示，邓小平同志于 1927 年初参加了西安中山军政学校的工作，作为该校政治处处长、政治教官和校内中共党组织的书记，进行了党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和改造雇佣军队的实践。

1929 年夏天，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先后前往广西，领导了当地党的工作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2 月 11 日，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朱德创建红四军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红七军的建设，提出“红七军各级党部都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的四点要求，党中央给予了“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的肯定。

1930 年 2 月，邓小平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发动了龙州起义，创立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左右江根据地连成一片，邓小平同志又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任前委总书记。

1933 年初，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路线迫害的邓小平同志，任我军《红星》报的编辑，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之中，仍以拟大的努力，使《红星》报成为“一面大镜子”，反映红军的工作、生活；成为一架“大无线电台”，传播红军、地方及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消息；成为一个“政治指导员”，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指战员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红星》报的广为发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935 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战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由产生到形成完整科学体系发展过程的起点。在这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军一个战略区、一支野战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 年，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从客观现实出发，与聂荣臻、左权同志一起，提出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的重要见解，科学地分析了红军部队的思想状况，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教育和阶级教育相结合、特别是加强军队党员干部的布尔什维克思想锻炼和注重军队党支部领导作用等重大措施，对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新政

策在红军部队的贯彻落实，对全军部队实现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创造了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军队、统一部队思想的新经验。

1943年，在解放区和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身为太行分局党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军队中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2月20日，他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谅解”的原则，回答和解决了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在不断发展壮大中遇到的新问题。

3.在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关于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上，是邓小平同志首先于1945年11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委对军事、政治工作一元化领导。在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之后，于1946年10月主持制定了第一部《党的团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并在12月25日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部队中党委的组织与领导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在中央草拟的军队中党组织条例尚未发布之前，可根据晋冀鲁豫的经验文件，实行改组”。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即发出了《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从此，全军团以上各级党委会普遍恢复、建立，并日益健全起来。在加强军队基层建设上，邓小平同志在1946年组织推广了该军区六纵队战士王克勤“团结友爱、互助互学”的先进典型，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上克勤运动”，对于增进团结、巩固部队，完成作战、训练、群众工作等项任务，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连队建设的“三把金钥匙”之一。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部队建设上，邓小平同志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为全国反攻的序幕和反攻全局中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政治委员邓小平格外注意把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同大别山的情况相结合。他针对我军立足未稳、不熟悉南方环境和习惯、远离后方作战、群众还没发动起来等特点，提出了初创时期、巩固时期，巩固区、游击区、半新区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提出了“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提出了“拜当地群众为师，在军民共同劳作中建立情谊，在自己劳作中减轻中央和民众负担”的方针，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加快了大别山根据地建设。在关于军队的纪律建设上，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到了战略全局的高度，有许多重要的见解。他认为，“大别山能不能站住脚，一方面靠多打胜仗，另一方面靠团结人民，两者缺一不可”，而纪律是实现这两条的基本保证，“决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成是一个枝节问题，是一个简单的规定，它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是能否夺取战争胜利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第二野战军部队的实践整理而成的《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的报告》，成为毛泽东同志1947年10月修改、酌定并重新颁布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依据。在关于军队战时政治上，邓小平同志创造了大兵团作战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成中原、华东总前委”的指示，决定邓小平同志为前委书记。在整个淮海战役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我军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具体化、程序化，其要点是：（1）及时传播中央、军

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命令、作战决心和要求，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鼓舞全军的斗志；（2）根据战役发展的不同情况，总前委、野战军首长或政治机关遂机发布政治动员令、政治工作指示和动员教育大纲；（3）及时提出简短、鲜明、有力、易记的行动口号；（4）针对部队带倾向性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由野战军发出具体解决的指示和措施；（5）办好战地报纸，搞好通讯社建设；（6）广泛开展火线报功、评功、记功和庆功活动。

尽管上述只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一部分，但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辩证统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包括建军理论在内的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中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与发展的重大时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挑起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任。

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59页，以下简称《邓选》）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选》第262~263页）正是从这里出发，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以及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始终不渝地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正是从这里出发，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在军队建设上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和权益的思想，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关于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积极发展武器装备的思想，关于强调严格纪律、从严治军的思想，关于发扬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思想，等等，都坚定不移地给以贯彻执行。

但是，邓小平同志坚持的不是两个“凡是”，而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列宁说：“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邓小平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过程中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选》第36页）的科学命题。十多年来，邓小平同志按照这一理论，使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这一和平时期军队建设

的正确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变成现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军队建设“要在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88、89 页），并在实践中把它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建设目标和任务，但由于后来对国际军事斗争趋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左”的估量，致使这一愿望没有落实。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志，认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选》第 58 页）认为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较低的矛盾，因此，新时期军队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

——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早在 1949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军队就是一个学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96 页）。按照这一思想，我军造就出了成千上万会治军打仗、从政治国和进行建设的优秀人才；按照这一思想，我军官兵经过政治思想、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培养教育之后，成为开展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继承了这一思想的实质，坚持了“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来自生产、回到生产，在人民之中，而不在人民之上”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并赋予其崭新的内容，创造性地提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干部战士长远发展着想的原则，拓宽了办好大学校的途径，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军队是大学校”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可是，自从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批判 1964 年的群众性大练兵活动以后，军队的训练濒于废弛。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在组织军队整顿时，郑重地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选》第 21 页）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实行精兵的原则。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接受了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意见，并且明确指出，“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38 页），要求军队的体制编制要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运用这一思想，不仅从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考虑，而且从国家建设总体布局和军队长远发展考虑，组织和实施了百万大裁军，保证了军队从应急转到长远、从单项转到全面、从注重数量转到注重质量的建设轨道上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44 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对待毛泽东建军思想，正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囿于历史的原因和所处的客观社会条件，毛泽东同志不可能全部预见和解决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军队建设遇到的所有问题；由于林彪、江青反党

集团的干扰、破坏，建国以来，军队建设呈现出曲折发展的过程。对此，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给予了历史的、客观的说明；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建军实践所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并没有因为毛泽东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而不超越雷他一步。相反，他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基础，将之运用于军队建设领域。他认为，“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邓选》第113页）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提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军队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既要抵御外来侵略，又要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军队职能；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把武器装备的发展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的思想；提出了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体制、编制改革原则；提出了军队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了包括军队教育训练在内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提出了以法治军的思想，恢复、充实和健全了条例条令和各项规章制度；等等，形成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的理论体系。

十分清楚，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辩证统一起来的科学结晶。

三、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邓选》第159页）这个观点也完全适用于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评价。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体智慧和全军官兵进行军队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建军思想与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的结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完成的，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理所当然地是由集体奋斗、集体创造出来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直接实践，以及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宝贵意见，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其在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得以逐渐充实和发展。

同时，也必须看到，在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出贡献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同志是最卓越、最杰出的代表，他本人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核心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群众公认的。首先，邓小平同志在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具有最深厚的阅历和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一个重要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是一支野战军的政治委员，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他开辟太行，挺进中原，决胜淮海，突破长江，解放西南，军功卓著。他屡遭错误路线迫害，但始终对革命真理执

着追求，无所畏惧。全国解放以后，1952年7月调到党中央工作，历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1954年9月28日，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29日受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1月以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直到1989年11月退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对邓小平同志的考察结论是：“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人才难得，政治上强”（《人物》1987年第2期第177~178页）。其次，邓小平同志在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16岁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后来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自觉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斗争、建军活动相结合，并大胆地加以创新和运用。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如果不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洞察秋毫，可能连其基本的性质也确定不下来。这一史例充分说明，邓

小平同志的确具有超群出众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底。第三，邓小平同志在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具有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非凡的理论勇气。他以无所畏惧的政治胆略从理论和实践上同极“左”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以惊人的理论勇气率先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束缚，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度的理论修养，在勇于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从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敢于从实际出发，或者是修改某些过时的结论，或者是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论断和创见。之所以能够形成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与这一点有着直接的联系。1975年，“四人帮”十分嚣张猖獗之时，邓小平同志就逆流而上，果断地提出“军队要整顿”，他公开申明，“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邓选》第32页）。他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邓选》第19页）没有这种冒着被再次“打倒”风险的革命勇气，没有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不顾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去进行拨乱反正、实行转变，进而找到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建设道路的。正如邓小平同志自己所言，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光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作出了亿万军民所期望的选择，所以才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当之无愧的核心，成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当然代表。

第二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的渊源

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都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得到实现，除了理论能够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之外，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使其同群众性的社会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流程中走上历史舞台的。

一、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切科学理论总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并不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关的另外一种军事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他们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战争观，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战争观，创立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学说，提出了以人民武装代替资产阶级常备军、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军事组织、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常备军，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军事组织的原则，形成了一整套苏联红军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建立了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体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正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的经验，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而形成的。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军队的根本任务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邓选》第157页）。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1. 把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马列主义军队建设学说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同志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军队建设，科学地概括为履行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国内敌对分子颠覆破坏的双重职能。

早在1871年9月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时候，马克思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他认为，军队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国家的驯服工具，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保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为“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页）。“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高度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邓选》第155页）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改变，军队职能的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军队实行双重职能的思想正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这一立足点的具体体现。

2. 暴力以经济力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主要内容之一；邓小平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出了平时时期军队建设要在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的重要方针。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历来认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

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他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页）。战争依赖于经济，不仅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经济条件，而且军队的编制、编成、装备都取决于经济条件，军队作战方式的变革，也都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极为深刻他说明了我们的实际情况。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和军事态势之后，依据这些科学的论断，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军队要忍耐”，“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的思想，成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3. 武装斗争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综合较量，其中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胜负和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明确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军人，全面提高整个部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恩格斯认为，“要攻击比较强大的敌人，就需要突然和勇猛，因此部队应当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97页），“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3页）。列宁把人的因素具体为“军队的士气、人民的精神状况和国家的精神潜力”，他的结论是：“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列宁军事文选》第650页）。毛泽东同志对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作了一个鲜明的比较，认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邓小平立足于现代战争和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在强调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官兵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把“四有”作为军队人才培养的规格。

4.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根本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针对新的条件、新的情况，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思想。

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三湾改编”中就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根本制度，1929年的“古田决议”对此又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制定了一系列保证实施的规章制度。

1938年11月，根据党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我军创建以来，正是因为有党的绝对领导，才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才始终如一地成为党和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有力工具。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这一历史的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根本原则。他极为深刻地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

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

（《邓选》第 230~231 页）他在客观地分析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之后，针对一些人否定、怀疑的态度，十分坚定地说：“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邓选》第 156 页）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在实际上加强党的领导的辩证思想。

5.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把它看成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最主要的环节。

在我军初创之时，“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就已经成为全党全军的一个重要思想。

1937 年，毛泽东在延安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军队政治工作时指出：“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在制定我军建国以后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时，毛泽东又亲笔写上了“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的历史结论。几十年来，军队政治工作在保证我军性质，提高我军战斗力，为军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后来发生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否定和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邓选》第 301 页），并且认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邓选》第 324 页），对于党绝对领导的军队来说，政治工作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是建设忠于党的军队的根本保证。从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去认识和加强政治工作，既体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又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特殊要求。

6. 注重军队的教育训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把它运用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提出教育训练要放到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列宁十分强调军队的训练，他认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49 页）。毛泽东则认为军队的教育训练与军队政治工作同等重要，他说：“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军队只有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打仗。但是，由于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时提出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在较长时间里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勇气进行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选》第 21 页）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又依据新的条件、新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思想、观点，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概括、深化和发挥，呈现出崭新的内容和时代特色，因而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更加巨大。

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主要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所反对的，主要是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

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并不意味着我军建设过去没有特色，而是说这种特色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特别是为使国家或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而维持的军队，它的建设和使用，都取决于对时代和国际态势的分析与判断。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当今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客观依据。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出发阵地”的话，那么，和平与发展这一理论的提出则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出发时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

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在几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第一，对当代世界的主题作出了新概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了科学的剖析，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斯大林根据列宁的理论，把这个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把世界矛盾概括为四大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主要矛盾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却出现了令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激烈，但随着世界两大阵营和两大武装集团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了；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大经济循环的出现，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素日益强化，使得过去以直接军事对抗为主更多地转向经济上又争夺义和谈；另外，殖民地国家政治上的逐步独立，使帝国主义原来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入侵逐渐变为更多地用资金和先进的经济、技术、管理去占领。对这些新的、复杂的变化，邓小平同志横观全球，纵观历史，把它极为简练地概括为东西和南北关系，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他多次指出：“世界上关系到全局的两大问题是和平和

发展问题。形象地说，就是东西、南北问题。”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列宁关于时代基本特征的理论，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的确定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对世界大战是否可以推迟和避免作出了新判断。列宁依照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出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到了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依据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科学分析世界格局的变化，认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可是，进入六十年代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苏关系破裂，帝国主义的反华叫嚣，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对世界战争危险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以至达到迫在眉睫的程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据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态势，邓小平同志对世界战争趋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有资格打世界战争的是美苏两家，但是由于在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美苏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没有完成，谁对谁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谁也不敢先动手；而且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并呈现不断增长和强大的趋势。因此，邓小平同志按照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方法，得出“大仗五年打不起来”的判断，1980年又讲“还可以说大仗10年打不起来”，198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世界战争是可以推迟的”，“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大胆的判断、深远的预见，成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依据。

第三，对现代战争的根源提出了新见解。马克思主义曾经深刻地揭示了一般战争的根源，认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和本性的深刻分析，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毛泽东同志也一直认为，“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1页）。然而，历史进入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上的战争出现了新现象，由于国家利益和民族矛盾的冲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也可能发生战争。面对这种现实，邓小平同志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揭示了现代战争的根源，提出了战争同霸权主义相联系，霸权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而且也可能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世界霸权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必然，而且地区霸权主义的存在也有战争爆发的危险。因此，他得出了“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见《人民日报》1984年5月18日）的结论。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尽管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并不是天下太平，“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这就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第四，对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作出了新说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指西方资本主义——引者注）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正在戒备着呢！”（《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2页）毛泽东同志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

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预言，明确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一次次失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出现，加上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上升到重要地位，以至出现了一些国家的剧变、逆转和我国 1989 年的反革命暴乱。对此，邓小平同志十分尖锐地指出，这是国内外大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映，并明确告诫我们，对于中国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无论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是说，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乱图变”，而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在稳定中求发展。

国际矛盾发展的新变化，需要作出新的判断，而新的判断必然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决策，这就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丰富的实践经验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同我军进入新时期的前进步伐紧密相连，既在实践中产生，又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给新的实践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自 1975 年党中央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再次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之后，他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投入了党政军民的社会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阐发理论。

1975 年 1 月 5 日，党中央发出 1 号文件，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的军队，不仅是因为林彪“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邓选》第 1 页），而且有“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在调查中发现，军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肿、散、骄、奢、情”（《邓选》第 15 页）。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气魄，针对一系列复杂问题和严重困难，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明确指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邓选》第 3 页）这就指出了当时军队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奏响了深入全面整顿的号角。正因为这一思想反映了军队建设的实践需要，因而，以此为主题的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一经传达贯彻，就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拥护。

1978 年 4 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从军队建设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客观地回顾了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批评了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潮，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正确观点，成为指导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哲学思想依据。

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的提出，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相对的和平时期，军委就提出利用安定的训练环境，“来达到把我军训练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的”（《朱德选集》第 303 页）。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对

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特别是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后，错误地推行“突出政治”的方针，把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视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将全军100多所军事院校砍掉67%，使整个军队建设受到了严重损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导方针，就是为了医治林彪、“四人帮”对部队造成的严重创伤、提高我军战斗力而提出来的，是军队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拨乱反正。

把“四有”作为新时期军队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的。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发扬五种革命精神，1981年2月，总政治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我军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口号。3月27日，邓小平对总政治部领导同志说：“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7月4日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再次明确肯定：“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把“四有”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目标提出来，继承了革命导师在这方面的正确思想，总结了战争年代和平时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适应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

关于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同样是实践的产物和结晶。1981年6月，驻山东省文登县某师根据驻地的实际情况和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内容，与当地群众进行了共建文明村的活动，当年9月，参加华北演习的部队把“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与地方的“五讲四美”活动相结合，实行军民共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以高度评价，并在1983年建军节前夕题词指出：“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培养“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邓选》第76页）的观点。各部队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进行了探索、创新，涌现了一大批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先进典型。实践表明，培养两用人才“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建军方向，符合官兵愿望”，“利国、利军、利民、利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思想。

实践出真知。无数事实说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丰富，一点一滴都离不开军队建设的历史发展，都离不开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生动实践。因此，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的产物，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

第三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我军建设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军队处于相对和平环境已经30多年的条件下，把当今的时代和我国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

一、在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提出由随时准备应付大战转到平时时期建设的轨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需要的是军队的使用价值。因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军队的建设更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邓小平同志认为，军队建设一方面要置于世界范围内来考虑，不能无视纷坛多变的世界政治形势、战争形势和现代军事科技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置于本国的现实条件下来考虑，不能无视自己的国情和军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密切关注着军队建设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态势，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在 1985 年 6 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断。他认为，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根本估计，要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根据这个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在政策上也必须有一个转变；与此相适应，在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应来一个转变。这种转变，“是讲军队建设从过去那种随时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搞好军队的一些根本建设，努力把部队整编好，把武器装备搞精良，把干部培训好，把一些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把军队的一些关系理顺。”（见《解放军报》1985 年 12 月 28 日）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在军队建设的目标上，完整地报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是什么？邓小平同志认为，军队的建设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战略、科学技术水平等密切相关。军队建设的目标、道路，尤其要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以及武装力量在未来战争中担负的作战任务和战场条件的制约。

1981 年 9 月 19 日，他在华北某地检阅演习部队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选》第 350 页）1987 年 7 月，在我军新时期建设成就展览即将开展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再次指示我们，“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解放军报》1987 年 7 月 25 日）。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革命化，就是说“这支军队必须是党领导下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能够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军队。”邓小平同志说的现代化，是指“用优良武器装备武装起来，掌握先进军事科学理论和军事技术，具有现代条件下自卫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队。”邓小平同志讲的正规化，是指“必须是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的诸军兵种密切协同动作的正规化军队。”这“三化”，从不同的侧面完整地表述了我军的建设目标和任务，所以，他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作用的。其中，以现代化为中心，抓住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在军队建设的道路上，阐明了各项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把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落到实处，需要有一条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从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个根本标准出发，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

对于军队工作的重点，提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上来。他认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从教育训练着手”，“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把教育训练作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放到战略位置，既是和平时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唯一途径，也是适应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既是提高官兵素质的基本途径，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军队的客观要求，正确地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

对于军备的发展，提出在现有国力下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弄得好一些，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邓选》第75页）这是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提出“科研要先行”的方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反对买一些必需的先进技术，但什么都靠进口，尤其是军队的装备靠进口是靠不住的”；并要求军队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

对于军队的体制、编制，提出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原则。从1975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极为重视军队的体制改革，提出并亲自领导了军队的“消肿”工作，实行精兵政策，搞合成军，提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对于军官队伍的建设，提出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军官队伍的建设，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所以，这一点对于军队极为重要。”（《邓选》第70页）“选干部，配班子，第一要讲政治标准，看是不是赞成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党性强不强”。同时，又从时代的特点出发，要求“军队干部一定要努力做到知识化、专业化。领导干部自己要有知识，而且要尊重知识”。他把办好军事院校、发挥院校集体干部部的作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邓选》第253页），和平时期，就是要通过院校“训练干部仍选拔干部，推荐干部”（转引自杨尚昆在第12次全军院校会议上的讲话）。

对于以法治军，提出了解决“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选》第293页）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毫不例外。“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才能有正常的秩序，铁的纪律也才有保障，”，“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改善。……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邓选》第319页）

对于后勤建设，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

相适应，提出了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依靠军民整体力量等基本原则，以求提高我军的快速保障能力、综合保障能力、持续保障能力和各种复杂、困难条件下的应变能力。

对于军队政治工作，邓小平同志发展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的理论、方针和原则。首先，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最早提出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问题。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恶果，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邓选》第114页）在一些人企图以纠“左”之名否定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的逆流面前，邓小平同志坚定不移地肯定了毛泽东政治工作理论、方针和原则，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邓选》第116页）。这一思想成为开创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新局面的重要开端。其次，是邓小平同志再一次端正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是党的领导和军队各项工作的保证；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王明“左”倾路线长期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然而，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严重破坏，篡改了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把政治工作抬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领导一切”的不适当地位，不仅搞乱了军队的正常建设，也破坏了政治工作自身。邓小平同志说：“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选》第123页）他认为政治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选》第140页）1986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真正优势，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就体现在服务、保证之中。会议通过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了“两个服务”、“四个保证”的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见《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年1月27日）。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政治工作脱离实际、自我服务和“假大空”的不良局面。第三，是邓小平同志规定了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四有”人才。他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随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这一体系完整、表述严谨、高度概括、言简意赅的论断，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人的教育的总体规划，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军队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从而成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第四，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新时期政治工作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许多讲话、著作中，十分强调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是：政治工作要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工作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政治工作要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政治工作要保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落实；政治工作本

身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政治工作要激发部队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政治工作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培养干部；政治工作要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十分强调赋予这些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以新的内容、新的方式。一是很注意针对新的实际，“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7页），“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邓选》第115页）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新时期政治工作中的深化；二是很注意政治工作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相结合，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选》第136页）这一重要观点的提出，对于政治工作从天上回到地上，从空中回到官兵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三是很注意“两手抓”，强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强调说两句话，坚持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思想斗争；四是很注意政治工作的实际效益，多次严肃地强调“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5页）。他严格要求从事政治理论教育的同志，“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争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邓选》第183页）；五是很注意政治工作干部的素质，指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邓选》第1页）。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对新时期政治工作保持我军本质、发挥政治优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新的实践中正在继续丰富和发展，对它的深入研究和发掘，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

第二章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是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及我军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涉及到军队建设乃至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指导我军建设真正走上了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这是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上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提出及其精神实质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虽然是在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战略性转变的思想准备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自1975年以来，邓小平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提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她诞生之日起，就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遵循正确的建军方针、路线、原则，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南征北战，先后胜利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即面临着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这时，持续几十年的武装斗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基本结束，暴力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军队由长期大规模的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的环境。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主要历史使命已经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转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军队面临新的任务是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我军建设的途径，也从主要由战争学习战争，变为主要经过日常的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面对上述这些变化，我军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和方针上都应该进行相应的转变。

根据这样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的任务提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要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要求我军“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毛泽东：《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军事工作也随即转入和平建设时期，140余万军队官兵复员转业到社会主义建设岗位；国防力量建设开始从基础抓起，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迅速完成了由单一步兵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化；兴建各类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专业人才；基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战略后方的布局。短短几年，军队建设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出现了喜人的进步局

面。

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失误，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出现了偏差，我们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认为迫在眉睫。这种估计对我们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正常和顺利进行，发生了重要影响。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加紧扩军备战，极力争夺世界霸权，粗暴干涉以至用武力镇压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搞得世界很不安宁。

从我国周边环境形势看，美国在 1950 年 6 月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我国安全。我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在此期间，美国政府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长期在台湾海峡游弋，不断派飞机军舰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对我国东南沿海造成严重威胁，我军不得不在东南沿海加强战备，并于 1962 年在东南沿海进行紧急备战。1961 年，美国政府又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镇压越南南方游击队，1964 年 8 月，约翰逊政府公然派军舰侵入北部湾，轰炸越南北方。次年三月美国军队又直接在越南登陆，发动侵越战争。它还在我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缔结军事条约，组织军事同盟，包围和遏制我国，对我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和颠覆活动。直至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签定前，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中苏关系也紧张起来。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多次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这些都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我们不得不对战争作必要的准备。

从我军建设状况看，1957 年后，由于在军队中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右倾”运动，打击了一批致力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军队领导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错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整个军队以“突出政治”取代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建国后军队取得的伟大成就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个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步骤被打乱了。加之我们认识上的片面性，过重地估计了战争危险，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很快要打起来，因而把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置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山、散、洞’的方针，经济建设的布局搞一、二、三线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后来，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指导思想却没有及时加以改变，军队建设也就长时间没有走上根本建设的正常轨道，丧失了一段宝贵时间，延缓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实际上没有大的战争风险情况下，这种状况是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从发展的观点看，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也有一个准备过程。

1975 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基于战争可能推迟的判断和我军建设状况，他提出要解决军队“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任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原因。邓小平同志被免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工作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

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拨乱反正，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对于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作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人民军队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透彻地阐明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根本任务，是一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纲领性文献，它在推进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仔细观察、分析国际形势，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如果工作做得好，大战可以避免，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很迫近的看法。正是根据这一科学判断，1985年5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和解决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

在这次我军建设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的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意义和根据。会上杨尚昆同志指出：“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根本估计，要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根据这个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在政策上也必须有一个转变；与此相适应，在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应来一个转变。”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在我军历史上揭开了崭新的光辉一页，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我军建设的战略性转变。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我军建设开始了战略性转变。从组织上、工作上解决了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等问题。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我军历史上又一次带根本性的转变。它结束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长期存在的被动应付局面，理顺了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军队建设与战备工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使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对于加快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为确定正确的军队建设方向和原则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过去，由于我们的指导思想处于临战状态，军队建设考虑应急多，考虑未来少，抓根本不够，致使军队建设积累了不少问题。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其指引下，可以按照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等原则，把我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内容和实质

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具体含义，杨尚昆同志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在1985年12月28日接见《解放军报》全体干部时的讲话中，都作过阐述。在1986年1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作了说明。

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什么样的转变呢？这就是，要求我军的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说来，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努力把部队整编好，把武器装备搞精良，把干部培训好，把一些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把军队的一些关系理顺，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作战能力。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不是指建立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的指导思想，而是对战争环境、战争样式以及如何在和平时期进行军队建设的新认识，是从临战应急建设到有计划的长远建设的转变，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一是从临战状态下的应急性建设转向相对稳定形势下的从根本上谋求军队发展的建设。以往我们主要是强调尽快尽多地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现在，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世界战争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会发生，因此，国防建设重点是从加强现实力量转向国防潜力的积蓄，以保持国防建设持续发展的后劲。

二是从侧重军队建设转向全面抓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是国防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国防建设的全部。国防建设包括对军队这一进行战争的直接力量的建设，也包括对进行战争的间接力量的建设；既要求重视国防实力的建设，也要求重视国防潜力的建设。这样，才能在不是以军力而是以综合国力定胜负的现代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从单目标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转向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整体建设。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要求我们既考虑到国防力量的战时运用，也考虑到其平时运用；既考虑如何实现国防现代化，也考虑如何促进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既考虑到应付一种战争的威胁，也考虑到应付多种战争威胁；既考虑对付核战争，又考虑到对付常规战争，既能对付全面战争，又能对付局部战争。一句话，军队建设要立足于国防建设的总目标，要服从国家四化建设的大局，增强整体效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要求把军队建设纳入国防建设、国家建设的大系统中，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赢得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不是消极被动的措施，而是积极主动的决策。目的既是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也是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一转变，固然有其国际、国内和我军自身的客观需要，但更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主动迎接未来挑战所作出的积极抉择。其基本精神不是认为国防现代化可以停一停，慢一慢，放一放，而是要想方设法，通过主动地进行“转变”，去加速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把握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精神实质，需要对这样几个问题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第一，对当前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战争与和平问

题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看到当前一个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又不忘和平时期依然存在着战争危险。

我军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主要是指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打不起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长远规划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但是，绝不意味着战争的危险已经完全排除和消逝。邓小平同志在指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同时，也一再告诫我们，战争的危险性还存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仍然是战争的根源。他说：“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邓选》第74页）事实正是这样。八十年代，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从未停止，全球性的战略争夺日益加剧。从陆地、海洋、空中发展到外层空间。世界上一些地区性的武装冲突一直连绵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达170多起，当今仍在进行的20余起，波及50多个国家。我国周边地区也不太平。因此，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应该辩证地理解，既要看到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现实，又不能放松对战争危险的警惕；既不能弯弓待发，时刻准备打仗，又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但不是我们过去那种想法，似乎大仗明天早上就要打起来，军队总是处于临战状态，弦绷得很紧，松不下来。而是要针对新的情况、新的挑战，以新的思想和路子去持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防潜力。”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邓选》第350页）。

第二，必须对和平时期军队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确立无军不安的思想。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反动派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没有武装，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红色政权就不能存在下去。全党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是革命得以发展和胜利的根本所在。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军队的地位当然格外重要，军队的作用也特别突出。

夺取全国政权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同战争时期相比，军队的作用虽然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从重要到不重要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军队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

首先，军队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柱石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古今中外，军队都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期，军队的这个根本地位是不会变的。只不过是在战争年代，我军通过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来体现这一地位和作用；而在平时期，则以反侵略、反颠覆、反破坏、反内乱、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来体现这一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对军队寄予了更高期望，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不仅仍然是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而且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说，这仍是我军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职能的发扬光大。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但需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且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离不开国防力量的加强。只有建设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的强大军队，才能使侵略者望而却步，才能可靠地保卫我们神圣的国土，一旦出现什么突发事件，才能

从容对付。军队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尊严、荣誉、安全和利益，因此，在和平时期，我们仍然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其次，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变。提出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处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下一层次。国防现代化同其它“三化”一样，都处在国家战略下的同一层次。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国防现代化不能等到其它“三化”实现后再进行而必须与其它“三化”同时进行，互相配合，共同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正因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具有如此稳定不变的重要地位，所以国家建设的总目标是同时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不是放弃国防现代化。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决不是要削弱军队建设，恰恰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来逐步加强军队建设，这说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绝不是“军队不重要了”，“国防建设地位下降了”，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新形势，采取新的路子去全面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搞军队建设则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所以，国家对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是统筹兼顾，互相协调，促进，而不是重此轻彼。

总之，实行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是一个积极的决策，而不是消极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我军的建设，把我军建设成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精神实质，从而自觉地适应这一转变。

第二节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依据

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依据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判断，适应我国工作着重点转移需要，和军风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所作出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主要依据是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变化”（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判断，是我们一切重大决策的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以这种估计为依据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也是以这种估计为依据的。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紧迫的，总认为战争因素在不断增长，战争危险日渐迫近。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更一度把准备打仗抬到高于一切的地位，提出“要用准备打仗的观念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认识一切，对待一切”，要求人们以所谓“临战的姿态”去从事各项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争霸的战略态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美苏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开始谋求通过对话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正在逐步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

题。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透过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表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大仗五年打不起来。

1980 年又讲，大仗五年打不起来。

1984 年他又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

1985 年五、六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在论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时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讲世界战争只有两家有资格，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他们两家东西都多，特别是原子弹，常规武器也是一样，都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也就是说，双方实际上是军事上的平衡。准时准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都不敢动。这是邓小平同志认为战争可能避免的一个依据。

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无论在中东、在非洲、在东南亚，美苏双方都没有实现它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它的战略部署。战略布局没有完成，他们就不敢动。这是邓小平同志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又一个依据。

还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战争的危险性虽然未完全消除，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中国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第三世界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二。和平力量还包括日本、东欧、西欧。欧洲人怕打仗，不管是东欧还是西欧，你真正要打，下决心要打，他们是不干的，是得不到同情和支持的。对于东欧、西欧来说，是战争还是和平，涉及到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他们不会自觉自愿地站在战争方面。世界上真正支持战争的人没有多少，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也都是不支持战争的。

通观全局，战争的危险虽然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增长很快，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最重要的估计。

根据以上分析，战争危险不象原来认为那样迫在眉睫，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避免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后来，邓小平同志又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内不打仗，更希望七十年内不打仗。那我们就可以有时间从从容容地搞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如果真是二十年、三十年不打仗，五十年之间不打仗，这个战争就有可能避免”（《邓小平纵论国内外形势》1985 年 9 月 18 日《解放军报》）。他还同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指出：“从当前总的形势看，战争可以制止，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同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的谈话》1986 年 2 月），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的谈话》1986 年 4 月）。

以上说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随后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推迟的”；后来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防止的”，“工作做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个判断无论是对我们的国家还是对我们的军队都非常重要。我们因此就能够安心地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并确定我军建设的正确原则和方向。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我们调整了外交方针，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最重要的改变。

过去，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搞了一个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现在，我们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改变为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也要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份量的。这个足够的份量，表现在正确的政策上，表现在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上。”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侵略战争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的一方，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树立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这个形象十分重要，而要担起这个角色，就要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个改变，关系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制止战争的战略性的改变。“这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最有力量，最有份量，最有利于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1月1日）。因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中国经济虽然不很发达，但是块头大，人多。所以我们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止战争力量的发展。

根据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的联系。并且在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有着坚定的立场。不管对中东问题也好，非洲问题也好，拉丁美洲问题也好，更不用说亚洲问题，都表示了我们坚定的立场。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就有利于我们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来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一个是根据这个分析所作出的判断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这是两个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判断和这样的政策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将军队建设从过去那种随时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这就说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提出，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当代世界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决策。

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军队建设领域的具体贯彻和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中心，它要求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相应的调整，要求军队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下行动，支持国家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正是适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一要求。

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多次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党的“八大”也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但是，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未能完成。直到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才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在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又明确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三大任务，并且指出，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要横下心来，始终如一地办好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同国家经济建设相比，国家经济建设是全局。当前，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头等大事，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就要求各行各业都适应这个大局，服从这个大局。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就是军队建设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服从经济建设大局需要的一个重大决策。党中央把经济建设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中心位置上，军队自然应当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不能违背这个大局，不能拖这个大局的后腿。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在大局下面行动，为大局出力。他说：“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那么一个大局。我们所谓照顾大局，第一个大局就是这个，一切都让路！”

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是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要求。现在，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这就理所当然地要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一直担负着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这三大任务。支持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全国党政军民都要一心一意地将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军队也有自己的责任，“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和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要求我军建设从片面强调“时刻准备打仗”转变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上来，把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要求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一个转变。

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也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规模、质量、速度等都要受国家经济实力的制约。只有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裕的资金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国富才能兵强。为了加强

国防，就得首先加强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说：“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就可以使我们的面貌有个比较显著的改变”。又说：“要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1日）因此，在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军费不可能有很大增加的情况下，要真正想把我军的现代化尽快搞上去，就必须转变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树立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观念，主动让路，自觉忍耐，而且要准备忍耐一段时间，主要顾一头，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就有了物质基础。

总之，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坚持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是富国强兵之道的最优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军队建设领域的具体贯彻和体现。

三、我军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是新时期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代化不是加人，而是减人，这是一个标志。那种认为军队兵员越多，武器装备数量越多，战斗力就越强的想法，是一种陈旧的、落后的观念。

但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们谈起我军战斗力和军队建设，往往只强调兵多将广，以我军有几百万将士和众多的后备兵源而自豪，似乎人多就一定打胜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的同志一讲提高部队战斗力，就主张增加人员，扩大机构；一提减人消肿，就担心部队战斗力削弱，军队地位下降，应当承认，一定数量的兵员是军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国家的军队数量是由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经济承受力来决定的。养兵多少，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防卫需要，超过这种需要与可能，拿过多的财力养兵，于国于军都有害无益。现代战争说到底是国家经济实力竞赛。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兵员的素质和武器装备的精良。兵精武器好，军队才可能打胜仗。

一般说来，在和平环境下军队兵员应用应减少，这是推进军队自身建设，提高军队素质的需要。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为了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曾将正规军由15万人扩展至500余万人；1924年列宁认为国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出现了相对均势，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国内又需要进行经济建设，便毅然将530万军队减至56万。建国以后，我军也曾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进行过几次大的精简。但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因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部队处于临战状态。为了准备打仗，我们多年来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

长期以来，不仅上百个师齐装满员，而且搞了许多准备用于人民战争的一般化常规武器。在整个国防建设中实行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实行“全民皆兵”。相当数量的部队进入“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到1975年，军队员额达到了建国以来最高峰，等于当时美苏两国军队的总和。部队的体制、编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国民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国家实际上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既保持一支齐装满员的庞大常备军，又有余力来发展武器装备，提高这支大军的素质。结果只能抓了眼前战备，丢了长远建设。在没有世界大战风险情况下，这种作法是不能再延续下去的。鉴于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军队“消肿”的问题，指出：“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邓选》第1页）的确，人员机构过于臃肿，不仅影响了武器装备的研制和改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包袱，打起仗来不仅缺乏还手之力，甚至难有招架之功，连疏散也难。更何况现代战争突发性强，要求军队反应速度快、效率高。一个国家军队能否取胜，从军队本身来说，往往不在兵员多少，关键看这支军队在整体素质上能否胜敌一筹。

我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是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从总体上说，我军的革命化程度是世界第一流的，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所根本不可能有的，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优势。但是，现代化程度不高，则是我军的薄弱环节。由于长期以来我军随时准备应付全面战争，在自身现代化建设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杨尚昆同志指出：“规模过大、装备落后、机构臃肿、体制不顺、制度不健全等一类问题，同现代战争的要求很不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来一个转变，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不然，和平时期再长，给的钱再多，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搞不好；一旦打起仗来，就难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就是根据军队建设现代化的要求，用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办法，减少兵员数量，提高兵员质量，把部队搞精干，节省人头维持费，增加装备费，把有限的国防费用在刀刃上，用于改善更新武器装备，用于军队智力投资；简化军队结构，在体制、编制上实行诸兵种合理组编，以求最佳作战效能，从而把我军建成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能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第三节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对我军建设提出的要求

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既为我们确定军队建设的方向、原则和总的军事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对军队建设和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我军建设紧紧抓住现代化这个中心，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科学的体制编制，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并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人才；又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基层建设，贯彻执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培养选拔好各级干部等等。对于这些要求，下面各章将分别加以论述。这里提出的是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一、我军的历史使命有了新的内容

军队的历史使命，历来是同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还在我军建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人田会议决议中就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规定，不仅明确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军的历史使命。

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任务这一根本的历史使命，在我军存在和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所执行的革命政治任务的具体内容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军的历史使命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战争，推翻三大敌人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一使命，通过我军作为服务于人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而得到体现。建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强大支柱。它的使命已由主要是夺取政权变为保卫政权和巩固政权。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历史使命，同时它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也重申：“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邓小平《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就说明我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的根本使命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所执行的革命政治任务的具体内容，则发生了新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其中，经济建设是三大任务的核心，是实现其它任务的基础。中央军委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在实现这三大任务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军必须为之服务的现实政治，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我军要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的政治路线。军队不仅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肩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无论是反侵略，保卫国家安全，还是反颠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反对内乱，都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统一祖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并致力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从未许诺不用非和平的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要有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的日益加强，这就要求我军时统一祖国的神圣任务和正确方针有充分的认识和全面理解，通过不断加强军队建设，去努力实现这一任务。

对新时期我军使命的理解，不仅要立足于保卫祖国、保卫“四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还要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方面，我军也担负着艰巨的历史重任。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体力量。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制止战争，维护和平，

不仅要靠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正确，同时要有物质力量。军事实力是国家强大的标志。将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对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大影响。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本领。”（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

随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我军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具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是通过打仗消灭敌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开展生产运动，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方式，去体现其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职能，完成党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情况下，则是通过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增强国防实力的方式，为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提供强大的武力后盾；通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以弥补国家军费的不足，并积极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通过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式，去体现其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职能，完成党在新时期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

明确新时期我军历史使命的新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具体方式，可以使我军的建设坚持正确的方向，保证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一系列军队建设的原则、制度和措施得到正确地贯彻落实。同时，可以增强革命军人的责任感，维护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树立坚定的信念，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为了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幸福，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

二、我军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思想观念上要跟上和适应“转变”的要求

任何战略性转变，都必然是思想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步入“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新时期，思想上能否跟上这个新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决定我们能否适应“转变”，担负起军队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关键所在。在可能影响“转变”顺利实现的各种因素中，思想保守、观念陈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更新和“转变”不相适应的陈旧观念，打破旧思想框框的束缚，在思想观念上跟上和适应“转变”的要求，否则，就会贻误“转变”后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我军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问题。他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办法和措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对部队的教育训练、战备工作、国防科技、国防工程、后勤保障、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人才培养，乃至思想政治工作都提出了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现今仍然适用的好传统好经验的同时，对那些过去适用，但已不适应“转变”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的观念加以改变，破除与“转变”不

相适应的各种旧思想束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思想上跟上“转变”，根据“转变”对军队建设的新要求去确定部队各项工作的重点，研究部队各项工作实现“转变”的路子，探索和拓宽在“转变”形势下各项工作发展的途径。

应该看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后，各项工作走上轨道会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思想观念同新的思想观念常常会出现矛盾斗争。有的同志容易习惯用过去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去思考和处理问题。这就会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发生影响。还有一些同志感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一些事情按旧章程办不符合“转变”的要求，一时又无新的章程可代替，总希望上级拿出一套适应“转变”的章程、办法、政策、方案来，以便遵循。殊不知“转变”涉及的内容和层次是多样的，要求军委和上级事无巨细地都拿出一套现成的办法和方案来，本身就不科学、不现实。正确的态度是，以“转变”对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新要求为依据，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胆探索和创新。只有这样，“转变”才能在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我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各项建设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否适应“转变”的要求，对“转变”后军队的建设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要领导部队实现“转变”，加快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步伐，真正做出成效来，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对“转变”的精神实质有深刻的理解，对“转变”后部队建设的新要求、新特点有清醒的了解，对“转变”中遇到的新问题能以新的观念去认识，用新的思路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部队沿着“转变”对我军建设指出的方向前进。

三、我军建设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以现代军事科学理论作先导

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一贯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把它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研究总结出的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军队建设和作战的路线、方针、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指引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原理，总结我军历史和现实经验，根据现代战争的新要求和对我军建设的新特点，精辟地论述了我军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今后作战的需要，必须用现代先进的军事思想武装我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与掌握现代先进军事思想的人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掌握现代先进的军事思想，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战争实际相结合，切实解决现代战争条件下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邓小平同志要求我军“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邓小平《为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题词》）。中央军委也一再指出，“现代军事科学理论，是军队现代化的先导。没有现代军事理论的指导，军队建设的盲目性就难以避免。”和平时期，各国都非常重视研究军事理论。近年来，我军的军事理论研究获得了可喜的发展，有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现在，军队建设实行战略转变，迫切需要我们在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军事学术研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现代军事科学体系。

第一，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要求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认真地从军事科学理论上对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以正确指导当前的军队建设和今后反侵略战争的实践。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促使作战方法发生相应的变革，现代战争同过去任何时期的战争相比，都大不相同了。对付未来反侵略战争，无论作战的对象，战争的规模，乃至作战的许多方法都将是我们的从未遇到过的，需要我们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研究解决。我们的军事理论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认真研究原有的理论哪些仍然适用，哪些需要补充完善，哪些需要改变、发展？这些都需要经过军事科学理论研究作探讨和论证。对于外国军队作战和建设的经验，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同样需要通过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去分析和鉴别，确定哪些可以吸取，哪些需要摒弃，哪些应该改造。总之，不论是继承发展自己原有的军事科学理论，还是借鉴外国的军事科学理论，都需要我们加强军事理论的研究。否则，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后，没有军事科学理论的相应发展，军队建设的盲目性就难以避免，就会失去正确理论的指导。

第二，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有着丰富的内容，涉及到转变的途径、重点、步骤、方针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军事科学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和论证。例如，随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我军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一个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一个是人才现代化。但是，如何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应该以什么项目和技术为重点？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人才的培养应该确定什么样的重点、结构、发展目标等也都需要我们加强军事理论的研究，将这些问题讨论透彻，论证扎实，否则，就会影响我军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军队建设的各条战线、各项具体工作上。不同的战线、不同的具体工作转什么？怎么转？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都需要我们做有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否则转变就可能走弯路，影响转变的正常顺利进行。特别是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任务艰巨，经费和时间均有限，这就尤其需要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研究，把它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先导，让先进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我军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加强军事理论研究。搞军队现代化建设，不但要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而且要努力研究现代军事理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看不到军事理论的重要性，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与掌握现代先进军事思想的人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即使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也可以战胜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战时就可能打烂仗，平时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就不高，发展武器装备也会走弯路，强大的战斗力就建设不起来。因此，我们“要

把研究和学习军事理论抓住，用军事理论武装指挥员的头脑”（徐向前《答军事学术编辑部问》），这是我们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一项投资少、收效大，提高战斗力快的有效途径。

四、我军发展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他认为，改革不仅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的共同任务，而且贯穿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表明，军队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只有改革，军队建设才能打开新局面，军队建设中的许多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军队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一支生机勃勃的军队，总是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我军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围绕着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我军已经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精简整编、改革体制，合并大军区，人武部交地方，组建集团军，筹建陆军航空兵；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大力进行教育训练改革；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修订和重新颁发各种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实行士官制度、文职官员制度和军衔制度；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道路等。这些改革，带来了我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但是，整个军队的改革，应该说仅仅是迈出第一步，面临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要真正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改革还必须更广泛、更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军队改革同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稳妥地改革军队中的一些不完善的方面，绝对不是也绝不允许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或搞什么引起军队和社会动荡的“大破大立”。

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的改革要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个总目标，有利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在现代化军队建设的共性中突出我军的个性。这包含着对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一切对今天有用的建军原则都不应丢弃，但更重要的是创造适应现代战争的东西。这就要求克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勇于创新。

军队改革要贯彻一要大胆坚决，二要细心谨慎的方针。所谓大胆坚决，就是说，凡是看准了的，研究透了的，属于非改不可的，就要下决心去干，干到底，不能遇到困难就退下来。所谓细心谨慎，就是说，改革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慎重从事，科学论证，不能操之过急。军队的改革是在整个国家改革的大形势下进行的，同整个国家的改革密切相关，但军队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并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所以，军队的改革一定要搞得很稳妥，不仅不能把军队搞乱，而且要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军队搞改革，必须从我军特有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坚持我们好的传统，

也要敢于摒弃过时的东西；要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又决不能照搬照套。为此，我们军队的改革必须研究历史注重现状，从我国和我军的实际出发。

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军队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搞得是非不清。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一些好的东西也有一个适应新的条件的问题。因此，需要对我军的历史包括传统进行总结和研究，看看我军在几十年的作战和建设，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们的传统哪些还适用，哪些已经过时了，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否则就不知道要改什么。从哪里改起。

现实是联系历史和未来的桥梁，是向前发展的立足点。因此，改革一定要研究现状。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存在什么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哪些东西要改革，先改什么后改什么，都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不研究现状，心中无数，改革就难于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地方经验的问题。军队的改革，总的说来同地方是一致的。但是军队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军队对于地方改革的好经验，既应该学习和借鉴，又不能生搬硬套，应该适应军队的特点，使改革符合我军的实际。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改革要深入进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一些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军队要改革，关键在清‘左’”（杨尚昆《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红旗》1984年15期）。只有清除了“左”的影响，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同时，还要注意防止和抵制右的思想倾向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开展斗争。

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必然会遇到旧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阻挠。因此，要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战争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一支胜利的军队，总喜欢把过去成功的经验当作包袱背起来，以至于在发展着的战争面前变得因循守旧。我军是胜利之师，打过许多胜仗，创造过惊天动地的业绩，这是值得自豪的，但也容易变成一种包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不断解放思想，对过去的一套认为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改的现象不多了。但是，有些同志还存在安于故习，因循守旧的思想，一遇到具体问题就留恋过去那一套，习惯用老眼光看新情况，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有的同志对过去的传统，只注意站在旧框框中修修补补，不重视对新的军事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应当承认，过去的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我们面对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我们只应当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对今天和未来有用的东西，而不能把历史经验当作可以到处套用的万能法宝。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对于我们适应和跟上改革的形势是十分重要的。

我军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速决战”。因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实现主观客观的一致，而且客观事物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对事物的旧过程认识了，对它的新发展又要继续认识。军事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现代战争将会不断出现新的特点，我们的认识必须随之发展和提高，改革也要紧紧跟上去，否则就要落后。因此，我们要破除一劳永逸的思想，把改革看成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总之，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之后，我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须勇于改革创新，不然就难以有所作为；同时，军队的改革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搞得很稳妥，很扎实，不能赶时髦，赶浪头。这样，

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不出乱子，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顺利前进。

第三章 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总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而适时地将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了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重新设计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构想了实现该目标的基本途径，并付诸伟大的实践，从而不断把军队建设引向深入，实现了我军建设史上一次带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第一节 军队建设总目标的提出

邓小平同志在进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体设计中，立意高远。他外观世界风云，内察国势民情，深刻地阐明了进行军队“三化”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从宏观着眼，微观考究，规定了建设的基本内容，规划了建设的战略重点和实施步骤，指引军队建设一步步向总目标迈进。

一、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提出的基本依据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早在战争年代就曾提出过军队要现代化的设想。在临近全国胜利的1949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建设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国初期，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总方针和总任务提了出来。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曾多次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技术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发出“建设我军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未能实现真正转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方针未能一贯地坚持。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呈现出曲曲折折的特点。特别是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他把政治与军事对立起来，把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诬蔑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毛泽东建军路线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破坏，军队现代化建设陷于停滞，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被美苏远远地抛在后头。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军队问题堆积成山，大有积重难返之势。

军队建设的曲折经历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深深忧虑。毛泽东同志在世时，他曾多次向毛泽东同志进言，并与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

1975年1月25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尖锐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邓选》

第1页)试图扭转颓局,革故鼎新,然终未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才得以重新全面地构想和设计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

1977年8月23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邓选》第56页)再次向全党全军发出危机感、迫切感的警告。当时,我军建设可以说是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认清现实,认清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的特点,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困境和弥补缺憾,以百倍的勇气和努力,来推动和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呢?还是抱残守缺,原地徘徊呢?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选》第148~149页)到了1981年9月19日,他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明确地向全军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选》第350页)的号召。

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受制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军的现状。军队现代化建设,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国家战略、科学技术水平等密切相关。它的建设道路、发展重点,与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以及武装力量在未来战争中担负的作战任务密切相关。因此,邓小平同志从我军的历史使命出发,首先针对建国以来我军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出现的问题,通过对军队的不断整顿,来拨乱反正,理顺关系,扫除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障碍;接着,根据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其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对世界局势作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大胆判断,从而顺利地把我军建设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党的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围绕新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目标,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原则,使我军“三化”建设进入实际步骤。

不难看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一总方针、总任务、总目标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军队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这一科学决策,既适应国家战略和我军的历史使命要求,又充分反映了军队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1.确定“三化”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从国家战略出发,不断增强足以适应现代国际环境需要的军事实力的科学决策,是反对侵略战争和强权政治,谋求世界长期和平稳定的客观需要。

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三化”建设总目标时,正值八十年代之初。当时国内外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我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不久,一切都在整顿恢复中。在国际上,由十美苏争霸,发生了阿富汗事件和伊朗问题,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正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邓选》第204页)面对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月16日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提出了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并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于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

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邓选》第204页）并且反复多次地告诫全党全军，借鉴中国近代历史的惨痛教训，加速“四化”建设，使我国迅速强大起来，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1983年6月国务院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足以适应现代国际环境需要的国防实力。”很显然，邓小平同志是从现代国际环境需要出发，从国家实力与外交能力的内在联系、军事实力与国家地位的逻辑关系，来揭示军队实现“三化”目标的客观必然性的。

在和平时期，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主要是通过巨大而现实的威慑力量来制止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争发生来实现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不具有一定的国防实力，那末，它在与外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交往中，将艰难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谁也不会忘记，近代中国曾以“高邦天朝”自诩，可是由于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任人宰割、任人践踏的年代里，中国在上世界上只有一种屈辱的形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中国是战胜国，却未能改变山东半岛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命运，公理没有战胜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中国是主要战胜国，可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在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时仍无视中国的权益，说到底，就是因为国贫兵弱，落后必然挨打。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决意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我在世界应有的地位和尊严。然而，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加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失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落后状况，以至发生了一些国家胆敢无视我尊严，挑起边界争端，对我南海诸岛主权染指，生觊觎之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中三大政治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我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事务中与美苏相抗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稳定世界局势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一是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块头大；二是由于我们奉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永不称霸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个国家友好相处，因而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三是我们处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四是我们是五大核国家之一，具有一定的核威慑力量；五是我们有一支具有优良传统，能征惯战，依靠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进行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民军队；六是我们有敢于摸老虎屁股、不信邪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七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代表着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因此。早在中美建交以前，尼克松就曾说过，世界事务如果没有中同参加，问题是不好解决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三大政治力量中，从综合国力看，在经济上、军事上我们与美苏两国相比都还是比较弱的，凭我国力量无法有效地制止美苏任何一方发动世界大战，甚至也难以遏制地区性霸权主义的滋生。以往，在国际事务中，我们主要依靠政治影响来维护国际形象，靠深得人心的外交政策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用灵活的巧劲达到四两拨千斤。依靠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固然可以维护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根本办法。战国时期，苏秦挂六国相印，连横以抗强秦，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终未能阻止秦灭六国。所以，毛泽东同志早就说

过，我们不应做宋襄公式的蠢人。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只有“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邓选》第87~88页）。

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局势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各国实力普遍不断增强而发生明显变化。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然而，尽管西欧、日本的崛起，第三世界力量增强，但任何一方仍然都不能有效地阻止美苏发动世界大战。

九十年代伊始，国际风云骤变，以东欧巨变、海湾危机和苏联发生的变化为标志，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世界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与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继续发展，一些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矛盾突出出来，力量对比的失衡又引发了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持续四十多年的旧的世界格局终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在这种正在演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制约战争，谋求和维护未来世界的持久和平、稳定和发展，依然离不开强大的国力，其中尤其是强大的经济力和军事力。

综上所述，不管世界局势多么变幻，我们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进步与发展的政策不变。要有效地发挥我们的国际作用，真正成为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就必须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侵略者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使潜在的对手确信，对我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任何侵犯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妄想，迫使它们放弃侵略企图，从而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国际地位，保卫祖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有效地牵制霸权主义，维持世界长久和平与稳定，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7页）的宏愿。

2. 确定“三化”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军队自身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是顺应军事发展潮流，迎接未来战争挑战，提高现代作战能力的必然选择。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引起军事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引起了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引起了现代作战样式的改变，使新技术转化为战斗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充分说明，新技术对军事领域的这种冲击愈来愈强，强烈地振荡着世界军事领域。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而来的军事革命，使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装备了军队。与此相适应，出现了空军、防空军、空降兵、化学兵等新的军兵种；地面部队的战场机动方式从徒步、骑马、乘畜力车向机械化、摩托化过渡；出现了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实施如闪电战快速突击的崭新的作战方法；战略上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成为战争发动者的惯用方法；对敌深远后方实施战略轰炸的作战方式应运而生；利用航母编队争夺制海权以及潜艇作战与反潜作战，成为海上作战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样，战场从平面走向立体，战线拉长，军队编制猛增，出现集团军群和方面军群，前后方界限打破，使对战争的战略指导空前复杂化。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的产业革命或技术革命引起了军事领域更大的变革。首先是导弹核武器系统的出现和装备军队，引起了军队系统的连锁反应，出现了导弹核部队，出现了核战争，出现了战略核防御，出现了核条件下的军队体制编制和作战方法。与此相适应，出现了指挥与通信的革命，军事管理的革命，出现了核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理论。军事革命的浪潮使得未

来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几乎难以预料。随着各种高技术兵器新家族的出现，参战的军兵种也愈来愈多，组织指挥异常复杂。这就客观要求军队必须全力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对策，加快军队建设步伐，以应付未来战争。首先是增加军费开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军费开支水平呈日益上升的趋势，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幅度地增加军费，1980年为1427亿美元，1985年为3050亿美元，5年内增长率大体保持在7%左右，预计到2000年有可能达5100~5600亿美元。苏联在六十年代中朝到七十年代末，军费开支年平均增长8%左右。

1988年高达约1800多亿美元，到本世纪末，其军费可能达到或超过3000亿美元。日本军费1988年为167亿美元，2000年可达428亿美元。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军费也呈上升势头。印度1988年为74.2亿美元，到2000年可能增至147亿美元，南朝鲜1988年为50.28亿美元，本世纪末可达138亿美元。

1983年世界军费开支总数约5000亿美元，1984年一下子就达到970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6%，远远超过了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同时，加强对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理论的研究成为各国军队建设的重要课题。美国正在积极准备打低强度高技术战争，作所谓高边疆的积极防御。自1983年以来陆续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天军计划和2000年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苏联以其多样化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小型化正在向核后时代迈进，作打高技术常规战争准备。日本则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改变国家防御战略，进入新的“寓攻于守”的战略框架时期，代之以全新的攻势防卫战略，以质量建军为原则，发展防卫力量。

对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开幕式上就预言：“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邓选》第84页）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利用时机，抓紧时间进行现代化建设。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地向全党发出号召：“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不言而喻，邓小平同志把“三化”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遵循军事发展规律，适应历史发展、变化契机的正确选择，否则我们将会丧失良机，落到被“开除球籍”的那种灭种、灭族、灭国的悲惨下场。

3. 确定“三化”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发挥军队柱石作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1981年，在邓小平同志发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时，就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要搞“三化”建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有军队存在，它就是一个战斗队。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特点的条件下产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更应当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

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职能。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同志在《军队整顿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军队“要准备打仗”，这是“我们军队工作的纲”（《邓选》第20页）。杨尚昆同志说：“邓主席要求我们，……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1983年11月19日《在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制定的《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提醒全军“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1989年北京平暴之后，在北京戒严部队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把我军战斗队的职能作出反侵略反颠覆的新概括而突出加以强调，要求以此为根本目的，加紧我军“三化”建设。

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包含着两个涵义：一是突出强调了和平时期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战斗队。这样便把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队之间的关系理顺，说明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战斗队是第一位的、基本的。军队建设必须围绕提高战斗力来进行。

自从有军队以来，军队总是以暴力工具的形象出现。战争的存在及其爆发的可能性，是军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甚至应该说是唯一的依据。随着战争的消失，军队将自行消亡。也就是说只要阶级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军队战斗队的根本使命就不能变。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战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军队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三队”职能，并以此为出发点，不断加强军队建设，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三队”职能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我军进行人民战争的战争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还由于我们没有政权，没有外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争，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这样便要求军队必须具备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既能宣传教育、又能组织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三队”功能。随着政权的建立，尽管我军进行的人民战争性质没有改变，但是军队建设的条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军队职能的具体内容理所当然地随之改变。战斗队是基本的。突出战斗队的职能，并以此来建设军队，是军队建设的纲，工作队、生产队在不发生战争的和平建设时期，则体现为参加地方劳动，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搞好部队内部的生产经营，以补军费之不足。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界定我军基本职能，用意应该是十分明确的。

二是对战斗队的使命明确作出“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新概括，使我军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更突出。这就进一步要求军队必须加速“三化”建设。

任何新生政权，都会面临外来敌人的武装侵略和国内敌对分子颠覆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始终处在外来侵略和内部颠覆的双重威胁之下。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对沿海进行袭扰，妄图把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1959年策动西藏反动势力叛乱。六十年代初期，曾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掀起反华大合唱，建立反革命包围圈，挑起边界事端。此后，世界霸权主义亡我之心始终不死，从全球范围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不断改变策略，企图通过“和平演变”进行思想、

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渗透，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社会主义国家慢慢变质，来达到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种总策略下，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变换手法，不断进行策反，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寻找和培植敌对分子，策动和制造政治事件。近年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在世界某些地区不断得手，使得这种威胁变得更加严酷和直接。

我同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虽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局部范围的阶级斗争还会出现，有时甚至会很激烈。在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行渗透和“和平演变”策略的影响下，国内将会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生反革命暴乱和骚动的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

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忧是生动的例证。

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内必然受到影响。太平之中并不平静，和平时期并不太平。军队必须随则准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双重职能，不能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来削弱其中任何一项职能，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的转折，国内发生反革命暴乱之后，这种根本职能必须进一步得到加强。邓小平同志对军队职能作出反侵略反颠覆的新概括是十分正确的，是非常英明的。这个新概括要求我们必须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

对外反侵略。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面临的现实敌人和潜在敌人都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武装了核牙齿的强大对手。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要挫败他们的企图，保卫祖国安全是困难的。其次，我们是一个周边环境比较复杂的国家，由于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现实利益的冲突以及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可能爆发局部战争，在过去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印中、苏中、越中边界冲突，今后，随着海洋国土战略的发展和海洋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海洋冲突也将不可避免。要能应付各种突发战争，有效地捍卫祖国主权领土完整，离开军队“三化”建设别无选择。南海诸岛的主权争夺，当前我们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就足已说明这一点了。

对内反颠覆。就是说需要军队来维持国内的安定局面。我们都很熟悉，毛泽东同志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经常不断地告诫全党，防止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并把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变质、国家变色作为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始终要求军队密切注意随时做好反侵略反颠覆的准备。在1989年北京平暴之后，邓小平同志则明确要求军队从严格履行对内反颠覆的职能来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当然，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保护人民的和平劳动，通常都是依靠地方武装警察来实现，但在特殊情况下动用军队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军队能否具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能否在较短时间内赶赴出事地点，迅速平息事件，把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使政局保持稳定，同样取决于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和现代作战能力的强弱。

所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邓选》第83页）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仅论述了我军的根本职能，而且从这一职

能出发，从现实使命上提出了我军进行“三化”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就是依据我国所处的战略地位，依据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我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依据国家利益对军队的根本要求及新时期军队的职能，作出了军队“三化”建设总体目标的设计，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三化”建设的思想，在新时期我军建设上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二、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同志赋予军队“三化”建设以崭新的时代特点，具体表现在他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规定的具体内容，并为总目标的实现确定的战略重点和构想的各个阶段的分目标上。

1. “三化”的基本内容。在革命化方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和要求这支军队必须能够永远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培养部队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具有爱同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成为把优良传统与现代化实际结合起来的革命军队，使之永远成为“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集中到一点，就是政治上合格，思想上过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内容极其丰富，既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我们都十分清楚，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军队的学说，创建了一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人民军队。他解决了军队和党的关系问题，确立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基本原则，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解决了军队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与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区别；他解决了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提出了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起一种完全新型的军队内部关系；他正确地处理了军事与政治关系，明确了我军建设的方向等等。这些，都是我军60多年来在革命化道路上健康成长、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所在，是我军的本质特征和真正优势，是我军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进一步发挥和保持这一优势却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新式整军运动这种形式，来激发军人的阶级觉悟，提高革命斗志，从而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同时，努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学英模活动等方法来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企图将军队作为其反党的工具，大肆破坏军队建设，因此我军在革命化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了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革命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把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继承下来。他始终强调把政治建军放在首位。他曾

多次指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这是我军革命化之根本；他反复强调牢牢地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调动，使之永远作为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而存在和发展；他始终坚持任何时候政治工作都是我军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求永远不能放松，并要求全军指战员把毛泽东同志在过去战争年代里创造的一系列政治建军原则发扬光大。这些要求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革命化内容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化的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建军原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军队人员的不断交替，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作战样式的不断改变，军队的使命和任务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军队建设上无疑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邓选》第114页）“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邓选》第116页）事实正是如此，我们面对执政的考验，面对工作重心的转移，面对商品经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如何解决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的情况下军人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奉献的问题，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性质不变的问题，如何稳定军队的问题等，必须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当代军人的这些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问题，否则必然影响军队革命化建设。因此，邓小平同志在革命化建设内容上突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和平演变。把坚持对军人进行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教育放在首位，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无产阶级军队性质永不变色。在革命化建设的方针原则上，为了使革命化建设卓有成效，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教训，彻底摒弃了过去搞政治运动、搞群众斗群众的做法，避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悲剧重演，以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革命化建设的健康进行。因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邓选》第346页），提倡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正面疏导和自我教育，从而解决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遇到或没有解决好问题。可以说从内容到方法上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那末，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同志解决了在我军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在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中，如何保证我军性质不变，加强革命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方法。这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化方面，邓小平同志同样作过许多阐述和说明。他提出的现代化，不是就某个方面而言的，不是狭义的，是从军队全面建设上所作的要求。概括起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要求追踪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努力缩小我军同发达

国家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发展和装备先进的尖端武器，做到别人有的我们也有。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现代化武器、能指挥现代战争的人。这里包括干部的培养训练，部队的教育训练，要求军人的知识构成、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精神面貌、心理素质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掌握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先进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善于全面地研究和运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战略战术。

三是人和武器的结合，这就是科学的体制、编制和现代化、正规化所必备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总之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关于现代化的构想，就是建设一支用优良武器装备武装起来，掌握先进军事科学理论和军事技术，具有现代条件下自卫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队。

显然，邓小平同志是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作为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加以强调的。但是，如果我们更深一层进行探讨，便会发现邓小平同志是把人的现代化作为军队现代化的关键。未来的竞争是国力和军力的竞争，更是人的质量竞争。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大大增值。同时，这种决定作用在表现形式上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它更多地通过物化形式表现出来，使现代战争成为现代技术的较量，现代武器装备的较量，而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更新，又进一步推动和导致战争理论、战争方式和作战方法的革命性变革。于是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出现了在各个领域进行无声的全面竞争和较量的“隐形战场”和进行血与火拼杀的“显形战场”。从而使人的因素在大部分的时间以间接的对抗形式发挥巨大作用。在军事领域的斗争中更为突出地反映出人是社会一切活动的主体。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要重视人才建设的本因所在。徐向前元帅说得好：“军队主要是两大建设，一是物质建设，一是人的培养。说来说去，变来变去，就是这两条。原始弓箭也好，现代自动化武器也好，都要人去掌握。人还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人没有武器不行，武器离开人更不行。”（1980年11月24日《在听取总参领导同志汇报时的指示》）因此，人是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是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其现代化程度越高，军队整体现代化发展就越快，就能在未来的两个战场上都取得胜利。

在正规化方面，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复出时，就开始进行这项规划。无论是七十年代后期的军队整顿也好，还是八十年代初期的百万大裁军也好，都是努力为实现正规化而进行的实际步骤。他要求不但要彻底清除游击性，而且要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邓选》第20页），他反复强调治军要严，要加强军队的纪律性，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增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他提出充实纪律建设的内容，制定行政管理法规，改革体制、编制和组织指挥，强调通过正规化训练提高部队的“五种能力”，把军队搞精干，以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为原则，加速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正规化建设的内容渗透于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融汇在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中，涉及到体制、编制、武器装备、军政训练、管理教育、保障供给、院校建设、组织指挥以及日常工作、生活秩序等许多方面。然而，根据我军正规化建设的现状，不可能齐头并进，不分主次，全面开花，必须

突出重点。因此，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把军队的体制、编制和法规建设摆在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首位，通过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法，通过制定各项条令条例以建立健全军队法规的方法，通过正规训练、严格管理的方法来逐步推进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

“强大”也是总目标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为我军设计的建设总方针、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基本内容无疑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然而，邓小平同志在精辟概括这一总目标的内容时从来都是把“强大”作为前提的。因此，“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才是“三化”总目标内容的完整构成。我们在研究这一思想时不应忽视这一点。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反复要求我们要建立强大的国防，不但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如今，邓小平同志再次反复强调“强大”，这决非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简单地重复和单纯的坚持，而是独具深意的。

新中国诞生时，我们的国防建设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十分大。我们的陆军是强大的，技术兵种正在建设中。毛泽东提出建立强大的国防，应当主要是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出发加以强调的。他在讲到军兵种建设时，强调“强大”是从军队一体化发展方面来要求的。因此，毛泽东同志的“强大”思想既有与国外的比较，也有与我国历史的比较，而更多的是自己与自己比、过去与现实比，更多地带有纵向比较的特点。

如今，我军建设状况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了，同时，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新时代，世界充满着激烈的竞争。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强大”，基本含义是把军队建设成强大得与我国的国力相适应，强大得能与西方大国相抗衡，从而确保国家安全，领土完整，进而维护世界和平。因此，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更具有横向比较的特点。

2. 总目标的战略重点和实施步骤。邓小平同志对“三化”建设总目标的再设计与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总目标的设计是一个共生体，是一个多层次、多向性、动态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对我军建设道路的选择，建设战略重点的确定，以及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具体分目标的制定等。他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对“四化”建设进行规划时曾说过：“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邓选》第205页）从1979年12月开始，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本世纪达到小康社会，然后渐次实现四化目标的构想以来，多次对之进行阐述，并概括为分两步走，第一步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增订本）》第68页）从这一总体规划出发，他曾多次要求军队建设搞出规划，使之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也就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步。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为发展重点，推动人和物

的现代化，是世界先进国家发展的经验总结。鉴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放在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关键地位。邓小平同志对此有许多极为深刻的见解。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选》第45页）“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邓选》第83页）“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邓选》第38页）聂荣臻元帅在1982年《红旗》第24期上发表题为《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的文章中谈到：“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把组织科技队伍攻关，当做落实二十年发展规划的第一位问题提了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邓小平同志给我们指出的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发展重点应当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提高官兵现代化素质为重点。这既是我军建设的弱点所在，也是影响和制约我军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一，竞相发展现代军事科学已成为政治、军事斗争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形式和手段。军事科学通常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三大部类，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现代战争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使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状态，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制约、促进，使之发展的社会性日益明显和广泛，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已成为政治、军事斗争一种重要形式和手段。例如美苏，在八十年代初，为了达到其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目的，它们大力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不断研制新的武器装备，竞相以新的技术和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为发展重点，同时积极地展开军事理论科学研究，有针对性地发展、完善自己的军事理论。他们提出的新的军事理论和不断研制的新式兵器，虽然没有在大规模的实战中进行较量，但却在和平斗争与对峙、以及过去几场局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重大作用。例如通过核威慑战略，各自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使谁都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运用新的军事理论指导战争，投入不少新式武器，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可见，在和平建设时期，军事科学在国家军事决策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以军事科学技术为先导是尽快实现“三化”目标的最佳选择。由于我们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方面既不能降低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寻求一个中国特色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捷径。因此，不能走高消耗的粗放道路，而必须走投资少、收效大，提高战斗力快的高效益道路。只能选择以军事理论为先导，加强对国防战略的探讨，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对战略战术的研究，努力解决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面临的许多现实而又直接的新问题，尽早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军事科学体系。在装备建设上，多研制，多储备，少生产，有重点装备。这样，就有可能在军事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既适应国力的要求，又能保持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起点，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整体战斗力，逐步达到“在国际上受尊重的水平”。这是一种既实际又可靠，而且是非常经济的选择。

与国民经济建设同步发展，渐次地、有计划地、分步骤地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国防与军队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性的、发展的概念。它是把我们的历史和现状，同世界先进军事成就相比较、相结合的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因此，通过实现军队现代化来调来解决我国国防主要矛盾就如同改变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面貌一样，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军队现代化建设不能超越可能，必须与国家建设目标相适应。步子不能迈得大快、太急，欲速则不达。在可能争取到的和平时期内，有计划地抓好各项战备建设，到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时，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程度，同样也应接近世界第一流的水平，与我国的世界强国地位相适应。同时我们要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必须采取一些过渡的办法。八十年代，主要是通过治理整顿，拨乱反正，理顺军队建设的各方面关系，有所发展，为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今后十年，在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时，军队现代化建设必然随之步入一个新的台阶，我军建设将会有个质的飞跃，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将会有重大突破，初步实现现代化。这是近期目标。中期目标，使国防力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期目标，在下世纪中叶，进入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行列。

从邓小平同志为我军新时期建设所设计的内容看，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既强调军队“三化”建设的必要性，又注意国家经济力的可能性，把军队“三化”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之中，协调发展；既注意近期目标更注重远期目标，把提高军事实力和积蓄军事潜力结合起来，把军事实力的提高寓于雄厚的国防潜力之中，在提高军事实力时注意加强军事潜力，重点放在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上，同时从长计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应付全面战争的准备；既注重硬件建设，更注重软件建设，在加强装备建设的同时，突出重点，加强军事理论、军事科学技术和人的素质建设，使“三化”建设按照轻重缓急协调发展，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一步步达到“三化”建设总目标。

第二节 军队建设总目标的鲜明特色

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它与战争年代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军队建设的要求有着根本的不同，与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三化”建设相比较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更有许多质的区别。这些区别与不同，既反映出鲜明的时代性，同时更表现出突出的中国特色。主要是：（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将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其现代化程度有多高，但其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性质不变，以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最根本的特色。（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三）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是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在不断改革中求发展。（四）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是走质量建军之路。（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分阶段、按步骤逐步实现的。（六）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实现人、武器装备和体制、编制的现代化。三者紧密结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网式结构。上述诸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发展了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传统，加上现代的军事科学和武器装备。具体说来，就是以革命化为基础，以现代化为中心，用正规化作组织保证。

一、革命化是我军建设的基石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要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第362页）这是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上给军队赋予的鲜明阶级特色。

我军从建军开始，就是一支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民军队学说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型的伟大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的政治觉悟之高，党的领导之强，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之坚决，作战之英勇顽强，作风之艰苦朴素，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乃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无论是面对枪林弹雨的武装斗争，还是面对糖衣炮弹式的和平演变，这支军队始终如一，经受住了考验。究其缘由，最根本的是因为它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我军成长的历程雄辩地说明，革命化是我军区别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重要标志，是我军建设的基础和根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时，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个根本特色。正是从这里出发，邓小平同志把革命化建设放在“三化”建设之首，作为“三化”建设之统领，要求全党和全军予以高度重视。他时刻告诫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页）

首先，革命化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性质的保证。邓小平同志一贯认为，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都是通过军队的革命化来保证的。不讲革命化，军队建设就会脱离党的领导，就会改变自身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而军队的性质对于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历史证明，有军则有权；建国以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历，尤其是1989年北京平暴斗争，进一步深刻表明，无军则不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解放军能否确保其无产阶级的性质不变，直接关系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能否得到坚持，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能否坚定不移地走到底，关系到党的存亡、国家的兴衰。其次，现代化程度越高，对革命化的要求也越高。军队建设中的现代化与革命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方面，我军现代化建设本身需要革命化来保证其建设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需要革命化成为其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革命化又是以现代化为实践依据，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现的。革命化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各个时期军队的中心任务不同，赋予革命化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也不同。今天和平建设时期，就整个军队的革命化来说，就是要紧密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激励广大指战员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革命化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再者，革命化依然是现代战争克敌制胜的法宝。现代化建设是由于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未来的战争，固然有诸如“智能战”、“后勤实力战”、“科学技术战”等等说法，但九九归一，都集中在对人的素质、特别是革命化程度的要求上。即便是核战争，可以断言，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因素依然是人而绝不是物。“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71 页）这一客观真理并没有因为现代战争与过去战争样式的不同而改变。

总之，要保证我军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克服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和种种阻力，保证我军在未来战争中克敌制胜，都离不开革命化作保证。

二、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中心

军队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诸方面的建设都很重要，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有丧失军队物质基础的危险。因此，军队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以现代化为中心，是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在我军新时期建设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起着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军队建设就很难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军建设只能以现代化为中心。从总的情况看，我军的革命化程度是世界第一流的，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所根本不可能有的，这是我军的巨大优势。但是，“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选》第 58 页）这就客观地决定了军队必须迅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否则是没有前途的。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建设提到我军建设的中心位置，抓住了我军当前建设的主要矛盾，揭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

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现代战争对我军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从军队产生到如今，已经历了冷兵器、热兵器时代，并正在走向核兵器和电子时代。十四世纪，火药、火器传到西欧和中欧，从此滑膛枪取代了长矛，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线式战斗队形取代了方阵。十九世纪后期，线膛枪炮代替了滑膛枪炮，连发枪和速射炮日益成为战场的主要武器，无烟火药代替了黑火药，导致了军队疏开的散兵战斗队形和军队总参谋部的产生。二十世纪初，军队的武器装备出现了全新的成份，随着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的产生，相应出现了空军、防空军、空降兵、化学兵等，出现了空地协同、步坦协同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使军队建设进入核时代，使武器装备、军队构成、军队训练以及进行战争实施、战斗行动的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军队，装备了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航天武器、隐形飞机，以及指挥、控制通信电子系统。高技术武器广泛应用于战争，必然导致战争的突发性增强，战争规模扩大，战场变化剧烈，前后方界限趋于消失，战略战役战术关系更加密切，以高技术为内容的智能战、软科学战将跃居更重要的地位。这种现代化发展走向客观地把现代化摆在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

以现代化为中心是我军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我军 1927 年创建之后，主要是在农村发展，进行游击战争，军队的武器装备是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和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少量新式武器，处于低级落后状态。

随着我军的成长壮大，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阵地战过渡。然而，总体上仍然是小米加步枪。全国解放后，我军建设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过渡和发展，各军兵种相继建立，装备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改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军的发展历史生动地证明，我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现代化是其必由之路。过去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军队发展的指路人，如今邓小平同志则把我军建设引入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航程。

三、正规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把正规化建设作为我军建设总目标的内容之一，是五十年代初确定的。不过，我党关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

1936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游击性，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到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有了很大发展，武器装备也有了较大的改观，毛泽东同志顺应客观需要，再次指出：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层次的正规化作战，全国解放后，1951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军队正规化建设迅速蓬勃展开。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在反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破坏下，使我军正规化建设遭到了严重挫折，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担忧，反复提出“军队要象军队的样子”（《邓选》第2页），强调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一切行动听指挥，坚持从严治军，以法治军，用正规化建设来推动现代化，促进革命化，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正规化出战斗力。人与武器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过正规化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战争中人与武器相互依赖，互相作用着，人与武器的结合构成战斗力。人与武器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由于生产不发达，武器也不发达，战争方式也异常简单，只需要手执武器的人去搏斗、厮杀，战争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士兵的体力和勇敢精神。随着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新式武器不断出现，杀伤力不断增大，直接引起军队的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的变革，武器向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要求使用武器的人精通本专业的技术和进行科学的分工组合，单凭人的体力和勇敢，人自为战，或者仅仅依仗武器的精良，都不可能取得现代战争的胜利。因此，战争的历史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战斗力的标准不是人和武器的简单相加，而应当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把人和武器科学地有机地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是人和武器的辩证统一论者。他认为，要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不仅要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人的革命化、现代化，而且必须通过正规化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无敌于天下。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越是现代化战争，越是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就越需要加强正规化建设，以适应现代化革命化的需要。

正规化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正规化。正规化是现代化的组织保证，它对现代化起着直接的推动和保证作用。杨尚昆同志认为，要适应现代战争，最根本的是，健全条令条例，建立规章制度，完善军事法规，实现行动规范化，管理科学化。要贯彻从严治军的方针，全面建立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正常秩序。要有适应现代战争的指挥水平和作风方法以

及军人生活方式。如果这些方面的正规化建设达不到一个新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必备的保证条件。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建设的实践也表明，军队的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总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正规化建设往往还要走在前面，为实现现代化做准备、打基础。

正规化促进革命化，没有革命化，我军的正规化也是实现不了的。同样正规化建设对革命化来说又有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我军开展的“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既是革命化的体现，又是正规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还要看到，作为正规化建设的军事纪律、组织纪律，对于保证我军政治纪律的实现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想象，连起码的军事纪律、组织纪律都不能自觉贯彻的人能把政治纪律置于最高的原则之上。当然，没有革命化的保证，单纯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行政法规也难以捆绑出军队的正规化。割裂了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势必造成军队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行为，从而影响长远的建设。

总之，邓小平同志的“三化”建设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三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以现代化为中心，为革命化和正规化建设提供了实践依据。以革命化为前提，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以正规化为条件，为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证。显然，它们三位一体，从不同侧面有机地组成了我军建设的总体结构。这是我国国情、军情的客观反映，是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有中国特色的。只要我们能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的建设统一起来，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就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的军队现代化建设道路，把我军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实现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当今世界各国在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各自都有自己的方法和途径。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与我党、我军许多领导同志一起，深刻地分析研究了我国的国情、军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创造性地寻求、探索并具体实践中国式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道路，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指导方针、原则和基本要求。

一、以自力更生方针作为基本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0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和事业成功的法宝。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中，进一步阐发和强调了这一思想，并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充实了许多新鲜内容。他说：“我们搞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6页）“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

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邓选》第361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邓选》第361页）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既是讲历史，更是讲现实与未来，深刻地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出来。他告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要依据自己的国情、军情，走自己的路，去大胆探索，努力创新，不能跟在外国人的后面，沿着历史的老路爬行，照搬照抄别国样式和经验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又告诉我们，自力更生要从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提高自己出发，去对外开放，借鉴外国经验，引进消化对我有用之先进成果，加快我军“三化”建设的步伐。在当今开放性的世界竞争面前，不能搞关门式，要在开放之中坚持自力更生，在自力更生中引进，做到两者互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他还告诉我们，要通过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促进内部机制的自我完善和内在能量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来实现“三化”总目标。自力更生，不仅仅是对外部而言的，还包括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军队内部的相互关系。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们要依靠军队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不要有依赖和等待思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挖掘潜力，去激发内在功能，这样才会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才能永远保持发展的活力。因此，毫无疑问，他的自力更生思想，具有开放的特点，具有改革的特点，具有内在机制自我完善的特点，充满竞争、自强不息的和平时代气息，较毛泽东时代其寓意更深刻了，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

二、以世界和未来的发展作为参照系

搞军队现代化与搞经济现代化一样，不能坐井观天，固步自封。军队现代化，这是国际化的概念，它是当代国际最先进的军事理论、武器装备和编制构成的综合。同时它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使不同时期军队现代化的标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现代化建设要面向世界，要把世界范围内各主要国家军队的发展状况作为我军的参照系，要开阔我们的视野，放开我们的眼界，改变过去孤立地自己同自己比、作回头看的单向思维模式，把我们的标准始终定在世界先进水平上。

军队现代化，作为一个国际化概念，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独有的。随着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军事建设上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之外，都必然受到这种生产关系上的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尤其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军事发展必须跟上时代潮流，面向世界。我军发展如不面向世界，就可能失去水准，我们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军队现代化，又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值。过去条件下的现代化，并不等于是今天的现代化，今天的现代化也不能代替明天的现代化。即使在当代，由于时间差、地区差也会有明显不同。因此，我们在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时必须面向未来。没有强烈的未来意识，没有超前发展的战略眼光，安于现状，只顾眼前，闭目塞听，或者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非但我们的中期目标不能实现，下世纪中叶的长远目

标也会成为泡影。倘若我们仍回复到旧中国那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自我陶醉的老路上，或者妄自菲薄，不敢面对现实，面向未来，面向来自世界的挑战，自甘落后，不去扬鞭奋蹄，其结果必然是把自己囿在狭小的角落里，浑浑噩噩，酣睡不醒，继而陷入自我挣扎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面对强手如林的世界不能立足。由此不难理解，要把握好我们的发展尺度和标准，就要密切关注世界范围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最新发展趋向。一方面要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瞄准世界水平，尤其是在我军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有的放矢地进行建设，达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时，要关注未来，面向未来，瞄准2000年，判断那时的世界军事格局和战场特点，战争方式，预测那时的科技发展进程，构想那时的作战实际需要，打什么样的仗，选什么样的武器，建设什么样的军队，作超前准备，以此来确定在总目标下的分目标和各个具体目标，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反馈，从而造就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三、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为重

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这是邓小平同志一再阐明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十几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8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军队建设基本规律的反映，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恩格斯就有以《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用剑奴役星期五为例，说明军事以经济力量为基础这一基本原理，“剑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并进而提出了：“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2页），恩格斯还曾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应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搞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这是个战略方针的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方针的提出的理论来源。归纳起来，他的这一思想是在科学地把握国际战略格局总特点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考虑，从我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对军事的制约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上述论述告诉我们，在实现军队新时期建设总目标时，应该考虑从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实现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应该考虑从军队的根本职能出发，以精兵为原则，做到重点发展，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把主要经费用在刀刃上。应该考虑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积极发展。要求我们，第一，正确认识军队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消除依赖和超前发展的思想，认清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源与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自觉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使军队发展与经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在国际形势处于相对和平稳定时期，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当今，各

个国家和民族都普遍认为，现代战争已不是单纯军事力的较量，而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和技术上落后太远，与潜在敌人差距过大，比军事上的落后和差距更危险。因此，为应付军事威胁，首先必须加强综合国力的发展，而不能仅仅偏重于国防建设这个局部。

首先，战争的胜利以经济为基础，军事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的亦即经济的条件。早在春秋战国时，管仲就明确提出：“国富则兵强，兵强者则战胜”的思想。孙子的“军无辘重则亡，无粮秣则亡，无委积则亡”也间接说明了这一道理。古今中外的战争史都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军事力量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组织的人同武器装备这两种最基本的要素构成的。这两种要素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的。武器装备的生产是以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武器装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直接由经济活动获得。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便能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武器装备。而武装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同样也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一个国家平时供养和战时动员的最高军队数量，主要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也即社会技术构成的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军队的质量、精神状态和军事技术水平，包括身体素质、智力水平和战斗技能等与文化教育程度、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水平的高低以及生产力发达水平成正比。

总之，经济力对于军事实力增长的制约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违背，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一种穷兵黩武，暂时“兵盛”，“兵盛”则国力不振，国力不振则使兵力衰竭，导致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求我军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力相适应，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其次，我们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处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时，军队建设的局部矛盾必须服从主要矛盾，以使国家集中全力解决主要矛盾。这是国家建设战略的总目标。如今，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是，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军队建设还必须忍耐一段时间。

当然，协调发展不是消极等待甚至削弱军队建设，也不等于先搞经济建设，再搞军队建设，更不是说国家富强了军队就会自然而然地强大起来。科威特一度被伊拉克侵吞就是最现实的说明。我国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变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如果等到经济搞上去了，再腾出手来搞军队建设，就会使我军与发达国家军队已有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防力量就会受到严重削弱。何况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世界战争风云多变，谁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发生威胁我国安全的战争。这样，国家经济建设就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服从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我们既不能不顾国情国力，片面地搞军队现代化建设，也不能只讲服从大局而丢掉了在大局之下的积极建设，要在促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保持军队建设的稳步、持续发展，把军队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同步发展。

第二，自觉为国分忧，在军队内部寻求实现“三化”建设总目标的动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服从大局的思想这两方面都不允许我们军队有任何的依赖思想。翻开历史，历历可见屯田戍边以补不足的记载。在我军建设历史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和组织大生产，特别是在困难时期。邓小

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我们在国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挖掘军队内部潜力上，调动军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一方面，改善军队运行机制，提高军队的建设效益，向科学决策要效益，向系统管理要效益，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改革开放要效益，以便把军队建设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同时，希望军队搞好生产经营以解决军费之不足。

据此，在我军建设中必须突出重点。根据军队的根本职能，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统筹兼顾，重点发展，在兼顾全盘的基础上，主要抓好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关系军队根本性建设问题，选择花钱少、效益高的项目，选准方向，集中投资，重点突破，使之先现代化起来，尔后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实现军队建设整体的现代化。

我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我军建设的历史同样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历史。邓小平同志从历史中走过来，更看到了当前世界的改革大潮。因此，毫无疑问，改革是邓小平同志指明实现我军“三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邓小平同志为我军设计的“三化”建设总目标宏伟蓝图中，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的一些基本思想。他实事求是，绝不超越可能，也不违背规律，把“三化”建设总目标设计得合情合理；他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要求全党全军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去集中全力搞军队“三化”建设；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把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最大政治，统领全局。有人用克劳塞维茨的这样一句话来赞颂毛泽东，“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19页）在此我们用这句话来比喻邓小平同志构筑我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应该也是十分恰当的。

第四章 适应国力，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军队的战斗力是由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的科学结合构成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高度重视人的因素的同时，反复强调武器装备的重要作用。他极为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改善武器装备，把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他立足于现实可能，放眼未来战争需要，制定了发展武器装备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原则，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发展道路。

第一节 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客观制约条件

加速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巩固国防的需要，是保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平不能用祈求来取得，战争不能用迟让来制止。武器装备的优劣，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强弱。这是一条真理。但是，武器装备的发展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各个国家武器装备的发展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邓小平同志对我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过许多精辟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从而解决了新时期改善和发展武器装备许多带方向性的问题。

一、武器装备发展要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指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北京石景山学校题词》）这三个面向，不仅对教育，而且对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战争与武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战争就会对武器装备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检验军队武器装备效力的唯一标准是未来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减少在未来战争中的不必要牺牲，一定要把武器装备搞上去。然而，由于未来战争不论从特点和形式上都会产生很大变化，其破坏性、突然性、残酷性将空前增大，战争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因此武器装备的发展必须要有很强的适应性。

1. 未来战争将是一场立体战，要求武器装备总体结构要合理。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邓选》第21页）未来战争是在地面、空中、海上和水下同时展开的，甚至宇宙空间也可能会飘荡着战争的火药味。以往的战争，主要是在地面上由陆军进行的。空军和海军的主要任务也只是支援地面作战。战争往往从双方接壤地区发生，尔后逐步向纵深推进。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前方和后方是分得相当清楚的。而现代战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岛战争，空中、海上、水下及地面全面开花，整个作战期间，英军“鹞”式和“海鹞”式飞机共发射空对空导弹27枚，击中阿军飞机24架。英军还出动“火神”式远程轰炸机40架次，攻击阿军阵地。该机飞行6000余公里，依靠先进的导航设备，准确击中目标。海上动用舰船150余艘，其中包括英军临时征用的商船50余艘。双方损失舰船达27艘。很明显，现代立体战，是指战争的范围已延伸到宇宙空间，是一个多层次、复合式的立体战。早在1958年，当时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鲍尔就曾指出：“我

国现代战争理论只考虑到三维空间，但是现在应该包括四维空间。同时，从时间因素是作战因素的观点来看第四空间——宇宙空间将是决定性的空间。”（转引自 M.A 米尔施泰因等《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8 页）这是颇有预见性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超越地球，到太空中去航行、去考察、去活动已成为现实，无疑，开发太空、控制太空、争夺太空也已列入某些国家的计划。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有远见的科学家就陆续提出了近地轨道太空站的概念。1945 年，英国科学家阿瑟·克拉克提出了在地球静止轨道上放置三颗卫星覆盖全球进行通信的设想，即著名的“三星覆盖通信说”。12 年后，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随后美国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通信卫星。从苏联第一颗卫星到现在，短短 30 多年中全世界共发射各类人造卫星 3000 多颗，其中军用通信、侦察、气象卫星达 70% 以上。苏联和美国发射的最多。

世界不少国家在发展卫星的同时，积极开展载人航天的研究。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载“东方号”宇宙飞船首次登上了太空，安全返回地面，开创了人类上天的历史。从此苏、美等国争先恐后地实行一个又一个的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苏联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礼炮”号小型试验性载人航天站计划。到 1982 年 4 月，先后共发射了七座“礼炮”号航天站，其中“礼炮”7 号航天站创造了宇航史上一次载人飞行 237 天的最高纪录。为人类在太空中长期飞行奠定了基础。目前，苏联已建立了以“礼炮号”、“联盟号”、“进步号”、“和平号”为主体的载人空间体系。美国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 年 7 月 16 日，美国三名宇航员乘“阿波罗—11 号”飞船首次登月成功，并安全返回地面。从 1973 年 5 月至 1974 年 2 月，美国又成功地执行了“天空实验室”计划，先后共进行四次天空实验室——试验性航天站发射活动。美国 1972 年开始部署航天飞机计划，经过十年的努力，于 1981 年 4 月 12 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航成功，为多次重复使用航天器的研制工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据不完全统计，自加加林上天至今已进行了 110 多次载人航天飞行。参加飞行的有十多个国家的宇航员，总人数达 200 人，其中妇女有 10 人。绕地球飞行共 10 亿圈，耗费约 2 千亿美元。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宇空之战已摆到了人们的面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竞相搞卫星发射和载人航天计划，把巨资耗费在飘渺的长空，这并非无目的地在玩宇宙游戏，而是为了争夺太空，争霸世界。这样，便使未来战争将呈现出的四维空间立体战的特点。

邓小平等军委领导同志曾反复强调，武器装备是战争的重要物质条件，未来准备打什么仗，就应该重点发展什么武器装备。“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情。”（《邓选》第 20～21 页）重视武器装备总体结构，实行合理的组合，力求实现整体优化，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

未来战争的立体战特点要求武器装备总体结构要能够适应四维空间的各个方面的作战需要，并能进行有机配合。装备总体组织结构包括武器装备种类、品种、水平、规模和比例。国外很重视武器装备发展的协调配套和系统分析，强调从武器发展的总体结构上谋求综合的作战使用价值，追求装备体制上的最优化结构。其原因在于：武器装备总体结构不合理，一是会造成直

接的经济浪费。如美国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三军分管武器的发展，齐头并进，各行其是，不是从立体战、整体战考虑问题，仅 1957 年至 1959 年间，因分散研制造成型号重复和过时的武器有 30 多种，造成了 35 亿美元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空间技术、制导技术等落后于苏联的被动局面。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于是，重点抓武器装备总体结构的研究，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又如我国航空工业几十年来由于从总体考虑不够，致使试制费多花了不少钱。1958 年至 1982 年我军炮兵列入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科研项目中，正式列装的只有 26%，而中途下马或研制后不能列装的就占 70% 多，影响了装备的发展。可见，建立科学合理的武器装备体制非常重要。二是会直接导致战争失利。当然造成战争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的确实是由于武器装备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如有的有高性能的飞机，但没有性能优越的导弹，致使发挥不了威力；有的虽有良好性能的武器，但没有高度自动化指挥系统，致使关键时刻不能实施有效的指挥等。因此，科学地制定武器装备体制，对于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适应未来立体战的要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体制建设和体制改革，指出体制改革要提高到一定高度来看。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要改革，军队的体制要改革，武器装备体制也要改革，要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从未来立体战的整体效益考虑问题，全面考虑武器装备的种类、品种、水平、规模和比例，建立合理的武器装备系统，使之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2. 未来战争将是一场突袭战、电子战，要求武器装备逐步增强高技术领域的抗衡能力。

邓小平同志在 1977 年 12 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这就告诉我们，未来战争往往是突然爆发，而又很可能以突然袭击开始的。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战争以及 1991 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等，都是采取突袭的方式开始的。苏军元帅巴格拉米扬曾指出：“突然袭击总是对进攻者有利，在军事和技术的当前发展阶段，突然的作用越来越大。”（转引自 1978 年 12 月 10 日解放军报）这种实施突袭的物质条件，就在于高技术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国已研制出许多高技术武器。如：侦察卫星，能及时察明敌方各种目标的方位及行踪；通信卫星，可保障将有关情报在指定瞬间传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点；洲际导弹，攻击万里之遥的目标，只需半个小时，敌人难以防范；核潜艇，可以周游各大洋……即便是一般常规武器，也已成为实施突袭战的有力工具。诸如：先进的作战飞机，时速 2000 公里以上，作低空或超低空飞行时，对方往往只有 2~3 分钟的预警时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载重逾百吨，一次可运送全副武装的士兵 300 多名或中型坦克 2 辆，不进行空中加油即可飞行 5000 公里，时速 800 公里，十分有利于作远程兵力机动；现代火炮射速快，射程远，弹种全，火力强，且日趋自动化，“战争之神”更添“神力”。新的军事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武器的性能已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微电子学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制导武器的准确性；对新材料的研制，增强了对电子、光学和其他电子对抗措施的抗干扰能力，而且使武器和武器系统的体积减少，重量减轻。

超级大国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以及物质条件和军事技术发展都预示未来战争很可能是以突袭为主。

电子战，就是敌对双方利用电子设备或器材进行的电磁斗争。通过夺取电磁权，进而夺取并保持对地面、海上、空中的控制权。当前，电子设备几乎在所有的军事活动中起着与日俱增的作用。海湾战争中，美军等多国部队有力地实施了电子压制，进行电磁护航和干扰。1991年1月17日首次袭击前，美国海空军分别出动了E—2C、E3A、EA—6B、EF—111等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分别对预定突袭方向和数万公里的作战区进行了全方位电子侦察、强电磁干扰和压制，使伊雷达迷盲，通信中断，指挥瘫痪，处于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之境地。在未来的战场上，电子战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休止的电子干扰与反干扰的电子对抗已经加速了对整套电子战设备的研制，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敌人雷达、指挥、控制及通信系统的座标数据，然后采取措施使敌方电子设备效能降低或失败，同时保证己方电子设备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军队已陆续装备了大量先进的电子设备，以保障有效的控制与指挥。比如，运用雷达、侦察卫星和各种夜视器材获取信息，运用通信卫星、无线电台和各种有线电设备传输信息，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各种指挥仪器分析、显示信息。近年来，还出现了集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于一身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即C3I。电子设备作为各种精确制导武器的“灵魂”，更使电子技术直接成为巨大的战斗力。可以说，电子技术已渗透到现代军队的几乎所有部门。可以断言，未来战争将面临电子技术的严重挑战。海湾战争伊军失败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电子对抗能力弱。在美军突袭方向上，均实施了强电磁干扰，使伊在多国部队突袭时，指挥失灵，电信不通，雷达一片雪花。因而美国等多国部队不屑一顾，随心所欲，任意袭击，导致伊军最终失败。综合分析，表明了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战争。海湾战争就是一场空前的高科技战争，使用了大量高科技尖端武器，这些武器种类之多、技术之先进、威力之大、精度之高都是以往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这就要求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必须逐步增强高技术领域的抗衡能力。杨尚昆同志在“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讲话中指出：“军事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现代战争将不断出现新的特点，我们的认识必须随之发展和提高，改革也要紧紧跟上去，否则就会落后。”从世界近期几场现代战争看，交战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高技术的先进武器，抗争相当激烈，战争中取胜的一方，往往都占有技术上的优势，“技术差”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贝卡谷地之战中，以色列采用高技术武器，以损失1架飞机的代价，取得了击毁叙机79架，摧毁导弹基地19个的战果。锡德拉湾激战中，美国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击沉击伤利比亚舰艇5艘，炸毁飞机13架，摧毁导弹基地一座，以及其他5个重要目标的一切设施，自己仅损失1架飞机。海湾战争中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红外激光技术、隐形技术，电子干扰技术，这些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对战场的发现、控制能力，提高了破坏性，提高了远战能力，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能力，使伊军遭受巨大损失。我军目前的武器装备与先进国家比，还有一定差距，尤其在高技术领域缺乏相应的竞争能力，因此。当前应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发展大威力高精度的武器系统、自动化指挥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等装备，逐步缩小我军在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军队之间的差距，以增强未来战争中的抗衡能力。

3. 未来战争将是一场合同战，要求武器装备优先发展比较薄弱的军兵种装备。

合同战是指诸军兵种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协同作战，属于较高层次上的

战争。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邓选》第350页）就马岛海战而言，英军凭借训练有素的官兵和精良的武器，实施合同战压倒对方。在夺岛战斗中，英军各部队围绕夺占马岛这一总的目标积极作战，相互密切协同。海军，在进行海上封锁时，一面加强对空防御，以支援空军作战，同时不断以舰炮轰击阿军阵地，为地面部队登陆作战排除障碍。空军一方面加强空中巡逻，以配合海军行动，另一方面，发扬火力，压制岛上目标，以支援地面部队进攻。相反，阿根廷三军协同则不如英军。尽管阿空军战绩赫赫，终因孤掌难鸣，难挽败局，马岛战争结束不久，英军突击队司令穆尔曾在一次集会上说：“登陆次日，天刚破晓，即遭阿根廷空军狂轰滥炸。当时，我苦苦地撑着，不只一次感到快要撑不住了。阿根廷空军的英勇几乎将这次奇袭的效果全部抵销。如果阿根廷陆军再从正面捅上一刀的话，那便是我们的末日了。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来。直到今天我还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恶魔导演的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7页）此例说明，如果不提高薄弱军兵种武器装备的水平，光靠单一军兵种的武器先进，那么势必影响互相的协同，导致合同战的失败。海湾战争多国部队陆海空军武器的全面先进和陆海空军密切协同同样导致了战争胜利。徐向前元帅在《红旗》1979年第10期《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一文中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广大，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复杂。这就必然对国防建设提出各种不同要求。我国与大小霸权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界线绵长，空域海域广阔，有着多种多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各个地区部队的作战任务不同，作战对象不同，我们必须研制和生产适应各种条件下作战的武器装备。”

杨尚昆同志指出，要尽快把最急需的新型武器装备搞上去，努力改变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从未来合同战的需要和我国武器装备的现实状况看，总体上是落后的，其中尤以海空军的武器装备最为薄弱。因此，适当注重发展海空军的武器装备，改变落后状况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一是未来战争海军作用增强，海上争夺激烈。占地球表面积70%以上的海洋是海军赖以全球机动和部署的场所。根据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海军舰船可在公海享受“完全豁免权”，可跨越洲地进行全球航行和部署。因此，与其他军兵种相比，海军是平时唯一可越出自己主权范围进行军事活动的军事力量，在海湾危机时美国等海军未经批准就可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甚至波斯湾一线机动，使其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呈现出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隐蔽性以及战术上的突袭性和进攻性。我国有着漫长的海防线。海洋国土有300万平方公里，目前有三分之一被分割。南沙32个主要岛礁，有31个被南亚几国占领。我国与八国九方有海洋利益争夺，海洋周边环境大都处于紧张状态和主权争夺之中，今后围绕海洋权益将会展开激烈的斗争。二是我国海军仍然是薄弱环节。海军武器装备相对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比较大，特别是远离本土的作战能力比较弱，因此，海军在未来协同作战中将会成为易受打击的一个方面。三是海上争夺又往往伴随着空中的斗争。谁要在海上争夺中获胜，谁就不但要有有效地掌握制海权，而且要有有效地掌握制空权，两者是缺一不可。否则海军的海上活动便会陷于孤立无援。四是空中交战是未来合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空军武器装备也需更新换代，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在统盘筹划武器装备发展的基础上，应适当突出海、空军武器装备的建设，当然海、空军武器装备的发展也要有各自的侧重点，

以便进一步适应合同作战的需要。

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服从军事战略

武器装备发展虽然是直接为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方式方法服务的，然而，武器装备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如美苏两国为了争霸全球，都在竭力争夺军事上的优势，都在追求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以适应全球对抗的需要。英法国家的军事战略是地区性的防务，因而要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的防务力量，并具备一定的威慑力量。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侵略别人。我国在战略上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方针，国防建设必须服从这个方针，而不能离开它。因此，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方面——武器装备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必须服从这个方针，绝不能离开它。

武器装备是军事斗争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战略上考虑军事斗争的力量建设与使用，必然要考虑武器装备建设如何适应战略要求；军事战略与武器装备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军事战略的制定对武器装备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而武器装备的发展对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又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对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武器装备发展必须服从军事战略。

积极防御战略应包括近期战略目标和远期战略目标。近期战略目标，应是能维护和捍卫我国的主权完整，对来自任何国家侵犯我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任何行动，都有能力给予坚决还击。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武器装备的原则与霸权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霸权主义国家发展军事力量是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他们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着重发展进攻性武器，大力制造远洋作战需要的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做。我国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要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出发，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武器装备，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远期战略目标，应达到具有强大的反击能力，使任何国家不敢侵犯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从根本上制止敌人的一切侵犯可能。我们所说的强大的反击能力仍然是积极防御战略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反击能力向我们提出了适当发展核武器和其他尖端武器的要求。当然，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用于防御，形成一定的核反击力量，决不是把作战的胜利寄托在核武器上。

积极防御战略既要求发展常规武器，又要求发展核武器和尖端武器装备，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目标。因此，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军情出发，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要立足现有的基础，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技术优势，摸索自己的路子，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军武器装备得到更新，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立足现有基础，不是无所作为，要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我国的空间技术、核技术和生物技术，不少方面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空间技术，我们起步还是较早的，至今，相应的技术、生产、发射服务和地面测量通信网已大体成套，并已经开始承担外国卫星的发射业务，如1990年4月7日发射的“亚洲一号”卫星。国外一些行家认为：“中国的火箭技术达到了国际水平，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现在世界上能够准确回收卫星的，除了美苏之外，只有中国。中国太空科技在短短十几年里所取得的进步，令举世震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制定未来的空间技术发展规划，使我国这一高技术项目走在世界前列。

随着高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在实现积极防御战略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中，如何处理发展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关系呢？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是我军装备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核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适当发展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战争，从而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志在 1958 年曾指出：核武器我国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83 年 11 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有一点核武器，……这本身就是压力作用。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点报复。”“核武器我们还要发展一点，但怎么发展也还是有限的。”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核战略是防御性的。常规武器主要是用来打赢常规战争。为此，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应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适当发展有限的核武器。

目前，美苏一方面在核武器的发展上争夺压倒对方的优势，另一方面则重视高技术、高性能的常规武器的研制，以加强常规力量。在未来，虽然核大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最可能的是发生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我国未来进行反侵略战争，将主要在我国国土上打人民战争，这也决定了我们主要靠常规力量去赢得战争的胜利。目前，在我国周边及世界诸热点上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也基本上是常规战争。大量发展核武器，耗资巨大，因为我国财力有限，不可能拿出很多的经费来。所以，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适当发展核武器，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我国军事战略的要求。但是，这决不是把核武器的发展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核武器是我国国防实力和我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我国过去和今后在世界战略格局中保持有利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适当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积极防御战略得到有效地实现，以达到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

三、武器装备发展要依据国力条件

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要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国力条件，这是邓小平同志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一贯思想。邓小平同志在 1977 年 12 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要根据可能，“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弄得再好一些，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邓选》第 75 页）“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邓选》第 350 页）杨尚昆同志也指出：国防建设一定要同我们的国力相适应，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科学技术发展了，武器装备现代化才能搞上去。我们既要根据国力量力而行，又要积极地有重点地发展和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这些论述都鲜明地提出了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据国力条件。

国力是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尺度。

综合国力的测算有多种方法。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美国克莱因提出的“国力方程”，即：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其中 C 为人口和领土；E 为经济能力；M 为军事力量；S 为战略意图；W

为国家意志；Pp 为国力。

我国有关专家经过研究，认为综合国力是个开放型的动态系统，应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经济学说为思想指导，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综合国力诸构成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专家们在研究中找出了一些起着支配、控制、主导作用的宏观变量。主要包括国土、人口、资源和经济、科技、国防力量在内的“硬”参量；包括战略目标、国民凝聚力等在内的“软”参量；包括社会制度、政府素质、调整改革能力在内的“协同”参量。综合国力，也可概括为三种能力，九项要素。三种能力是指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九项要素是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安定、教育水平、军事力量、外交能力、文化、人口、国土等。邓小平同志说过，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毛泽东同志早说过：“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党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45～446 页）这就集中概括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我国 40 年来国力情况是由弱到强；稳步上升的，虽然走过的道路上曾留下一段段曲折脚印，但许多实际情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国力上升的根本因素。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尤其是 1956 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科学发展规划”得到顺利实现，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十年建设，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发展基础，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几乎跌到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加上其他因素，我国综合国力呈现下降状态，在发展座标中描绘出了曲折之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下左右同心协力，社会安定团结，经济、科技持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序上升到第六位。但某些单项指标还是比较低的。邓小平同志在《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一文中所说的：1980 年，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 250 美元左右，现在也只有 400 余美元，在世界上我们要排在一百个国家的后面。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比 1980 年翻两番，达到 1～12 万亿美元，人均 800～1000 美元，那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能排到世界第 80 多位，还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下的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综合国力已达到一定水平，但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人均拥有量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这一差距，制约着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趋势不能象超级大国那样齐头并进，全面发展，更不可能全面更新，全面赶超；也制约着我军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作出了要“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的科学决策，是十分英明的。

恩格斯曾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

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0页）列宁也曾指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列宁全集》30卷第131~132页）毛泽东同志说：“你对原子弹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5页）因此，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站在全局的高度，在深刻地阐明了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必须根据国力条件后，要求全党全军正确认识经济力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国家经济建设为大局，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88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我军现代化之所以发展较慢，正是由于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国力不强造成的。如果竭泽而渔，超越国力条件去发展武器装备，结果必然是惜指失掌，不仅经济不能发展，反过来最终影响武器装备的发展。适应国力，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是我国客观实际和我军建设客观要求所决定的。

第二节 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度复杂的先进军事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现代武器装备发展出现了综合配套、整体优化，换代周期加快、研制周期延长，科技攻尖端，费用越来越昂贵等许多新的特点。这就给我国在发展武器装备上带来了两个突出的矛盾：一是武器装备发展与我国经济底子薄弱，财力有限以及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这两者不相适应的矛盾；二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主观愿望与我国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周期长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既不能象超级大国那样不惜耗费庞大的军费，全面发展，又不能无所作为，甘居落后。而应选择一个符合我国我军实际的发展武器装备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对此提出过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原则。这些论述散见于他的著作和讲话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这一论述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是我军“三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也是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根本原则。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也只能依据本国的力量，才能取得成功，企图完全依赖外援使国家强盛起来，是不现实的。象我们这样的大国，人口众多，底子又薄，经济、文化、科技都比较落后，单靠外部力量的帮助不可能使我国富强起来，基本途径就是依

靠我国人民自力更生。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这样。中央军委多次指出，武器装备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尽快把最急需和先进武器装备搞上去。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邓选》第361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自力更生方针的体现。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武器发展原则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为我军武器装备迅速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从我国武器装备发展的历史看，始终是坚定地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由于我们遵循这一原则，使我国克服了各种困难，回击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和战争挑衅，顶住了压力，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武器装备体系。但是建国后，在武器装备是主要依靠购买和盲目地单纯仿制，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研制、自己生产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论。五十年代初期，就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思想。一种思想认为照着苏联的武器仿制就行了，因为是现成的；如果我们自己研制改进，不划算，也不一定能搞得出来，弄不好还会影响现有武器的生产。另一种思想则认为应当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自己的作战指导思想，以及地理、经济等特点，自力更生，从仿制开始，不断地改进和发展，最后达到自行研制，闯出自己的路子。其实，苏联和美国也都是根据各自的特点和战略需要来发展自己的武器装备的。何况苏联卖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他们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也还在不断研究发展之中，对于这个争论，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决定：要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改进和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从而指引我军武器装备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又有一些同志总觉得外国的武器装备先进，自己的什么都不行。他们把实现我军的现代化，主要寄托在从外国买进武器和引进技术上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要说买不起，即使我们买得起，人家也不卖。所以只能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

从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看，同样应坚定地遵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我国在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由于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证明这一原则的正确性。我国在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空间技术方面，掌握了各种轨道卫星的发射和侧控技术，取得了多次卫星发射和回收的完全成功，最近又成功地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它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国际空间技术商务领域，从而使我国卫星技术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了远程运载火箭向南太平洋发射到点，潜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等。在核技术方面：核反应堆正常运转；原子弹爆炸；氢弹试验成功；核动力潜艇服役。在电子技术方面：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试制成功；每秒20万次、500万次到亿次级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在制导技术方面：惯性制导、惯性导航，天线、红外、有线和复合制导，激光、电视、惯性加地形匹配等各种制导技术在战略、战术导弹武器系统中的应用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常规武器技术方面：自行设计、研制和生产了多种型号的军用飞机，水面舰艇、潜艇、辅助船及水中兵器，各种坦克装甲车辆，各种型号和口径的火

炮、弹药以及各种步兵轻武器系统。从而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武器装备系列。当然，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这方面还有不小差距。

通过回顾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指导原则上的探索历程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取得的经验，可以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自力更生原则是我们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

现代先进的武器装备价格昂贵，靠买是行不通的。美国五角大楼曾对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算过一笔账，他们认为，中国为了得到一种“有把握的能力”，抵御常规部队的全面入侵，需要中型坦克 3000~8600 辆，装甲运输车 8000~10000 辆，重型卡车 16000~24800 辆，具有空中优势的战斗机 200 架，战斗轰炸机 240 架，地对空导弹发射架 620 具，空对空导弹 6000 枚。总计需要耗费 410~630 亿美元。这笔账显然极不准确，许多数量庞大、极其昂贵的装备都未考虑进去。但它说明了象我们这样的大国，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买不起的。如果要购买上述列举的部分武器装备，经估计就要用去我国十年多的国防经费，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要缩小同世界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的差距，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只有从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人们记得，1982 年英阿马岛之战，平时供应阿根廷军火的西欧各国突然实行武器禁运，致使阿根廷空军的作战能力锐减，给作战行动带来了严重影响。显然，武器装备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殊商品，出口军火可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超级大国的军火贸易不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他们阶级利益、政治谋略服务的。它们通过出口武器装备的手段，力图控制和支配别国，从而推进全球战略。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武器装备靠买是不现实的，到时候是要吃亏的。

江泽民同志在七届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与军队代表议政时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绝不排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不搞关门主义。但是我们的落脚点要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上。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有智慧的，我们的原子弹、氢弹、导弹是在帝国主义封锁、困难很多的情况下搞出来的。我很喜欢毛主席的一段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就是要有这股劲。”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在当前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必要性。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武器发展原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是根据我国国情军情确定的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二、科研先行，质量第一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国家正在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邓选》第 20 页）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科研必须先行。当前无论是技术先进的军事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国防科研，坚持科研先行，抓好基础技术研究。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杨尚昆同志也指出，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科研。我们要在集中统一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攻关，缩短研制周期，把重点项目搞上去。

在武器装备发展的问题上，科研要走在前面，坚持多研制，少装备。这

是因为：第一，科研先行符合现代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武器装备发展的自身规律。当代世界上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高的军队，都高度重视科研，并坚持科研先行。当今各国武器装备发展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为此，各国都在大力加强科研队伍和不断增加科研经费。就美国而言，1988年和1989年国防科研经费分别高达437亿、443亿美元，占政府科研经费的60~70%。从海湾战争使用的武器看，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裁减陈旧、过时的武器装备，研制了大批先进武器并已装备部队。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国防科研，指出：“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邓选》第26~27页）他不但主张科研先行，而且努力贯彻科研先行的原则。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指出：“继续跟踪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国防科技自行研制的能力和水平，有重点地加强新武器装备的研制，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这就充分说明我国非常重视通过加强自行的科研，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

第二，科研先行是当代世界战争发展趋势提供的一个客观机遇。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发生大的战争，我们的武器装备发展应当是“将来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是对平时研制武器的要求，现在就是要充分利用和平的大好时机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不会发生大的战争，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科学预测。明确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防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会不会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一直为世人瞩目。一方面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这个星球造成的破坏太惨重了。人民要求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30多个国家、13亿多人口卷入，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60多个国家地区和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5000多万人丧生，直接损失在5000亿美元以上。实际数字还要大些。另一方面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的火药味依然很浓，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现在全世界约有核弹头5万余枚，当量为130亿吨TNT，世界平均每人近3吨，有人估计可将人类毁灭50次，超级大国已把军备竞赛的领域逐步扩大到了太空。此外，常规武器日甚一日地改进品种，提高质量，则更不待言了。这种竞赛一方面使战争危险性增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均势，使战争不会迅速爆发，形成一种相对和平局势。邓小平同志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改变视角和认识方法，从军备竞赛和对抗中看到了均势相抑作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现象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突破前人的既有结论，得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生大的战争的论断。由此得出，武器装备的发展应当是科研先行，围绕将来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在先进程度和质量上下功夫，充分利用和平大好时机研制和发展武器装备。

科研要先行的第三点理由是，科研先行既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又能不断满足未来战争需要。现代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快，在和平时期，如果一种新型武器研制出来就大批生产，大量装备部队，势必造成没有多久又得淘汰，那样做的结果，不仅会造成极大的人力财力浪费，而且会延续现代化的步伐。人所共知，我军武器装备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不在数量方面，而在质量上。质量是科技水平的物化形式，如果不从提高国防科技的水平入手，必然“南辕北辙”，不可能有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搞科研，少装

备，也适合我国当前财力状况，可以获得较理想的效益。六十年代，我国处于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能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便是有力的证明。相信沿着这条道路，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国防科技水平和我军的装备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定能有所缩小，而不至于继续扩大。

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科技是关键，质量也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说：“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现在的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邓选》第26页）邓小平同志又说：“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邓选》第30页）这就告诉我们质量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而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关系到产品的生命和效能，因此必须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外国历来都特别重视武器的精度质量，而不单纯考虑数量，如他们在试验核武器时，发现核武器的当量增加8倍时，毁伤值仅增加4倍，而当命中精度增加8倍时，毁伤值却增加64倍，据此他们特别重视命中精度的质量，并把它作为发展武器装备的重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武器装备质量不好，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甚至整个战争。他还强调：“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国防工办要注意这个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由于那个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头的零部件出了问题。在检查的时候，就是那个百分之零点五没有检查到。”（《邓选》第26页）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抓武器装备质量一是要把武器装备产品的质量，作为重大政策抓紧抓好；二是要从点滴细微处抓好，不放过每个零部件，做到万无一失，从而确保产品达到预期的效能。

三、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的原则

武器装备发展要突出重点，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实现军队的现代化，由于受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现状的制约，决定了我们必须科学地分配和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力量，集中财力、物力和科技力量重点发展新的武器装备。杨尚昆同志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金有限，我们不能象超级大国那样开支庞大的军费，不能不顾国家的经济条件，盲目追求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和高速度。在发展武器装备上，必须通盘考虑，科学规划。首先，必须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发展我们急需的防御性武器装备。”（《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红旗》1984年15期）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是邓小平求实精神在发展武器装备上的体现，是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确定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思想要放开，既要从我们方面考虑，也要从敌人方面考虑；既要从装备本身考虑，也要从使用装备的周围条件考虑。一般讲，凡是我们的装备上的弱点就是我们装备工作要抓的重点，凡是敌人可被我扩大和利用的弱点也应当是我们装备发展的重点。

武器装备发展要突出重点，首先是由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决定的。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在武器装备发展上，要从未来出发抓好重点，抓将来打仗时要用的又确实能用得上的装备。现代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今天看来还先进的装备，到打仗的时候，也可能已经落后了。因此，发展武器装备要改变那种老是准备几年就打起来而急急忙忙地搞一些过渡性的装备的做法。这就要求重新考虑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要从应付眼下战争，研制生产应急武器装备转向研制未来作战需要的先进武器装备。其次是由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平的现状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平决定了我们必须科学地分配和合理地使用我们有限的力量，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保证重点武器装备建设，才能取得一定成效，如果过于分散使用财力、物力，撒胡椒面，结果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办不好。

杨尚昆同志指出：武器装备发展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各军兵种可能担负的任务，在全面衡量、准确预测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关键项目，集中力量攻关。常规武器要逐步实现精良化，使我军在空战、海战和陆战中，在边境战争和对付突发事件中，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有所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有所加强。同时还要使我军有限的战略威慑力量更加有效和精干，逐步达到应有的水平。上述这些论述，充分强调了发展武器装备必须突出重点，同时指出，一要使常规武器实现精良化。主要应发展以精确制导为主的反坦克、防空、反舰及灵敏可靠的指挥、通讯和侦察系统，提高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二要相应发展战略核武器。争取在本世纪末形成一支数量有限的但可靠的更加有效的精干的核反击力量，并着眼二十一世纪，研制先进的陆基和潜射新型战略弹道导弹，还有战役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和战略预警系统。三要重视高技术研究。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武器装备发展，而且可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武器装备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就武器装备来讲，高技术的开发应着眼有利于常规武器的高技术化，力争使指挥、通信和侦察技术、自动化技术，战略预警技术以及精确制导技术产生质的飞跃，力争本世纪末有突破性进展。

四、充分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的原则

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两音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两点重要思想：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是对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78年7月、11月两次会见外宾时说过，毛泽东同志历来有两句话，就是自力更生，力争外援。毛泽东同志1960年还设想与外国合作开发我们的资源，然后用我们的产品来偿付，但那时没有条件。就是现在，我们引进外国技术也要靠自力更生，我们没有违反毛泽东同志的根本原则。二是必须完整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不搞教条化和本本主义，要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把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力争外援的思想发扬光大，才能抓住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搞好我军的武器装备建设。显然，由邓小平同志奠定基础的对外开放理论的形成既是对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力争外援”思想的发展，是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能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而要充分

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邓小平在谈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 67~68 页）这就把两者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了。

我们主张对外开放，主要是指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应该说技术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性。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一个标志。善于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技术成果为我所用，是迅速提高我国国防科技水平，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重视并做好技术引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证明，把自力更生片面理解为盲目排外，什么都靠自己干，而不知道利用世界的成果，宁愿走费时费力的路，而不愿走别人已提供的捷径，显然是愚昧的。以往在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条件下，可以在孤立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在当今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里，社会化的生产早已超出国界，国际间各种交流已成为生产各种产品本身的客观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恰恰相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即使象美国这样经济实力很强、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也还十分注意学习别国的长处，不惜以重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我国还比较落后，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加快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加快实现象征国家科技水平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就更为必要了。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20 页）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是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指出：“我国经济建设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军队建设也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要善于站在世界舞台上观察问题，善于学习外国一些好的东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武器装备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条件，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和部分先进装备，并对引进的技术注意消化吸收，做到国产化。应该看到，引进一项先进技术，往往可以缩短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差距。这样做，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我军的武器装备，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水平。

在引进先进技术问题上，还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其一，要处理好技术引进和国内研仿、借鉴的关系。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特别要大力采取措施落实研仿责任单位，保证引进的技术装备能迅速消化、吸收、改进利用、研仿借鉴和开发创新；其二，要处理好引进硬件和软件的关系。要以引进软件为主，进口少量硬件为辅为原则，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加强技术引进中的人才培训，开展技术交流以提高科技人员的政策和技术水平。以推动和加快我们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可以确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始终遵循邓小平同志制定的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沿着其指引的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

第五章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全面增强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是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选》第21页）1977年，他又一次提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1980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提出：“1975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这一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邓选》第253页）邓小平同志不仅反复强调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于教育训练的指导方针、原则和具体内容都作出了许多明确指示，并亲自过问和组织军事演习，检阅部队训练成绩，认真抓好部队教育训练的具体落实。

邓小平同志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的一系列指示及论述，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些重要指示为新时期军队教育训练指明了方向，对开创我军教育训练新局面，促进部队素质的提高和军队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

第一节 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过十年内乱，我军训练几乎到了被取消的状态，造成部队的素质严重下降。邓小平同志不论在身居逆境之时，还是在重新工作之后，都反复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这对于医治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创伤，使我军教育训练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同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和“拨乱反正”的思想和实践是一致的。

然而，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还远不仅于此，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从更深层次上提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是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的使命出发提出来的，充分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我军任务的变化，对军队素质和教育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是与他军队建设的战略环境、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全局思考分不开的。

从国际大环境讲，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世界处在一个相对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从国内情况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上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进行了战略性转变，我军工作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应急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正确轨道。

战略环境的变化，必然带动战略目标和手段的变化。新的历史条件，对部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练为战”思想也被赋予了更新的涵义和内容。总的看，对于部队教育训练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突

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效第一，作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教育训练具有极为深远的“聚能”效应。相对的和平环境，并不意味着国际阶级斗争格局的实质性变化，而是斗争力量此长彼消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军切不可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而应将之当作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良好机遇。事实上，战后形势的发展，使得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而把战略的重点放在努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以取得各方面的战略优势，来迎接下一世纪世界范围更激烈的挑战与竞争。通过教育训练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已成为各国军队和平时时期聚积能量、提高战斗力的重要突破口和中心任务。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还包括训练。不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上来加以考虑，就会在激烈的世界竞争面前，继续拉大同别国的差距，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第二，遏制战争的爆发，教育训练具有十分重要的威慑效应。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当前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原因时，考虑到了和平力量以及苏美双方武器的威慑和制约作用，使得有资格打世界战争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顾及战争的后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战争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军事力量本身对对方的威慑，具有更直接的意义，事实上，军队这一阶级斗争的工具不仅具有实施战斗的“使用价值”，而且有着震慑敌人的“威慑效应”。目前，建立强大的威慑力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已成为平时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然而，威慑作用似乎无形实有形，必须具有可信性。这种可信性取决于实战能力、用兵决心等方面。其中的关键还是要有实战能力。空洞的恫吓不能持久地起威慑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除了经济实力、武器装备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平时表现出来的训练素质以及在实战、演习中体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

第三，应付局部战争和突然事变，教育训练具有极其现实的实战效应。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战争。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被提高到了—定地位。据联合国秘书长在 1987 年日内瓦一次会议上公布，战后共发生局部战争 36 起之多，涉及到 41 个国家，550 万士兵参加，死亡 1700 万人，耗资 36 亿 4 千万美元。至于各类军事冲突，则达数千次之多。

1990 年 8 月发生的海湾危机引发的海湾战争，历时 42 天，28 个国家直接参战，牵动整个国际社会。海湾战争向全世界表明，在美苏战略利益失衡的情况下，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动荡不安之中。局部战争，起因复杂，目的有限，谁都有资格参加并取得局部优势；政治性、威慑性很强，任何小的失利都可能造成国家政治、战略上的重大损失。为此，作战有很大的坚决性，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对部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国周边的实际情况看，不仅面临着大小霸权主义的威胁，而且存在着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仅海洋方向，就面临着海上岛屿被侵占、海洋权益遭侵犯、海洋国土被分割、海上资源被掠夺的严重局面。为有效地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与完整，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尊严，必须具有随时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没有牢固的战斗队思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

第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教育训练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效应。邓小平在谈到国家经济建设时，要求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服从这个大局。他说“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1日）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不仅要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要成为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军队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往往担负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攻关、大型科研项目的配合、抢险救灾、人力和物力的突击性支援等艰巨任务。国家和人民对军队在这方面的期待，并不是一般的劳动协作，而是人民解放军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作用。除了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之外，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军地两用技术、快速反应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作风。随着科学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人民解放军将越来越发挥它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据近年来的不完全统计，军队投入这方面的劳动日近2000万个，动用机械车辆100多万台次，参加地方经济建设项目3600余项，帮助地方培训各种技术人员50多万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能不能满足党和国家在建设方面的需求，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通过教育训练加以解决。

第五、培养军事和建设人才，教育训练具有不可忽视的成才效应。军事领域，是一个人才云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谁能培养和聚集大量的人才，谁就将取得战略上的优势。这一道理，已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成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不仅考虑到了教育训练对于培养军队建设人才的重大战略意义，而且还考虑到了军队作为一个大学校应起的作用。他认为，军队担负着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每年还有上百万干部、战士转业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和平时期军队教育训练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从国家“四化”大局出发，培养军、地两用的合格人才。而且，部队的官兵服役期间，正是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部队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又是在教育训练中度过的，应当十分珍惜这一成才时机。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的。据近年来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县级以上已建立两用人才服务机构2300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80%，全国从事两用人才服务工作的人员已达4.2万人，到1988年底，全国开发使用两用人才达到203万，全国由两用人才服务机构直接兴办的经济实体计5400个，安置两用人才66万人。全国由退伍军人两用人才领办、自办和以两用人才为主体的救灾扶贫经济实体共5.5万个，其中民政福利企业6200个，近年来创产值98亿元。

综上所述，军队教育训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是在新的战略环境下，为达到我军乃至国家战略目标所采取的重要战略手段。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提出了教育训练应有的战略地位。

二、教育训练是提高部队素质的根本途径

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不仅取决于形势和任务对军队素质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教育训练这一军事实践活动的自身规律和功能决定的。

教育训练，是指军队中对军人和部队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活动。其主要作用，是全面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以

适应形势和任务对军队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从学习和实践中获得并不断积累的。军事领域，是一个专业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领域。就其内部要求来说，必须符合系统性、规范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就其外部功能来说，要服务于战争的需要。面对着各方面同样发达的活动着的人和变幻莫测的战争态势，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空间改变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军事训练必须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此外，从军旅生活方式来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流动大、交替快，整体素质是在不断传递、承接的流动过程中得到维系和发展的。由于这样一些特点，一个普通青年，即使天资很聪明，文化程度很高，踏入军旅之门后，如不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就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一支素质很高甚至一支屡建战功的英勇部队，随着形势、任务和部队成员的不断变化、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如不加强教育训练，也难以使战斗力得到巩固和发展。通过教育训练来提高部队素质，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说法。先秦军事家吴起也说：“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拿破仑认为“未经训练的队伍，只有引起麻烦。”巴顿将军曾说：“一品脱的汗，可节省一加仑的血。”恩格斯在评论法国战争时写道：“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刘伯承元帅常说：“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不能很好的用兵，犹之人没有积蓄的钱，就无钱可用。”他号召部队要把军事技术练得象用筷子挟菜一样娴熟。现代战争形式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军事领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军事技术和技能的掌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估计，目前正在研究的科学技术有90%以上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价值，高技术的发展将大大提高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加快更新换代的速度。未来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软科学的对抗；谁在这方面占有优势，谁就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战争正向着立体战、总体战、合同战方向发展，要求军事指挥员必须具有更高的指挥艺术。现代战争更加紧张激烈，对官兵素质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都必须通过训练才能达到。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邓选》第58页）

教育训练是和平时提高部队素质的主要途径。从实践论的角度讲，人们对某种技术和能力的掌握，其实践途径是多方面的。军队是战争的工具，一般说来，军事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战争实践。毛泽东同志说过：“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到。”（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诞生以来，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然而，军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绝大多数部队没有实战的机会，如何保证和不断增强部队战斗力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指出了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他不止一次地指出：“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邓选》第57页）事实上，和平时通过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素质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战争实践和训练实践，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军事实践活动，就其对掌握军事技能的作用而言，各有其能。前者如同一个严峻的考场，后者则是一个练习的靶场，用兵和练兵二者不可偏废。战争年代并非不要练兵，而是受到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只好于起来再学。即便这样，我军也还充分利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毛泽东同志曾将此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和平时期虽然失去了一些战场锻炼的机会，但只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同样能达到一定的效果。翻开军事历史，凡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的杰出人物，往往首先在训练中就崭露头角。如苏军元帅朱可夫，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因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而闻名于世。其卓越的才能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刻苦钻研军事、热衷于组织各种对抗训练和军事演习中养成的。他 26 岁担任骑兵团长时成功地组织了第一次骑兵演习，受到师长的赞许。两个月后率团参加军区演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著名的军事家图哈切夫斯基的称赞。

1941 年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主持举行的大规模战役战略演习中，充当“蓝军”的朱可夫，竟然击败了“红军”，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可以说，没有大量的对抗演习和实践锻炼，朱可夫就不可能在卫国战争中有那样精采的表演。目前，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十分重视和平时期的教育训练。苏联一位高级将领曾说：“提高训练质量和效能，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主要要求。”美军《作战纲要》1986 年版中明确指出：“训练是胜利的奠基石，它是指挥官和平时期用全部时间进行的工作，并在战时的作战地继续进行。一旦战斗之日来临，士兵和部队的战绩的好坏将取决于战前的训练。”

三、加强教育训练是全面建设部队的需要

教育训练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除了从战略环境的需要和教育训练的规律考虑之外，还看到了它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长远意义。

通过教育训练提高官兵的素质，是在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尽快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措施。部队的战斗力组成有着各种因素，但最基本的是人与武器装备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教育训练本质上是为了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技术技能等主观能动作用的，在促进人与武器的结合上具有独特的功能。正象中外的一些军事行家所说的那样，军队现代化不仅仅是购买或者研制技术更加先进的新式装备，不论部队的装备如何精良、组织如何严密，战术如何高明，如果士兵不能将这些因素在作战中加以融合体现得比敌人更好，所有这些装备、战术与编制都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实行新的训练乃是促使战术、编制、装备与士兵四者结为一体去取得胜利的有效手段。美国的少菲兹上校在评论马岛战争的《严格训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文中指出：“训练和勇敢比现代化装备更重要。”他断言：“以阿方现有的装备，只要有良好的训练，肯定会使英军陷入困境。”1986 年 4 月，在美国袭击利比亚的战争中，利比亚的武器装备，就总体上说，固然不能同美军相比，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还算较为先进，且依本土作战，军民抗战热忱也较高，理应取得较好的战果；然而外电评论说：使卡扎菲感到头痛的，还有他的军队文化水平低，训练素质差，不少武器装备严重锈蚀，部队没有夜间作战能力，飞机只能在白天气象条件好时飞行。所以，当统帅部下达航空兵迎战命令时，竟无一架飞机升空，雷达操作手不能测定美机的位置，不能识别美机发射的假雷达信号，难怪茫茫夜空，任凭美国飞机逞凶。目前，我军

的武器装备虽然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这种情况在今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中，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到了这一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加速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其力量投向很大程度上要放在教育训练、提高军队素质上。这与改善武器装备相比，花钱少，收效大，便于充分发挥我军传统的人的因素的作用，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之敌。

通过教育训练提高官兵的基本素质，是搞好军队管理工作的基础。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军队结构的不断调整发展，对军队的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好兵，这也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努力提高带兵者自身的素质。他在一次中央军委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讲过。团的干部，师的干部怎么样？不少人也不大会管理部队。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邓选》第78页）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提高管理能力，必须加强教育训练。他说，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邓选》第21页）

事实上，军队建设中许多工作都与教育训练有密切关系。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我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其中的大多数要求都必须通过教育训练，从提高人的素质人手才能真正做到。可以说，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具有牵动全局的重要作用，是和平时时期一项经常性的中心工作。确立其应有的战略地位，完全是从长计议考虑军队全面建设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

第二节 教育训练必须适应新时期军队的使命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不仅十分强调新形势下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而且根据军队所担负的使命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教育训练的具体指导方针、原则。这些方针、原则不但为保证教育训练的质量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落实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提供了保障。

一、确保军事训练的中心位置，努力实现军事上过硬

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教育训练内容的考虑包括了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以及文化学习和民用技术训练等各个方面。然而在处理教育训练内部的关系上，历来主张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全面协调地发展。在政治上合格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军事上过硬，是他始终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1975年，他首次提出要把“训练”摆到战略地位时，就是指的“军事训练”。当时他把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打赢反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指出，“如果不注意军事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

1980年3月12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到这一问题时，他十分

明确地指出，因为不打仗，部队的“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从其他大量的有关教育训练的讲话和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军事训练及其军事素质的提高，一直是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同他对我军军事工作的基本任务的思考分不开的。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基本使命应当是，保持战略防御的总体稳定，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防范国内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定，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定稳定的环境。为此，必须使部队努力做到：战斗队思想牢固，战备工作落实，军事技术精湛，战役战术灵活，组织纪律严明，战斗作风顽强，保证一声令下，开得起，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能圆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通过军事训练，努力提高军事素质。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战斗力标准”的观点，为理顺军、政关系指明了方向。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部队中的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一度被弄得混乱不堪。他们把所谓“突出政治”还是“突出军事”，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部队建设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思想阴影笼罩着一些同志的头脑。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同志在认识上仍然难以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军、政关系上争论不休，往往一强调政治建设就认为军事工作要“让一让”，一强调军事工作又认为政治工作要“放一放”，严重影响着教育训练乃至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事实上，军事和政治，是部队建设中两个基本的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政治上“合格”的极端重要性。他曾说过：在今天的工作中不了解政治，仅仅知道军事是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的。主张要“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邓选》第21页）但邓小平同志同时认为，军队毕竟是一个武装集团，必须以“军”为主。政治上合格和军事上过硬，应当在战斗力提高上达到辩证的统一。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始终是军队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军事训练在部队中的中心位置。“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统一于战斗力标准，统一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职能，统一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实证明，作为一级党委，如果不抓好政治建设，一旦部队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同样，如果不抓好军事工作，关键时刻不过硬，就完不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也要犯历史性错误。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训练中要坚持以“军”为主，全面发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教育训练的自身规律。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这给军事训练提供了方向和动力；而通过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完成各项任务的本领，这就为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实践领域和检验标准。军事训练，不仅是练技术战术，而且练思想、练作风，有力地促进部队的政治建设、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大量实践证明，军事训练是部队和平时最大量、最经常、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不把这个主要工作抓好，部队就没有朝气，甚至漏洞百出。“军训归位全盘活，军训错位满盘输。”“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练武不精，不算合格兵。”只有在保证军事训练

中心地位的前提下，适度安排好部队的文化学习和民用技术训练，才能使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和发展，真正体现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军队搞得生动活泼些”的精神。

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军教育训练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军事训练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在打牢基础的情况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政治教育也逐步规范化，为培养政治上合格的军人提供了保证；科学文化学习为改善部队文化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一定的民用技术训练，有力地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消除了官兵的一些后顾之忧。

二、以干部训练为重点，把教育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教育训练的对象上，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军官的训练。强调要以干部为重点，并以此为突破口，把全军的教育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强调以干部训练为重点，邓小平同志首先是出于对战争形式和我军任务变化的考虑。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邓选》第21页）在1977年一次军委全体会议上又一次谈到：“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世界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各国的武器装备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逐步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地面、空中、海上一齐展开，前后方差别很小，指挥、通信、控制、侦察手段进一步现代化。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不努力提高干部的现代战争知识水平和组织现代作战指挥能力，就无法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保卫祖国、抵御外来侵略的神圣使命。

强调以干部为重点，邓小平同志还出于对干部在军队建设中地位作用的考虑。军官担负着领导、管理和指挥部队的任务，是部队战斗力得以维系的主要依靠力量。加之其较战士服役期长，因此对部队的传统作风起着传、帮、带的作用。干部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战士的素质和整个军队素质。保持和建设一支素质很高的干部队伍，是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了我军干部队伍的现状，充分看到了干部训练的迫切性。他多次指出：“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邓选》第58页）他主张，抓部队，首先要从抓干部人手。

邓小平同志对干部训练的思考不仅限于军队建设，还同时考虑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他在1977年一次军委全会上指出：

“我们军队有些干部到地方不大受欢迎，也确实不象过去那样顶用。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有几十万干部要转业……。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呢？办法就是

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在教育训练上要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这里，邓小平同志是把军队干部当作党和国家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来统筹考虑的。军队干部的素质如何，不仅对于军队建设，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四化”大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调以干部训练为重点，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干部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培养的体现。他一贯重视干部的红与专的结合，强调干部的工作能力。他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大少……。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他列举说，“在座的好多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同志，哪一个不专于军事？你不懂打仗就不行。”“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在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空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邓选》第226~228页）教育训练以干部为重点，是邓小平同志历来对干部从严要求、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的反映，对我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立足现代战争，努力增强部队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

早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就根据我军新军种的建立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及趋势明确提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1952年7月1日）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军在五十年代曾掀起过大规模的正规化训练热潮，使我军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未能得到始终一贯地贯彻。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处在一种临战应急状态，训练方法局限在“摸、爬、滚、打”、“苦练二百米硬功夫”的低层次循环之中。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合成训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邓小平同志根据对现代战争特点的分析，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的思想，在恢复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同时，把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提高到了重要位置。早在1975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了现代合成军队作战对指挥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不注意，在现代战争中就要“相当倒霉”。

1980年，他又说：“平时部队的训练，大家也还是在抓，确实也需要抓紧。但是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邓选》第253~254页）邓小平同志为了提高部队合成训练效果，提出了编合成军的构想，“就是逐步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9月，就亲自检阅华北某地部队的合同作战演习。9月19日在对演习部队讲话时指出：“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

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这次讲话中，他向全军发出了号召：“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训练思想是完全符合现代战争发展和我军建设需要的。事实上，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战争形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开始向立体化方向发展。战后作为当代武器三大支柱的远程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迅速发展，已把战争的规模和战区的方位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世界各国都普遍强调发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总体威力。第四次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已充分显示了现代战争的这一特点。我们无论是从长远考虑应付大规模反侵略战争，还是立足当前，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变，都必须具有协同作战的能力。建国以来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各军兵种的相继建立，为合成训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流血的“反馈”也呼唤我军必须迅速合成，1985年我军建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集团军的出现使我军合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从“貌合”到“神合”还需要经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这些，都需要加强我军的协同和合成训练。能否突破训练中的这一关，某种意义上说，是衡量我军是否真正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进的重要标志。

遵照邓小平同志和军委的指示，从1979年到1989年，以提高部队合成作战能力为主旋律的训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陆军部队从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到战役训练，新的内容体系初步形成，探索了一条组织简便、经济节约、训练有效、符合实战的训练方法，检验性演习已成为部队年度例行演习的重要形式，战役和合同战术训练质量，有了新的提高。海军部队全训部队合格舰艇长1988年比1979年增长7.9倍，一类舰艇保持数在大幅度增长，联合机动编队远航训练已发展到远海多兵种合同训练的水平，1979年至1988年间的远航次数，比过去的29年增长15倍多，在浩瀚的太平洋、印度洋和日本海都留下了中国人民海军的航迹。空军部队的训练走出了按战斗全过程组织合同战术训练的路子，合同战术演习的次数在增加，规模在扩大，标志战斗力水平的航空兵甲类战斗团大量增加，达到四种气象训练水平的飞行员和四种气象指挥人员比10年前增长了近一倍，严重飞行事故的万时率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第二炮兵部队优秀发射营及优秀指挥员比例不断上升，各型导弹发射成功率达90%以上，命中率达99%，部队训练突出了以发射营为主体的合成训练和以发射营长为中心的组织指挥训练，开展复杂条件下的适应性和机动训练、合成训练的质量有明显提高。我军初步摆脱了低层次的循环状态，向适应现代战争的高层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加强院校训练，努力培养部队需要的合格人才

在教育训练的形式上，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主张部队本身的“苦学苦练”，另一方面十分强调通过办院校的方式进行。把院校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战略重点。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针对政治干部较为薄弱的现状，特别指出：“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也可以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

办政治学校。”“还有，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都要恢复起来，如果不够，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并。”对于如何办学，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邓选》第58—59页）对于学校的层次和规模，邓小平同志还作了如下构想：“学校有各级的：高级，中级，初级。……海军、空军也有高级的学校，各特种兵、技术兵种也有高级的学校；还有中级的、初级的。一个师有教导队，训练班长和排干部。大军区训练营连干部。高级学校训练团以上的干部。”他还对办学准备作了要求，指出，一要考虑好办什么学校和选好校址；二要精选好办学的干部和教师；三是要统一教材；四要选好教员。他要求通过学校推荐的干部，“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邓选》第60页）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对军队院校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我军院校教育，首先是由于军队院校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最为严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回顾我军的院校建设，曾对军队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军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院校教育，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创办了红军第一个教导队，后改编为红军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先后举办八期，并在各战略区设立12所分校，为我军培养出10万余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建国后，从1951年到1953年，共建立各级各类院校107所，1958年发展到160余所，后经精简，到文化大革命前还有125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军队建设人才，加快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步伐。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失误以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军院校建设受到了严重挫折。十年动乱，院校被砍去三分之二，到六十年代末只剩下43所。教学设施遭到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大批教学骨干受到了打击和批判，致使我军的教育训练水平急剧下降。邓小平同志对院校工作的重视，是肃清林彪、“四人帮”余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邓小平同志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到1981年，院校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秩序，院校总数达到适应培训干部的要求。与之同时，军队院校进行了体制和教学改革，初步理顺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改善了中、高等两关专业技术院校的系科结构。并适应实行军士制度的需要，新办了一些士官学校。

1986年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力争在本世纪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办好一定数量的高水平院校，培养出大批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邓小平同志重视院校建设，这是院校在教育训练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院校训练的对象主要以干部为主，是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场所、有的被形象地誉为“将军的摇篮”。院校教育具有与其他训练途径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性，能对军事指挥和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心理素质等进行系统化、条理化的组合和教育,从而保证军事人才的“后劲”;二是稳定性,能按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定时定量地培养和投放人才;三是延续性,能保证军事人才的层次结构,通过“实践——住校——再实践——再住校——再实践”的循环过程,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四是规范性,能按需要严格施教,确保部队作战、管理、政治工作及技术工作的科学性。由于它在教育训练乃至整个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倾注于院校建设之中。许多著名的将领如巴顿、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朱可夫等,都毕业于军事院校。苏军目前有院校180余所,平均每24000名官兵一所,每年可培训6万名高质量的军官。在苏军已故的50名元帅中有46名具有军事院校学历,平均每人住校达2.8次。美军现有军校130余所,平均每15000名官兵一所。英军86所,平均3900名官兵一所。法军168所,平均3400名官兵一所。西德86所,平均5000名官兵一所。日军33所,平均8200名官兵一所。印军共57所,平均20000名官兵一所。以色列14所,平均10000名官兵一所。外军不仅院校数量多,而且院校人数占总兵力比例也大。如美军约占17%,法军占14%。按现役兵力平均,目前各国军事院校在校人数一般在5000—20000人之间,在校训练人数一般占现役兵力的10%左右,战时动员训练能力大体为平时训练能力的两倍。

邓小平同志重视军事院校建设,还与现代战争对军队官兵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有关。他不止一次地谈到“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邓选》第253页)现代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要求官兵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军事领域高技术广泛运用,要求军人具有厚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较宽的知识面;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更加复杂,要求指挥员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组织指挥才能;战争的紧张、激烈程度日趋增强,要求指战员具有良好的气质和强健的体魄。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缩短,军事专业纵横方向的分工越来越细,军事人才的复合型程度越来越高,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越来越快。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要求院校教育训练提供更多的知识和人才。特别是在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的情况下,院校教育训练对于加速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军院校教育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据总政有关部门介绍,1980年,我军各级各类干部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0%,甚至有部分军官不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经院校正规培训的就更低了。从1980年到1989年,军官院校受训率由20%提高到了67%。军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不仅对促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的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后劲和基础。

第三节 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应“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工作的具体落实。他不仅提出了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教育训练的具体方针、原则,而且十分强调要“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这就是说,要建立、健全教育训练的法规,把教育训

练的地位和有长期价值的成功做法“制度化”，这样才能使教育训练的地位更加巩固和稳定。

制度是根据目标和要求所制定的带有恒定性的规定。军队活动比起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活动更需要正规化、标准化和整体化。

在训练领域，完善的法规和制度，既是严格领导和管理、严格要求和训练的依据，也是军人训练的行为准则；是提高教育训练质量的可靠保证，也是教育训练内在规律和特点的反映。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美国陆军制定的规程就有 9000 种之多。法军部队各种野战条令有 300 余种。许多国家的军官和士兵入伍后，都要接受法规教育，制定各种手册，形成了一系列规范训练的法规体系。近十年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组织下，我军为保证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恢复、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制度。归结起来主要有：

一、明确规定以军事训练为主体的教育训练作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

1987 年，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要妥善处理部队各项工作的关系，把教育训练作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好。教育训练要以军事训练为重点，使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对此，军委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军政领导干部，都要以主要精力抓好教育训练，从思想上、工作安排上、物质保障上确保这一中心工作的具体落实。针对一些单位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观念和不良做法，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教育训练同其他工作的关系，切实把教育训练作为经常性中心工作，不得任意冲击和干扰；二是教育训练内部的关系，在“军”、“政”、“文”、“民”训练中突出军事训练这个重点，不得随意转移重点，主次不分。这样，就从制度上确保了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防止抓什么就喊什么重要的主观随意性，便于综合调配力量，使这项工作得到真正的落实。

二、确立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教育训练需要的正规化体制

训练体制是军队在教育训练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的划分方面普遍执行的带有稳定性的规定和机制。

1985 年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变后，教育训练体制也相应作出了一些改革。目前我军的教育训练主要实行部队教育训练、院校教育训练和预备役教育训练“三元”体制。

部队教育训练是教育训练的主要形式。在军事训练上，主要围绕单个人员训练、分队战术训练、合同战术训练和战役训练四个环节，建立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训练体制。全军部队训练分全训、半训、短训三种类型。按总参谋部的规定，“全训”是指“以师（旅）为单位计算，参训连队和连队参训率均达到 80% 以上，完成规定的训练时间和内容，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半训”是指“以师（旅）为单位计算，参训连队 50% 以上，连队参训率 80% 以上，完成规定的训练时间和内容”“短训”是指“全年军事训练不少于 30 天，重点抓好干部、骨干训练，为部队临战扩编打基础。”另外，还规定“海军舰艇部队，按战备执勤、集中训练和厂修等不同情况，区分为一、二、三类舰艇训练。空军航空兵部队按新老飞行员的不同要求，区分为

训练团和战斗团的训练。第二炮兵，按武器装备和阵地配套等情况，区分为甲乙两种导弹旅、装检团和保障部（分）队训练”。明确规定陆军甲级师、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战略导弹和地空导弹部队每年必须全训。“因特殊情况不能全训时，须报总参谋部批准。”全军对单个人员训练、分队战术训练，合同战术训练和战役训练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方法，也作出了相应的改革和规定。如在单个人员训练上，改变了过去新兵先补后训的做法，要求用4~5个月时间对新兵集中训练后补入部队。在合同战术训练上，规定了首长、机关每年的应用训练时间，其中演习不得少于30天等。此外，对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和民用技术训练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院校教育训练是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的一项教育训练形式。经过精简整编，全军确立了指挥院校、政治院校、后勤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四大类型。指挥、政治、后勤院校中分别培训初、中、高级军官；专业技术院校分中、高等两类，培训中、高级技术和医务军官。并实行以培训为主，培训和轮训相结合的制度。

对院校的规格、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随着院校体制的正规化，在干部的提升和使用上也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如士兵（地方高中毕业生）一般须经初级院校培训才能晋升为军官；晋升为团职军官，必须经过中级指挥院校的培训或轮训；师以上指挥员必须经过高级指挥院校的培训。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军官本级指挥能力的逐步提高。

预备役教育训练是教育训练的一种特定形式，专指对预备役军官和预备役士兵实施的训练。预备役军官训练，采用参加预备役师、大学生军事训练和服预备役期间训练三种方式进行。其中参加预备役师每年集中一个月时间，由地方人武部组织实施；规定预备役军官在服预备役期间，必须参加3~6个月的军事训练。预备役士兵的训练，1984年颁发了新的兵役法，将民兵和预备役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规定预备役士兵的军事训练，主要在民兵组织中进行。并规定，预备役（基干民兵）未服过现役的要进行30~40天的军事训练，专业技术民兵可适当延长；服过现役或已受过军训的进行20~30天的军事训练。并要求定期与现役部队进行合练，以保证和提高作战能力。

三、建立健全了适合我军特点的教育训练的法规制度

首先，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我军建立了以军事训练为重点，包括政治教育、科学文化学习和民用技术训练在内教育训练体系。

在军事训练上，为了确保应有的地位和质量，在原来各军兵种训练条令、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了训练大纲。从1986年开始陆续颁发了陆军军事训练大纲，包括了新兵训练、分队战术训练和合同战术训练三大部分。各军、兵种也相应颁发了专业训练大纲，从而标志着我军军事训练内容体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军军事训练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技术、战术、战役，专业、共同科目、理论，心理训练以及军事演习等方面。

在政治教育上，根据1982年初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的要使部队的政治教育向规范化、系统化方向迈进一步的要求，1982年12月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试行本），对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教育的目标、内容和要求，教育的实施以及时间分配、基本

原则和方法，教育的制度，任教人员的分工和培训，各级领导组织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责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军队院校的政治教学也进一步规范。

1981年，总政治部宣传部颁发了《军队政治工作教学大纲》。1985年1月，根据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加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修订，供高、中级指挥院校试用。《军队政治工作学》作为国家二级学科，正式列入国家学科体系。

科学文化学习方面，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于1978年底向全军发出了《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了教育训练。为贯彻党的“十二大”关于发展教育和科学是实现“四化”的战略重点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精神，总政治部对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水平制定了规划和提出了要求。

民用技术训练是培养两用人才的一项重大措施。从1985年始，南京军区某师、海军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等陆续在教育训练内容、方式、方法上进行了大胆探索。

1986年5月，总政治部在南京军区某师召开全军性的“军地两用人才教育训练现场会”。会后，中央军委于1986年8月1日发文推广步兵某师军地两用人才教育训练的经验，指出这是把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经常化、制度化的有效措施，要求全军认真贯彻执行。此后，各军区、军种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军政一把手或其他常委担任组长，具体指导实施。

198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适应了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反映了官兵好学上进、渴望成才的要求，对军队、对人民都有利。”并提出了“普及、坚持、提高”的六字方针。要求各部队要建立培养两用人才基地，严格考试制度，并协同地方政府搞好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

其次，建立健全了若干保证教育训练任务完成的具体管理法规与制度。

为确保教育训练秩序，我军几年来陆续制定，修订了若干教育训练规章制度，包括“三大条令”，有关训练条令、条例，各种考核标准以及各种教令。此外，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管理制度，如训练计划制度——规定各级主管训练的部门，在开训前必须按上级训练规划，指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对训练对象、层次、内容、方法作出规定；请示制度——规定下级在组织实施训练计划中如需作较大变更，必须经请示上级并获准后方可实施；报告制度——规定所属部队在训练中须定期或随机向上报告或提供本单位的训练进度、质量、经验和教训等情况；会议制度——规定要定期召开各种训练会议，如训练形势分析会、训练质量讲评会等，及时掌握部队训练信息，总结经验，揭示矛盾，不断调整训练任务；教学制度——实行按级任教，上级教下级，一级抓一级，上级对下级既有指挥权，又有训练任务，分层保证质量；考核制度——规定每个训练课题结束后由团组织对所属分队进行验收，每个训练阶段结束后由军区或集团军对军、师两级进行考核验收，年度训练结束后，均应进行全面按级考核，不及格科目要组织补训、补考；统计登记制度——规定对训练内容、人员、时间、效果的落实情况，指定专人负责及时准确地进行登记统计，在训练质量进行考评后，对受训者建立必要的

训练档案；安全保密制度——为防范行政责任事故和泄密事故，对训练安全和保密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奖惩制度——对训练成绩突出的个人或集体，按规定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没有完成训练任务、虚报训练成绩，训练中发生严重事故和训练保障浪费、损失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并追究所在单位主官的领导责任等。

上述各项制度的完善、健全与制定，对确保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使教育训练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 搞好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科学的体制、编制

八十年代初，我军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于 1980 年、1982 年、1985 年连续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特别是 1985 年，军队员额减少 100 万，相应改革军队的体制、编制和一些制度，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我军建设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我军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节 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的客观依据

体制、编制是军队组合的基本形式。任何军队都有一定的体制、编制。体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结构和等级权限。编制是指各级、各部门的具体编成。一般说来，军队的体制、编制受到国家政治制度、国家军事战略、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武器装备、地理环境、民族传统以及敌国情况、军队的使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队的规模和国家军事实力。

我军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是军委和邓小平同志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我军建设需要出发，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

一、国际上相对和平的环境，为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是战争的工具。战时全力以赴对敌作战，抵御外来侵略，以暴力完成国家赋予的政治任务，夺取战争的胜利；平时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神圣使命。一般说来，军队在战时都维持着较大的编制和相当的数量，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一旦战争结束，特别是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时，就需要精简军队，缩小编制，转入平时建设的轨道，以适应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是军队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如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为了抵抗外国武装干涉，将正规军从 15 万扩大到 520 万。到 1924 年，列宁认为国际形势出现了相对均势，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国内要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便决定将正规军从 500 多万减为 56 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人数成倍增加，达到 1100 多万，但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就开始精简，减为 280 多万。美军在越南战争之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到七十年代中期，共裁减军队员额 142 万。

我军这次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从国际斗争的全局考虑作出的果断决策，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必然结果。他多次指出，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并对此作了分析，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已作了专门阐述，这里不再赘述。邓小平同志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符合国际斗争形势的客观实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种力量的此

长彼消，目前虽然战争因素仍然存在，但总体上说，和平与发展是主题。这一发展趋势使得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以及相应的内外政策。军队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对军队的体制编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相对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的工作重点都有所转移，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成为谋求的主要目标；压缩军队编制、提倡“质量建军”，摆到了重要位置。苏联自八十年代后，明确提出了“质量建军”的方针。认为，“无论是在技术装备和军事科学方面，还是在武装力量的编成方面，都应主要以质量来保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国民经济的牵制，为从长计议提高国家实力，以迎接下世纪世界范围内更激烈的竞争，提出了“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主张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

1985年10月2日，他在巴黎爱丽舍宫宴会上讲话，提出了要“把军事实力限制在适当范围内”的控制军队员额的主张。

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大会议上宣布苏联将在今后两年内裁军50万，同时裁减大量的飞机、坦克、火炮等。美国也强调，宁要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力量，也不要一支“中空”的军队，布什政府执政后，进一步调整了建军方针，突出强调了压缩数量、提高质量，再次宣布将裁减军队员额，决定在1990年度裁减16800人，1991年度裁减14000人。东欧，西欧的裁军幅度虽然不大，但一直都在进行。对于美苏两家裁军计划能否真正实现，裁减员额是否出于别的什么动机固当别论；但根据和平时期国家致力于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的战略需要调整军队建设特别是体制、编制这一点，是符合规律和可信的。

第二，战后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经济实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已经或正在不断改进，为军队体制、编制的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军队体制、编制的直接功能是使人与武器装备获得最佳的结合。体制、编制应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是军队建设的内在需要。马克思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每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在军队建设历史上，火炮、火枪的出现和大量装备部队，曾引起军队体制、编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力冶炼、化工，特别是机械加工工业的发展，为军队提供了大量新型武器装备，军队体制、编制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核技术的突破以及相关技术的解决，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相继诞生，使军队体制结构又一次出现新的变化。战后国际范围的技术革命，为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不但增加了“战略火箭部队”、“联合航天司令部”、“电子战部队”等，而且军队中常规武器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军队结构中的技术群体越来越多，细部结构不断调整。当前，减少一般部队，增强技术分队；削减地面部队，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缩小单一兵种编制，扩大合成部队建制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建设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和体制、编制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三，和平环境下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提高到了重要地位，要求军队的体制、编制更能适应灵

活、高效、多功能的战斗发展需要。战后局势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局部战争成为谋取本国利益、达到有限目的的主要方式。局部战争起因复杂，政治性、策略性很强，谁都有资格参加并可能因局部优势而取胜。这便给军队建设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美国随着“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的确立，正以“外科手术式”的速决战术在全球各地伺机夺取局部利益，推行强权政治，与苏联进行战略争夺。苏联也试图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面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新形式和地区性霸权主义挑起的战争以及历史遗留的各种纷争，如何在骤然临之的事变和战争面前，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已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关注的一个问题，改革军队体制编制，搞好平战结合、精兵合成，既为大战作准备，又能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变，成为考虑军队体制、编制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四.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为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思考、决策、论证和实践条件，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思想的变化，军队使命和任务的变更等，虽然对军队体制、编制改革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客观依据，但新的体制、编制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作保证。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制编制，需要有一个思考、决策过程；新的体制、编制是否适应部队战斗力提高的要求，有一个试验和论证过程；即便是再好的体制、编制，部队也还有一个熟悉和适应过程。由于体制、编制涉及到部队的建制和人员的变动，也会引起思想和社会心理的波动，这都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当然，并不是说战争时期就绝对不可以进行军队体制、编制的改革，但一般来说，应放在和平时期进行，并在战争到来之前，通过军队训练活动加以检验，使之真正适应作战的要求。如果在战争中或临战前进行大规模的体制编制调整，就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苏德战争爆发时，苏军正处于体制、编制的大调整中，虽然列编了一些机械化部队，但由于装备不济和缺乏训练，这些部队在战争初期大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正是鉴于以上的考虑，邓小平同志认为，为了加速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当前难得的和平环境，精简整编，把体制、编制搞好。把部队减到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并与我国地位相称的数量。他说：“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

二、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革是全国机构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军精简整编，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还有着一定的国内背景。军队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成分，其体制、编制及有关制度的改革，同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制约和影响。

从全国范围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提到了日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迈出了第一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对国务院领导成员作了较大变动。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0年8月召开，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有关问题。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的弊端，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

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选》第 287 页）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本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选》第 293 页）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到了机构改革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号召全党要以革命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

1982 年 1 月 13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的讲话中郑重其事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邓选》第 351 页）邓小平同志建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精简方案，同时指出：“军队正在考虑，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邓选》第 354 页）

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决策，1982 年初开始，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开始顺利实施。第一阶段工作，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的办公机构已由 100 个裁并为 60 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了三分之一左右。仅据 38 个部委的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 6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 32%，平均年龄下降了 3 岁。国务院本身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副总理由 13 人减少到 2 人，新设国务委员 10 人，改善和加强了国务院的日常领导。党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 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 17.3%，各部委正副职减少 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 16%，平均年龄下降了 4 岁。机构改革作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依靠自身力量，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改革，完全能克服各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弊端和缺陷而不断得到发展、健全和完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重要表现。

军队的体制改革是全国党、政、军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军现状，经过长时期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决定的。

1980 年精简整编时，军委领导同志就考虑到进行编制体制改革。以后，总部向各大单位下达了征求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过各种体制改革的设想。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方案。在 1982 年 7 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机构改革，我们走了第一步，开了个头。党政先行了点，军队后了一点。总的来说，搞得比较顺利。军队经过这个会议，在座的同志思想认识一致了，大家都同意了，这就好办了。现在看，可能第一步目标的完成，军队还会快一些。因为军队的特点是，一行动起来就快。”（《邓选》第 364 页）

由上可知，邓小平同志对军队精简整编，是同全国党政机构改革、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是全局行动下的一个局部。这一方面是由于党、

政、军的工作同属上层建筑，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在机构、体制上有着许多共同性的效能和现实弊端，需要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军队还具有较为单纯和“一行动起来就快”的特点，在这方面可以与党，政机构的深入改革。互为借鉴和补充。

三、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

军队的精简整编、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除了国际相对和平环境和国内体制改革、经济建设的需要外，更重要的还是军队建设的自身需要和规律决定的。

一般说来，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一是武器装备，二是掌握武器装备的人，三是把人组织起来，把人和武器装备起来的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的水平和人的素质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础，体制、编制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组织形式。按照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结构决定功能。一定的物质结构，采取不同的组织排列方式，所形成的系统功能是不同的。军队的特殊使命和任务决定，它必须具有高效能的运转机制。这种高效能的运转机制所需要的结构合理、相互关系适当、工作方式先进等条件，正是科学的体制编制为之提供的。再说，武器装备的更新要靠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素质要靠一定的教育训练来增强，这两方面的发展都是渐进而较缓慢的，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较多。而体制、编制的发展，尽管需要以武器装备和人的素质为前提和基础，比较起来，它却可以按照军队在不同时期建设的要求，通过调整、改革，较快地实现，从而使军队战斗力在短时期内发生飞跃。在一定的武器装备和人的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体制、编制的改革，实现各方面的最佳组合，有效地获得现阶段军队战斗力的最大值。反之，则会造成人和武器装备的浪费。在和平时期军费压缩的情况下，把体制、编制的改革作为突破口，走以结构谋功能的发展道路，不仅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选择，而且可以说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一军队改革根本目的的一条捷径。战后世界各先进国家在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都把完善军队的体制、编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苏军在七十年代摒弃了赫鲁晓夫时代片面发展战略导弹部队的做法，执行了一条各军兵种协调一致按比例发展的方针，仅陆军师一级编制就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改编，同时注意保持一定的简编部队，建立了良好的预备役制度。美军不仅一直重视精简机构，改善国防机制，调整分工，注重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不断根据装备和作战需要，组建新的部队，加强军一级的作战能力，对八十年代战区以下陆军部队的作战体制、后勤支援体制、指挥控制体制等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试验和验收，日军则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一直贯彻“少而精”的指导方针，编制上重视军队的干部化，增加军官和士官数量，军官和军士占总兵力的60%强，因此，具有随时可以扩充的功能。

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国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突出表现在，国防开支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和军队数量的控制上时常出现过大的起伏与波动，影响了军队的组织指挥、武器装备的发展、教育训练的进行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影响了我军现代化的进程和战斗力的提高。

建国初期，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军队数量比较大，军费开支比较高，

正规军人数一度达到 611 万，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曾高达 42.9 %。

朝鲜战争停战以后，随着大规模军事斗争的结束，我军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党中央及时确定了降低军政费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遵照这一方针，从 1953 年至 1958 年我军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国防军员额降至 237 万。

1955 年到 1961 年，国防费用比重降至 15.39%，最低年份仅为 8.87%。这期间，由于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国防建设起到了奠基、保障作用，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但是从 1963 年起，由于种种原因，军队规模又开始扩大，军费开支比例逐年上升。到 1965 年，军队员额已逾 500 万。到 1975 年竟达 661 万，相当于美苏军队数量之和。从 1963 年到 1972 年的十年间，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年平均达 21%，出现了与国家经济建设比例失调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 1978 年。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军队建设问题成堆，军队战斗力下降。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

（《邓选》第 1 页）他在分析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时，归结了“肿”、“散”、“骄”、“奢”、“情”五个字，认为军队要整顿，首先应“消肿”。

1980 年 3 月 12 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提到，军队的问题，主要有四个，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邓选》第 248 页）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通过“消肿”与建立合理的体制、编制，解决军队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效率不高等弊端，切实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节 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同志不仅高瞻远瞩，适时地作出了精简整编、裁军百万的伟大战略决策，而且提出了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的一系列方针、原则。这些方针、原则深刻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不仅对指导和落实我军的精简整编工作，而且对于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一、精兵的原则

“消肿”，把部队搞精干，这是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精简整编、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精干，具体说，就是要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先进军事思想和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聪明的指挥员、战斗员；要有适应于各种条件下作战的精良的武器装备；要有耳聪目明、

反应灵敏、效率很高的精干的指挥机构。这就要使三百万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把锋利的剑，成为打不烂、拖不垮的精锐之师。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减少员额一百万，并结合体制、编制改革，撤销合并一些部队、机关，调整机构设置，调整官兵比例，改进部队编成，建立科学制度，理顺工作关系，调整军事布局等，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决策，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85年6月16日一则外电援引一位外国驻北京武官的评论说：“他们的想法是要让未来的敌人一听到人民解放军的名字就心惊胆战，而不敢窃窃发笑。”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精兵原则首先是出于对军队建设的内在需要的考虑。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们的肿，主要在高层，第一是三总部，我记得有一次讲过，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内部版第114页）兵贵精而不在多，这是自古以来的治军之道。历史经验证明、战争中力量的对比，不单是表现在兵员和武器的数量上，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人和武器装备质量上。坚兵利器，方能“百战不殆”。早在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党实行精兵简政时，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句话：“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9页）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那次精兵简政的结果，军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现代战争的发展对部队的组织指挥、行动速度、应变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顾战争特点和武器装备的要求，抱着“人多即胜”的陈旧观念来主观地确定兵员定额，势必造成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牵制、力量内耗，最终导致单个兵员力量相加的总和小于整个军队系统所应有的能量。不仅造成有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且还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邓小平同志主张，首先要把人减下来。“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邓选》第249页）同时，建立恰当的人员编制。他认为，“消肿”与体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部队搞精干，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是十分英明的抉择。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精兵原则还出于对国家大局和军队长远建设的考虑。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他还说，“苏联为什么不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军队多，军费开支大。它把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于军费开支。我们的军费开支数目不算大，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负担。……象我们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苏、美以外，其他国家都养不起，法国、西德都养不起。西德面对苏联导弹，而且首先是在它那个正面，它只有四、五十万军队。法国的导弹、原子弹比我们还多一点，也只有五十多万军队。”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员额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关系、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的分析，切中我军多年来在低层次上徘徊的要害，反映了军队与国民经济、军队内部人与武器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九五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

一。”邓小平同志的精兵利器、富国强兵的原则，是对毛泽东建国建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综观当前国际上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通过改革和建立科学、合理的体制、编制，走精兵利器之路，几乎是所有先进国家加速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原则。美军 1969 年至 1974 年，裁减兵员近 140 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压缩体制、编制。共撤销两个战区司令部，陆军撤销 7 个军级以上司令部，空军撤销 2 个集团军司令部，28 个师级指挥机构，海军两洋舰队各 6 个司令部分别合并成了 3 个司令部，从而使战略空军。陆军防空司令部和海军系统司令部等兵种司令部军事人员减少 38%。陆军器材司令部、海军器材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等后勤支援司令部军事人员减少 31%。英国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将南部、北部、西部三个军区司令部和陆军战略司令部合并，海军把 3 个舰队司令部减为 1 个，从而使各级司令部人员削减 14%。日本一直坚持走富国强兵之路，各级指挥机构力求精干，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全军的作战和训练，编制仅为 117 人，其中军人 83 人，文职人员 34 人。

遵照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我军 1985 年这次大的精简整编，将原来的 11 个大军区合并减少为 7 个，减少军师团级单位，撤并了部分军队院校。同时将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改为武装警察部队，县和相当于县的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较圆满地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任务。为了减少军官数量，改变官兵比例不合理的状况，除精简机关、裁减部队、减少副职、设置文职人员之外，还相应制定了《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预备役军官条例》等，使精兵的原则进一步朝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实践将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精兵的思想对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载入我军史册。

二、合成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要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并将这一思想运用到体制、编制的思考上。他说：“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邓选》第 252 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成为我军精简整编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我军经过 1985 年的整编，装甲兵的全部，炮兵、高炮部队的大部和野战工兵部队，同陆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使集团军的各兵种在体制上达成了合成编组，使我军向合成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在体制、编制中贯彻合成原则，是现代战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邓选》第 21 页）必须随着情况的发展来增强我军应付现代战争的适应能力。当前，各国的军事家都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军、兵种，无论其怎样神通广大，离开了其他军兵种的配合，都会变得无所作为。英阿马岛之战，英军参战兵力海、陆、空军都有，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充分体现了三军协同作战的威力。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较好地实现了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步兵、装甲兵等诸军、兵种的合成作战，迅速突破了

“巴列夫防线”。然而，协同作战必须要正确处理好合作的程度，科学地确定合成的比例，充分考虑到各种武器装备系统的总体情况。这就必须从军队的体制、编制上考虑，使诸军兵种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合成，就没有军队的现代化。

我军武器装备和军兵种的发展，为从体制、编制上合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军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靠单一兵种打仗，使用的是步枪、手榴弹、刺刀等简陋武器装备。建国初期，我们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武器装备的改善，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还有防空兵等。但当时仍然是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还没有同步兵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要走的是第三步，从体制、编制上把诸兵种合起来。我军走过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仅符合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军武器装备和兵种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有了新型主战坦克、装甲步兵车、新式指挥车、各类火炮，以及自行设计制造的各类军舰、飞机，而且也有了中、远程和洲际导弹，有了防空、海防等战术导弹以及一定数量的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指挥系统、信息系统、侦察手段、控制手段进一步科学化，武器的威力、远战能力和军事行动的快速性等现代战斗力的主要指标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体制编制，既不符合战争的要求，也不能很好发挥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的效能，只能造成人、财、物力的浪费。

体制，编制的合成原则，也是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新水平，真正摆到战略地位的迫切需要。多年来，我军的教育训练处在一个应急、低层次、单一和封闭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军队在编成上处于诸兵种相对独立状态也是一个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教育训练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近年来，搞了一些协同和合成训练，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部队从不同建制临时抽调，往往合不拢、散不开，直接影响了训练的效果；即便是取得了较圆满的演习和训练效果，也因部队随即回建分散而难以巩固成果。再练再聚，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耗费很大的精力。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也暴露了这方面的弱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长计议，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从军队体制、编制上加以解决。实践证明，通过1985年的合成整编，全军呈现了一个“金戈铁马、走向合成”的可喜训练局面，各种合同战役演习如雨后春笋，各种训练改革应运而生。各级指挥员的合成指挥能力大大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大大增强。历史还将继续证明它所具有的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优越性和无比威力。

三、平战结合的原则

军队的体制、编制，既要考虑到平时，又要考虑到战时，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简整编的重要原则之一。考虑平时，主要指要把部队搞精干，适应和平时国家经济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能应付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有效地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战时，就是指具备一定的扩编机制和基础，保持常备不懈的状态，一旦战争规模扩大，可以迅速扩编，以适应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有效地完成保卫祖国的任务，平战结合，就是要走精干的常备军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道路，真正做到小打，现役部队就可以应付；中打，稍为扩编一点就行；大打也能有灵活的扩编机制和良好的

基础。

平战结合的体制、编制，是和平时军队建设的规律之一。军队，总体来说是一种高消耗性的团体，平时搞好能量的适当积聚，战时尽可能大地释放能量，是它的特征之一。军队这种高消耗性的团体，直接受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制约。军队建设的规模，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需要。无论哪个国家，平时都不可能保留战时那么多的兵员，而战争一旦到来，又必须迅速扩充。要解决这一矛盾，不能仅限于军队员额的简单增减，必须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机制和科学的体制、编制。邓小平同志说，“真正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三百万，或四白万、五百万。因为那个时候五百万也不够。”关键在于搞好平战结合，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把常备军搞精干，把国防后备力量搞强大。事实上，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并将之看成是增强国防综合实力的有效途径。美国这个全球性军事大国，员额一般控制在 200 多万，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其兵力分别达到 363 万和 395 万。现役作战部队的编制一般都编有简编师、架子师。

同时将平时不大用、战时不可少的如空军的侦察、空运部队等一半以上的勤务部队都编在后备部队，以便战时随时扩编。苏联当前将陆军编组成满员师、简编师和架子师，三类师分别是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加强预备役部队的建设。目前苏军预备役部队多达 2500 万，预备役军官占 100 万。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兵员都较为精干，分别是 57 万、47 万、30 万。但都十分重视后备力量的随时补充，力求完善后备动员体制。英阿马岛战争期间，英特混舰队一百多艘舰船，其中 60% 是在很短时间内临时征用的，速度之快，形成战斗力之强，令全世界咋舌。以色列一些正规部队的军官平时就兼任后备役部队的职务，军校负有教学和参战双重任务。平时除了保持适量的部队外，后备部队也组织得井井有条。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正值“赎罪节”，不少人正在教堂里祈祷，但它能在 48 小时内便动员出 30 万大军开赴前线，为世界所瞩目。

平战结合的体制、编制，更能充分发挥我军人民战争的威力。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工农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行人民战争；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我军在劣势装备下战胜优势敌人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战争形式和武器装备如何发展，但战争的性质没有变，我军的性质没有变。动员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始终是我军的优势之一。在体制、编制上贯彻平战结合的原则，可以使我军平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战时充分挖掘战争潜力，使我军这一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

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军在 1985 年前后的几次精简整编中，不仅调整了我军正规部队的体制、编制，以利于平战结合，而且后备力量的建设也产生了历史性的飞跃。由于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民兵建设上曾一度存在机构庞大、有名无实现象，1979 年全国民兵 2.7 亿，占全国人口的 27%。

1982 年底，全国对民兵组织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参加民兵的年龄由 16 岁~45 岁改为 18~35 岁，简化了民兵层次，减少了民兵数量，总数比原来减少 80%，取消了“民兵师团”一类有名无实的机构。同时，对民兵的教育训练和武器装备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勾划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备力量模式，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十六字方针，使民兵、预备役工作同整个国防建设一样，实现了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使全国的后备力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四、提高效能的原则

这是邓小平同志讲得最多的一条原则。他在1980年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邓选》第248~251页）

军队体制、编制是一种排列组合。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结构决定功能。科学的编排组合，能把人与武器装备有机地融为一体，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紧密配合，相得益彰。同样数量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排列组合、体制、编制不同，其效能完全不同。军队各级领导机关是一个多层次、多系统构成的纵横体系，是组织指挥军队的“中枢”。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好坏，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部队的行动。而效率的高低，作风的好坏革从人员个体素质去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科学的体制、编制上加以解决，因为体制、编制问题更带有全局性、稳定性和法规性。机构臃肿、人员庞杂、部门重叠、职责交叉，势必造成人浮于事、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枝节横生，严重滋长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由于政出多门，条条专政，互相牵制，往往造成下属无所适从，忙乱应付。这在平时，将严重影响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严重挫伤基层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战时，还将造成指挥上的不灵，影响到部队作战能力的充分发挥，导致作战行动的被动甚至失利。

遵照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决策，通过精简整编，我军员额压缩100万人；三总部机关精简50%以上；撤销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将军委直属的陆军各特种兵机关缩编为总参的业务部，各大军区也作了同样的改变，减少了层次，有利于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建设；保持了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总体结构，比例更趋于合理；建立了比较完善配套的作战和保障体系；军队指挥院校形成了高、中、初三级培训体制，健全了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体制；国防科工委成为既是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国防科技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所属各军事工业部的科研和国防工办的领导机关；明确了军事科学院为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由于这次精简整编认真贯彻了效能原则，我军各级领导机关就可以更好地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决策上，有利于实现目标管理、分级管理、按级负责，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完善工作程序，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五、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与成长

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7月4日军委座谈会上着重强调指出：“体制改革

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我看在座的，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吧？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邓选》第365~366页）1986年11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教授时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各级机构的活力。要保持活力，就要实行干部年轻化，不搞年轻化就不可能有活力。”这里邓小平同志是把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当作机构、体制的活力和事业的全局利益来看待的，有利于人才的选拔，既是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的重要原则之一。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考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军队中不仅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而且存在着机构臃肿和体制、编制庞杂等问题，极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使得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亦或受制时而无法发挥、亦或受熏陶而滋长一些不健躁的东西。此外，长期以来，军队干部中年龄结构偏老、文化水平偏低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军事科学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极不相称；要解决这些问题，靠正常的干部任免转复是难以解决的，必须通过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按体制、编制来建立健全干部服役条例，使军队代谢机制正常运转，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从长远看，军队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具有很大流动性的群体，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自身机制的活力。以体制、编制为主要形式的自身运行机制不灵，即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输入，也会造成浪费而无法充分利用。而其中人才的不断生长，则是这一机制是否灵活的重要标志之一。建立一个科学的体制、编制，使军队人才的选拔与成长有一个科学的渠道和适宜的土壤，就可以使军队的机制充满活力。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在建立科学合理的体制、编制中考虑人才成长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选拔人才的一些具体条件和构想。按照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3年以来，结合精简整编，以军、师、团为主，对各级领导班子作了调整。

1985年，按照“调整、充实、稳定”的原则，又一次调整了团以上各级领导班了，大批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基本上实现了年轻化。各级领导班子的文化、专业知识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调整后，集团军班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2%。总部、大军区、军兵种一级领导干部，60%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院校培训的占75%。随着新的军官服役条例等颁布实行，我军的人才培养工作将更进一步向制度化、法规化方向发展。这对巩固和加强精简整编的成果，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 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

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转入了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确立了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与此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把后勤现代化建设作为实现总目标的重要环节提了出来，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原则，要求全军努力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为军队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未来反侵略战争作准备。

第一节 后勤现代化建设，是军队建设和战争发展的客观要求

军队后勤工作，是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从经费、物资、医疗、技术、运输、营房等方面，为军队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以保障军队平时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战时夺取战争的胜利。它是一种实践活动。它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对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对军队的建设都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后勤建设。他指出：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邓选》第95页）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后勤的领导，“各级后勤部门主要领导人应当担任同级党委常委。”（转引自《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86页）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清晰表明，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后勤、管后勤；要把后勤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要把后勤工作与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摆在党委工作的同等重要位置，由党委常委集体统一管理和决策。邓小平同志如此重视后勤建设是与后勤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分不开的。

一、实现后勤现代化，是由后勤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决定的

后勤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军队建设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自从它伴随军队产生以来，它的重要性愈益被人们所认识。如今，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后勤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后勤建设必须向现代化方面发展。

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后勤有着很大的依赖性。随着军队的发展，其对后勤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这就客观要求军事后勤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以满足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战时打仗，平时搞建设，这是军队活动的基本规律。战时。军队一切战争活动需要后勤作保障，平时军队建设的一切活动亦需要后勤来供给。这是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后勤工作要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我军“三化”建设说到底就是实现人、武器和体制编制的现代化，其中又以武器装备现代化为其根本标志。要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离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后勤现代化是不可设想的。

从理论上说，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后勤建设之间形成了一个链式结构。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国防现代化建设又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间，经济建设是中心，起着关键作用，没有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国防建设的现代化、

军队建设的现代化。

思格斯早就指出，离开经济力量作后盾，“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增强实战能力，谁就必须拥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越发达，物质力量越雄厚，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经济并不等于军事，经济力量也不等于军事力量，因为，经济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军事，它需要有一个转化环节和转化过程。军队后勤正是这种转化环节。国家经济力量就是通过后勤的一系列工作过程才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所以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力为条件的。经济力对于军队现代化的支持则是通过后勤来实现的，在整个军队建设过程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后勤。后勤是联接经济与军事建设的桥梁。

从实践上说，随着军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军队的需求增大，供给保障方式改变。在冷兵器时代，后勤供应比较简单，有了粮草便可打仗。到了现代，不但军队需求品种繁多而且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主要靠自己的后方供应来实现。因此，依赖程度明显增大，甚至是完全依赖后方供给。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军队建设，就是如何养军的问题。这里的“养”，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供养，还包含着养成、培养的内容。要供养好军队，固然离不开充足的后勤供给。养成则是通过教育训练来造就。因此，要造就具有现代实战能力的现代化军队，就必须提供进行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教育训练的设施、装备、方法、手段和经费开支。这种依赖性本身就要求后勤建设现代化。更进一步说，军队不具有进行直接扩大再生产的功能，它从国家获得军费开支，获得物资供给，获得武器装备，主要用于战争、平时训练消耗和军人生活消费，它一刻也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的供养，即便如古代所说“以战养军”，通过战争缴获来得到补偿，也是微乎其微和不确定的。因此，不断消耗，不断供给，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武器装备新陈代谢频率加快，周期缩短，所需经费急剧上升，越来越高，它对后勤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了。

二、后勤现代化，是由后勤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决定的

军队对后勤的依赖性告诉我们，离开后勤，战争就无法进行。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必须从未来反侵略战争出发，搞好后勤现代化建设。他说：“现在一个战士要背几十公斤，怎么打仗呀？到时候，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呢！这不是小事，……。”（《邓选》第20~21页）

1. 战争最直接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后勤。前面已经说过，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基础是潜在的，必须通过一种转换途径——军事后勤。

第一、后勤将经济基础转换为战斗力，军队的战斗力通常由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因素构成，其中，物质因素是最基本的，精神因素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军事后勤进行的筹划、配制、储备、维修则构成了军队战斗力的诸多物质要素。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特别留意军事后勤对于稳定军队、鼓舞斗志的关系。古人早有“仓禀实，府库足，人心定”、“三军用备，主将无忧”等说法。在古代战争小说和兵书中随处可见夺其粮草，则敌不战自退；围城不攻，断其粮草，城不攻自破等的论述。对于指挥官和统帅来说，装备精良、供应保障充足，则倍增战略战术决策信心，虽处危势而不乱。可以说后勤对于军队作战心理素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后勤是战斗力再生的源泉。战争是武装集团的激烈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双方是你死我活的，都必须置对手于死地。这样，军队的战斗力就始终处在一个变化、消长的动态过程中。因此，军队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维持、再生和提高战斗力。这就需要通过后勤保障来获得。

战斗力的减弱和损失的因素，有武器装备的损坏和战斗人员的伤亡等。武器装备的损坏需要通过后勤对武器装备进行有效的、迅速的维修和补充，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恢复；战争中人的伤病减员需要通过后勤对伤病人员进行施救、治疗，才能使损失的战斗力再生。

2. 后勤强烈地制约着战争。

正因为战争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后勤，因而，战争必然受到后勤的客观制约和影响。

后勤对作战行动的制约。众所周知，战争的胜利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战役和战斗来实现的。后勤对作战行动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时机、规模、进程和结局的制约。比如，指挥员考虑战役发起的时间和规模时，首先必须考虑后勤准备程度，看给养是否充足，武器弹药的准备情况以及伤病的救治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部署淮海战役时曾明确指出：“对全军作战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19页）后来，由于棉衣没有发齐，部队受寒，病人增多，使淮海战役时间推迟。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盟军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后勤准备复杂繁重，限制了行动的规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迟迟不作地面进攻，不能说与后勤准备、经费不足无关。战争实践充分证明，战役战斗行动只能在后勤保障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它的规模、范围、发展速度等不能超出后勤保障能力的极限。

后勤对战略战术的制约。战略战术是军事家用于指导战争、战役、战斗的方略、方法和艺术，它是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然而，由于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始终不能离开客观物质条件，因此，战略战术不可能不受后勤的制约。所以，军事家在制定战略战术时必须考虑后勤保障能力。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国家经济和军事后勤保障能力，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由于我们的装备落后，后勤补给线长，我军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战略战术。海湾战争中，美军之所以搞地毯式轰炸战术，与它的后勤保障充实是紧密相关的。

三、后勤现代化，是现代战争对后勤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说过，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打钢仗”、“打装备”、“打后勤”，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战争与后勤建设的内在关系。

现代战争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后勤的发展。现代战争无论在作战样式、作战规模、作战消耗上都是过去任何战争所无法比拟的。这种新的发展变化，要求军队后勤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

首先，现代作战方式的改变，迫使后勤保障方式也随之相应地变化。由于战争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获得了新式武器装备，从而引起了作战方式的变化。冷兵器时代的列阵以对，持械格斗，驱马厮杀，后勤保障主要是粮草供应。“就地取给”、“取给于敌”是主要的后勤保障方式。十九世纪

工业革命，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散兵队形、梯队、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新式战法代替了线式战法，弹药消耗量剧增，后勤保障方式由就地取给逐步过渡到后方供应。现代战争是高技术合同作战，后勤保障方式也必需随之进一步改变。实际上，这种变革已经体现得极为明显了。

其次，现代战争战场范围广大，使后勤保障的规模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全世界有 61 个国家被卷入战争的旋涡，一个战场双方可能投入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兵力，在几公里的正面可摆放千门以上的大炮。

1991 年初的海湾战争有 28 个国家参加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每天出动的飞机架次和发射导弹的数量都是空前的。未来世界更加动荡不宁，霸权主义的争夺将由陆地、海上、空中扩展到宇宙，战争每扩大一步就必然对后勤建设有进一步的要求，要求其在更大的范围内保障更大规模的战斗行动。只要战争能涉及的空间，后勤就得在这些空间内提供保障，从而使保障系统互相交织成为立体的有机整体。随着太空争夺的发展，后勤保障将面临更新的课题。可以断言，将来后勤保障将穿梭于地球与太空之间。

其三、现代战争消耗空前增大，需求日益多样化，导致后勤自身结构的复杂化和科学化。战争与后勤之间的供求矛盾必将刺激后勤不断进行调整，以改善和充实自己的结构，满足战争的需要。据西方统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每天耗资近 10 亿美元，后勤供应的物资每天多达几十万种。这种空前的战争需求必将迫使军事后勤具有更大的保障能力。比如，作战装备的品种多样化，使作战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进而促使后勤不断增加新职能，于是后勤的自身结构随之改变。火器时代开始，后勤便增加了枪支、火炮、弹药的供应任务，于是军械部门应运而生。机动装备的出现，并由陆地、海洋向空中发展，油料保障成为后勤的主要任务之一，于是，专门油料部门随之建立。现代军队所需的多种类型的数百万种物资，已经使后勤内部出现了诸多不同的保障专业。随着现代战争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后勤机构将进一步分化、完善。

现代战争使后勤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比如，由于现代战争的突发性大，后勤保障的时效性更强了，使之具有高效快速反应的特点；由于现代战争的规模增大，后勤保障的范围更广了，使之具有立体的全方位的保障特点；由于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增大，后勤供给的物资品种和数量更多更大，使之具有综合性、持久性的特点；由于现代战争对后方的破坏性严重，后勤防卫能力显得更重要了，使之具有大纵深的防卫特点；由于现代战争异常残酷，使救治任务更加艰巨，技术保障更加繁重，特别是由于远射程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多种打击深远后方的手段广泛应用，后勤系统受到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是后勤在未来战争条件下面临的最大挑战。倘若打起核战争，光辐射、核辐射、冲击波都会给后勤工作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特点，要求我们必须使后勤建设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从努力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密切协同能力、综合保障能力、后方防卫作战能力以及科学的组织、指挥能力入手，加速实现后勤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要我们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搞好后勤现代化建设，其根本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第二节 加强后勤现代化，必须把后勤当作一门学问

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所写的训词中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系统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学习，……不钻进去是搞不好的。”（《邓选》第53页）两代领导人的共识明确地告诉我们，后勤工作不单纯是一种业务工作，一个实践活动，而且是一门科学。

一、军事后勤史是一部不断研究、发展的历史

军队的发展经过了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如今进入了高技术兵器时代。伴随着军队的产生和发展，后勤应运产生并得到发展。

在冷兵器时代，后勤保障的内容与方式大致是：物资主要是粮草、兵器，车马、战船、衣甲等。其来源有三：一是“因用于国”；二是“就地取给”，“取给于敌”；三是屯田戍边，军队自己生产。后勤工作都由政府和将帅统管。

进入火器时代，后勤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体制由冷兵器时代的政府和将帅统管，发展为有了专门的军事后勤系统。在保障内容上由粮草做主为重点转为以弹药和工程器材为重点；在指挥方式上，由将帅直接指挥转变为司令部指挥；在物资保障方式上，物资供应由就地供应为主转变为后方供应为主；卫勤保障方式由个体式就地治疗为主转变为后方治疗为主；技术保障由兵器个人维修为主，转变为专业技术人员维修为主；运输方式由自然动力运输为主开始向机器动力的运输方式过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进入机械化阶段。后勤发展成为运输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装备技术勤务等四大职能系统的复杂的大系统。

此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高技术常规兵器得到迅速发展，核武器、航天武器、空间核武器、激光武器得到应用，军队发展进入高技术兵器时代。这时期，后勤除了继续保持了机械化阶段某些特征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比如，后勤活动的领域大扩展，后勤指挥的信息量剧烈膨胀，后勤与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联系更加紧密，后勤保障手段有了突破性发展。

可见，军事后勤从产生以来便在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着。随着后勤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从而引起了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密切关注。力求从理论上去探索其基本规律、为后勤建设、为战争服务。

在我国古代留下的浩瀚的军事著作中，随处可见对后勤的论述。《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外内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申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第13页）“军事篇”中则明确指出：“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秣则亡，无委积则亡。”生动地论证了军队的存在极大地依赖人力、物力、财力的内在关系，把后勤问题作为军队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在国外，许多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对军事后勤工作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古希腊时的包诺芬不仅强调说明了军事活动与

经济活动要构成一个相互保障与制约的整体关系，而且主张军事指挥官必须抓好军队的后勤补给、武器装备建设等。

到了近代，拿破仑进一步提出了军队离不开后勤，认为战争需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军事指挥官要亲自指挥后勤。克劳塞维茨则提出了把后勤因素作为制定战略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在著名的《战争论》中说，“一切补给手段属于第五类”战略要素，并认为补给交通线是军队的“生命线”。瑞士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则把后勤提到与战略、战术并列的地位，并首先系统论述了后勤的主要任务。马汉则首先把后勤一词引进海军军语，主张后勤应为武装力量和战争活动提供充分的经济基础，并把工业动员和战时经济也纳入后勤轨道，主张在战略上，后勤不仅立足于本国经济，也立足于外国经济，而且必须以本国提供的物力建立强大的海军，争得海上霸权——以此优势控制他国经济，从中获利，并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军事后勤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便出现了许多集中研究军事后勤的理论专著。

1917年出版的美国索普著的《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把后勤作为战略、后勤，战术三大军事活动部分之一，认为：“战略制订利用己方兵力的计划，而后勤则是为它提供必需的手段。”他断言：“随着历史的推移，战略越来越多地夺取了战术的荣誉，后勤则已跻身于战略和战术两者之间。（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不断改进了作战手段，新型武器陆续投入使用的结果，使得后勤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勤的地位作用愈益突出，引起了更多的军事理论家的关注。当代美国的后勤学家艾克斯斯，1959年出版了《国防后勤学》。他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来深刻论证后勤与战略战术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后勤是一种艺术、一门科学、一种工作过程。”“后勤是为作战部队的建立和维持提供手段的，它是国家经济和作战部队之间的桥梁。”他断言：“在军事领域内产生了三个重要变化：一是直接战斗人员减少；二是对后勤的要求更高，后勤人员不断地增加；三是就人员的数量而言，可以说军事人员的‘重心’正在由前方向后方转移。”（解放军出版社，《国防后勤学》第432、7页）从后勤在军事中的作用出发来预示后勤的发展趋势。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军事后勤有许多科学论述，恩格斯还亲自在巴登战役中组织指挥过军队后勤保障工作。通过实践和理论的研究，他精辟地指出了经济是暴力的物质基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物质力量决定战略、战术，战争需要巩固的后方和良好的后勤组织。列宁、斯大林则认为，物质力量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物质供给是否充分及时，是关系到军队战斗力是否强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创建军队的过程中，根据我军建设的特点及其对军队后勤的要求，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积集体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军事后勤思想。他指出：“后勤保障力量是决定战略战术的重要因素。”“指挥员要因时关照前方与后方，依靠军民整体力量，保障战争胜利。依靠人民群众，发挥军民整体威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8页）在实践中，他把打仗、筹款、征粮、生产、搞经济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要求全军将士既是战斗队员又是生产队员和工作队员，要求全军人人做后勤工作。从而把军事后勤建设寓于民众之中。这不仅

对无产阶级军队后勤工作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而且指出了进行后勤工作的基本途径。

不难看出，后勤随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与其他科学一样，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冷兵器时代到高技术时代，军事后勤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发展和变化，从而推动了后勤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后勤实践，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不断循环，使后勤工作在实践与理论上都不断现代化。邓小平同志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军事发展的机械化阶段和如今的高技术阶段，他是从军事后勤发展的历史趋势，从国情、军情出发，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提出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把后勤作为一门学问加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二、现代军事后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很好加以研究

现代后勤是由多专业、多勤务组成的复合的立体矩阵结构。它按指挥层次，可分为战略后勤、战役后勤和战术后勤；按专业内容，可分为军需、军械、运输、油料、卫生、营房、财务保障、后勤管理、后勤指挥、后勤防卫；按存在的形态，可分为后勤理论、后勤实践；按面临的环境，可分为平时后勤与战时后勤；按军兵种，可分为陆、海、空后勤和第二炮兵后勤。它包括后勤人员、后勤物资、后勤装备、后勤设施和经费五大要素。其相互之间及其与外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外部联系上，后勤与国家、与社会，与经济、与战争全局、与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与科学技术等息息相关；在内部联系上，后勤是由多种矛盾、多种子系统、多种专业、多种学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各部分相对独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这种内外的联系，使后勤始终在各种矛盾作用之下，例如，后勤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矛盾，后勤自身建设与保障军队其他方面建设的矛盾，后勤经济效益与军事效益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决定了后勤工作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是横跨经济与军事两大学科，是两大学科联结的产物的学科性质，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性和经济性。这两个基本属性，成为我们学习研究后勤理论、搞好后勤现代化建设永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也是邓小平为什么要把后勤工作当作一门学问的又一原因。倘若我们不把它当作一门学问，不去加以仔细研究，了解和掌握它的理论来源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要实现后勤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军事后勤被作为一门科学，固然是其内在的科学性决定的。但是被人们当作一门科学加以重视还是近百年来事。然而，它作为一门科学，一开始便沿着科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前进。由于其在发展中不断分化又综合的趋势，工业的高度发展并迅速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后勤保障内容越来越复杂，面临更多的研究对象；大量边缘学科的应运而生，使军事后勤学拥有更多的研究工具，这是军事学不断分裂出新学科的客观基础。现代科学又是互相渗透，紧密联系着。学科成果的互相转移的趋势又使后勤科学不断在新的水平上实现高度综合。这样，后勤学科不仅和其他学科浑然一体，而且成为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大量科学知识的、高度综合的科学。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主要学科的发展无不被后勤所吸收，对后勤产生影响。邓小平同志正是从军事后勤这种高度的综合性、从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联系性出发，要

求我们去认识它、研究它，去认识军事后勤的内在规律性，去研究军事后勤的技术、学术、基础理论，总结我国、我军后勤工作的历史经验，吸收外国、外军的有益东西，建立我们自己的后勤理论体系，以适应后勤理论的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后勤提供理论依据。

三、现代军事后勤工作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战斗力。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工农业生产上，体现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发展上，同样也体现在后勤保障能力上。构成后勤保障能力的人员、物资、装备、设施要素中，无不渗透着科学技术，无不与相应的科学技术相联系，无不依赖于科学技术所提供的知识和手段。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后勤保障能力不断提高的当今时代，如不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后勤领域的应用研究，提高后勤保障能力，现代军事后勤工作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就要吃大亏、打败仗。

后勤保障能力的基本要素是人和物。从物的角度来说，后勤的任何技术装备、设施和物资，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由科学技术物化而成的物质力量，而且任何科学技术也都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的。在古代，冶金和火器制造技术的应用；1875年法国灭菌保鲜储藏食品技术在军需供应上的应用；医学发明在战场救治中的应用；本世纪一些新的科学成果，如电子计算机、雷达、核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激光、火箭技术、遥感技术、遥测技术等，都既是因军事需要而发明，又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的。总之，从冷兵器时代的舟车、粮秣和甲冑矢弩，一直到现代的后勤技术装备、设施和物资，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并伴随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发展变化着，特别是现代化的后勤技术装备和设施，如用于交通运输的车辆、船舶、飞机和管线等，用于伤员医疗救护的各种医疗器械和设备，以及营房、仓库、机场和码头等，无一不凝聚着大量的声、光、化、电、磁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它们都是“物化的知识力量”。离开了科学技术知识，既不可能研究和掌握这些现代的后勤技术装备和设施，更不可能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从人的角度来说，后勤人员是后勤保障能力的主体，也是后勤保障能力诸要素中最活跃和长久起作用的要素。因此，后勤人员的素质的现代化对于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更为重要。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应用于后勤领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后勤保障方式、保障能力都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转化为后勤技术装备、设施、物资和资源也逐渐增多。这就迫切需要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后勤人员，以保障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得到最好的维护、修理和使用，并发挥其最大效能。后勤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部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各门科学和技术的吸收器，其中任何一种业务，任何一个门类都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技术。如果后勤人员不具备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更不用说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力量 and 手段去保障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和战争的胜利。据国外经济学家统计，小学毕业生可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可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可提高300%，这对后勤工作的管理也应该是一样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朗都花了巨资购买先进武器装备，但由于双方后勤人员科学技术水平普遍较低，致使先进的武器装备缺乏良好的维护和管理，装备完好率很低，战场补给和维修很差，因而，形不成强有力的后勤保

障能力。开战时，伊朗拥有 445 架作战飞机，因维护保养不善，能起飞的飞机仅占 30%~40%，其中最先进的 F14 飞机只有 8 架能够起飞。与此相反，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同样进口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由于后勤人员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其后勤保障能力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技术装备修复快，部队战斗力维持和再生能力强。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后勤当作一门学问，不仅是因为他从后勤发展的历史中看到了学习、研究、发展后勤理论和技术的科学价值之所在，而且他深知后勤是一个大系统，是与各种科学技术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着的，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对之作出科学的总结和回答，同时还进一步看到了科学技术对军事后勤工作的影响力，从而要求全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后勤工作人员去认真钻研，并通过这一途径来加快后勤现代化建设。

第三节 从我军后勤建设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1985 年，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决策，我军后勤建设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战略性转变，由应付全面战争转到了和平时期全面加强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来。

后勤现代化建设要适应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当时面临着两个现实矛盾。一是与我军后勤现实状况的矛盾。我军后勤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今后后勤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验，但是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薄弱环节。比如，后勤保障体制与未来合成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后勤指挥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后方指挥系统和手段还比较落后，后勤技术装备型号杂乱，技术性能较差，与作战部队技术装备发展不同步等。概括起来就是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人才与后勤技术装备、后勤管理建设比较薄弱，现代化水平很低，与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后勤的差距很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与我军后勤建设的现状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是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十分突出。如前面备章所述，我国目前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还很落后。因此，利用历史机遇，加速我国经济建设，这是国家的大局。在这个大局下，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理所当然地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这样，国家就不可能拿出那么多的钱用于军队建设。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反复要求军队忍耐的原因。

因此，在进行后勤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既不能不顾客观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走高消费发展道路，也不应因为我国经济力落后，后勤建设现状落后，自怨自艾，不求进取。必须根据我们的现有条件，争取时间，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后勤现代化建设道路。对此，邓小平同志作过许多具体而重要的指示。比如，他提出了：“要从整顿财经纪律着手，整顿后勤工作，军队要把农副业生产搞好，军队工厂平时以民用养军用，对所有企业进行大检查、大清理；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 79 页）要加强管理，要厉行节约，当好红管家等等。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不仅从宏观上确立了建设现代化后勤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而且从微观上对后勤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一、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确立了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他的领导下，1978年4月军委正式提出了“勤俭办一切事业，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一切为部队服务，一切为战备服务，加速后勤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军队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为我军确立的后勤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27年我军诞生，我军后勤也随之产生。战争年代，由于我们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因此，我军后勤的指导原则是“取之于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提出了“取之于敌，就地取给和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援”的后勤保障原则。建国以后，我军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1954年到1976年是我军全面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后勤时期，确立了“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后勤建设基本指导思想。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基本指导思想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后勤现代化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后勤工作的破坏，根据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和后勤建设的实际提出这一正确方针，指引我军后勤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前进。

进入八十年代后，这一思想在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为适应国家全面改革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牢固地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做到“人少要把工作做好，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以保障和平时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以提高应付突发事件和边境自卫作战的后勤保障能力的思想。

根据上述的发展变化，我们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队后勤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精神应该包括下述一些内容，即：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为依据，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立足于保障局部战争，着眼长远运筹，稳步发展、稳步前进，全面提高后勤工作效益和保障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和良性循环的后勤体系。

首先，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后勤现代化建设观念。我军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个不同的后勤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这与观念的转变是分不开的。面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军队后勤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这是从全局出发的带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它突破了后勤比作战次要的旧观念，以后勤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全新观念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后勤在军队现代化和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后勤既不是单纯的一种专业活动，也不是战争活动的附属品，而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突破了只是后勤人员支援战斗人员作战的传统观念，以每个参加战斗的人员既是战斗人员又是后勤人员的新观念，指导全军指战员共同关心建设现代化后勤；突破了在军事经济活动中只重视国防效益不重视经济效益的观念，以国防和经济效益并重的新观念，要求有限的国防费用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达到“人少要把工作做好，钱少要把事情办好”的目的等等。这些观念对于指导全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

勤俭建军，继续过好紧日子，积极有效地保障部队稳定和提高战斗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它还给我们规定了进行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and 方针，1982年12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提出了“后勤工作要达到适应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要和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的建设目标，“1983年11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完备的、战斗化的现代后勤体系’的后勤建设目标”（《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92~93页）。这样就把“两个适应”作为后勤现代化的根本追求，把“完备的、战斗化的现代后勤体系”作为后勤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摆到了目前。

显然，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改变了我军后勤建设的观念，而且指明了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二、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在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面临“少米之炊”、军费不足的前提下，在我军后勤建设依然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实现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目标是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的问题。首先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对后勤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端正了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接着进行了体制编制的调整，对后勤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开创了后勤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过去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是我军建军原则之一，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搞好后勤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小米加步枪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我们同样依靠这一基本原则，建立起了我们军队的后勤体系。它是我军建设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即使在我们社会主义发达了、国家富裕了的时候，也不能丢掉这个传家宝，何况目前我们还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呢！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为了战争，要节约每一个铜板。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穷，……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邓选》第221、224页）“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振奋起奋发图强的精神。”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杨尚昆同志提出了开源、节流。1990年7月江泽民同志为青藏兵站题词：“弘扬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革命精神。”经过近年来的进一步发展、充实，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已经显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从内容上看，一方面要节流，对军费的开支要精打细算，少花钱，办好事，办大事，过紧日子。另一方面要开源，搞好生产经营，以补军费之不足。

节流，就是通过节约开支，使有限的军费发挥最大的效益，把钱用在刀刃上。

开源，前几年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有失偏颇。一讲开源，就以为可以用各种手段去赚钱，以致出现了一些非法经营、违法乱纪现象，腐蚀了部队。

还有些人把生产经营摆到了部队建设的不适当位置，从而影响甚至排挤了部队的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也有些人片面夸大生产经营的作用，以为通过生产经营，军队可以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己养活自己。从而造成了错误的导向，对部队建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认为，生产经营充其量能对部队生活和经费不足作某些补充。我们仍坚持军队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吃“皇粮”，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当然，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搞一点生产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说，以吃“皇粮”为主，以生产经营为补，大头同家给，小头自己搞，两方面结合起来。

从精神实质上看，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具有强大的动员作用和感召作用，从而激励人们去振奋精神，积极进取，奋力拼搏，无私奉献，扎扎实实做好后勤工作。在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中，无疑是一种精神动力。它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本色在新时期的体现，是我党优良作风、我军优良传统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2. 以效益求发展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始终注重和强调经济效益。在军队建设上，他同样注重军事效益，他是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论者。他曾指出：“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军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邓选》第97、365页）“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40页），“杜绝各种浪费”，“不允许有丝毫的大手大脚。”“搞好管理，增强活力。”（《邓选》第225、365页）他不仅强调了讲求效益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

讲求军事经济效益是现代各国军队后勤建设中普遍关注的原则。鉴于我国、我军发展的现状，讲求军事经济效益显得尤为重要。军事后勤的最佳效益，则应以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少的消费、最佳的捷径、最快的速度，建设现代化后勤，获得后勤建设与发展的最大效用。

军队后勤，横跨军事和经济两大领域，具有双重属性，受到军事和经济的双重规律制约，因此，后勤建设一方面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经济可能着眼，讲经济效益；一方面必须遵循军事发展规律，从军事需要出发，讲军事效益，把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因军事需要而不讲经济代价，超越经济许可，违反经济规律，也不能片面地追求少花钱而降低战斗力水平，综合考虑才是正确选择。邓小平同志这一基本原则是完全符合经济和军事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我军后勤建设的客观现实的。

提高效益渠道是很多的。对此，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少花钱多办事，把军费花在刀刃上。这就是说，要加强对军费的分配利用的宏观控制，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把有限的国防费用集中投放到有限的战略目标上，使之产生最大的效益。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最大的威胁是高技术中高强度的有限战争。现实威胁是边境和海上冲突，因此国防经费应保证提高应付国家周边可能发生的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事件上，保证特殊兵种的建设上，保证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保证重点和急需装备的改善上，这样做，财力集中，用钱不多，又可达到确保国家安全的目的。

目前，随着现代战争在海上、空中的争夺的不断激化，注重发展海、空军的力量已迫在眉睫。这样，海上、空中的后勤保障供给突出成为当前后勤建设的重要问题，其中海军后勤现代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海洋战略地

位的日益提高，海洋争夺日益加剧，把海上后勤现代化建设突出摆到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前沿。目前美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世界各个海洋上都有他们的军舰在游弋。广大中小国家为了保卫海洋国土的主权和权益，也正在积极地发展海军力量。因此，发展海军、发展海上后勤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海战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人们的上述认识，它是对海军战略和作战手段的一次大检验，是对海上后勤的一次大检验。这种补给线漫长的远离本土作战，倘若没有强大的海上交通和保障是不可想象的。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等多国部队利用海军优势，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形成了以空中和海上的双向补给线，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战争的进行。战后各国军事家都把视线转向战争中的海上保障问题。美国国防部认为，对战斗的结局来说，影响之大莫过于将战斗部队运往作战地区并保障其战斗力。日本军界指出，现代海军强弱已不再是军舰的吨位多少和舰炮火力的大小，而是舰队的综合战斗力。这样海上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并重视。

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面积达470多万平方公里，沿海大小岛屿有6000多个，海上交通和海洋资源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海洋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向我们提出了必须迅速发展海军，发展海上后勤的任务。

针对现代战争高技术的特点，应增加在科学技术等软件发展上的投资，使我军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这是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和经常强调的，是花钱少、效益快的一个捷径，邓小平同志反复要求加强后勤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组织科研攻关，用科研促进后勤现代化。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提高后勤效益的许多具体要求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而又经常强调的问题，这就是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他说：“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邓选》第116、120页）

加强科学管理，是提高后勤工作效益，增强后勤保障能力，搞好后勤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管理，除了加强后勤的决策、计划，实行科学管理的本来含义外，更多地是从后勤工作的特殊性上，强调加强后勤的财务、物资、装备的管理。后勤主要是管钱、管物的，当然也管人，但更多的是管钱管物。因此，从这点出发，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从制度、从纪律、从法规入手建立健全严格的财经制度、纪律，建立健全后勤管理法规。通过制度、纪律、法规的结合来加强后勤管理，保证后勤效能的充分释放。

3. 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发挥整体作用，他说，“要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力量。”“要协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14页），要搞开放，不要封闭。对军队亦然，他主张充分发挥军工生产的能力，以民养军，集体攻关。其实质就是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思想。徐向前元帅对此曾作过阐述。他说：“在建立全国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的同时，有步骤地建立和发展各个地区的国防工业，做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并要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战时实现全民皆兵准备物质条件。”（《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红旗》1979年第10期）从而指明了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平战结合、军民兼容，是和平时期后勤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高度统一的一种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众多的科学技术都具有军民两用的结合性。这就使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国防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其内容广泛，涉及到国家的各个方面，这就必须实行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原则。处理好平时与战时、军用与民用的关系，围绕国家建设的重点，统筹安排，协调全盘，组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使国家内在的国防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和平时期，国防建设既要考虑战时，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又要兼顾在平时能发挥社会效益，为经济建设提供服务，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国防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后勤建设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寓后勤建设于国家经济建设之中，尽可能地面向社会建设后勤，把后勤保障能力蕴于国家和民众之中，把军用与民用、战场建设与经济建设、边防建设与边疆建设结合起来，平时是社会生产力，战时能迅速地变成现实的后勤保障能力。

平战结合、军民兼容，其一是生产能力的兼容，做到民品生产部门战时能生产军品，军工部门在和平时期除了生产军品外，应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扩大民品的生产，做到以民养军；其二是军民产品的兼容，产品设计制造时，就必须考虑到两用的需要，做到通用化、标准化和技术工艺上的同一性；其三是科学技术的兼容，从科学技术看，几乎任何科技成果都具有兼容性。现代科学技术在军用和民用领域中，只有应用的目的不同，而无隔绝的应用范围。因此，军事科技不仅要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还要让它向民用转移，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四是人才兼容，就是既要考虑军队后勤建设需要，也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根据对国际形势作出的新判断，依据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总目标的总体设计，对国防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包括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他提出了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思想，要求我们充分利用相对和平时期的有利环境，集中全力搞好经济建设，为国防力量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为增强后勤保障能力奠定基础；提出了精简军队人员、改善部队装备的思想，要求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裁减军队，把军费降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保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以满足当前军事任务的需要和准备应付外来势力的突然袭击；提出了后勤是一门学问的思想，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管好后勤，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根据需要和可能，走中国式的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之路的一系列方针、原则，要求我们不断改革、创新，加速实现后勤现代化等等。

在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通过整编，全军后勤机构和人员有了较大精减和调整，“总后勤部机关精简人员47%，各军区、军兵种后勤机关精简39%，勤务部（分）队编制员额精简35%，团以上后勤机构精简300多个”（转引自《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94页），在建立精干、合理、高效能的体制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探索和改革了业务管理机制，供应体制正向三军联勤方向发展。军事经济运行的调控，由过去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开始转向以行政手段和经

济手段相结合，经费物资的使用，逐步实行包干责任制。生产经营管理机制开始变革。通过上述的一系列改革，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战略战役后方基地建设形成了以仓库、医院为主体，由运输管线、工程、通信、修理部队组成的较为完整、配套的后勤综合保障体系；全军后勤系统加强教育训练，使后勤人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经院校培养的后勤干部比例已由 1980 年的 32% 增长到 1987 年的 79%，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提高”（转引自《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 100 页）；后勤装备有了新发展，按照“多研制、少生产，部队装备新老并存、梯次配备”的精神，到 1987 年底已研制成功了一批后勤装备；后勤学术研究，已形成了一支专业研究人员和机关、院校、部队后勤人员相结合的学术研究队伍。

总之，在邓小平后勤现代化建设思想的指引下，一个中国特色的后勤现代化建设道路已展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实现。

第八章 实现军队正规化、科学化管理

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要条件，是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中一项综合性、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因而，实现军队管理的正规化、科学化，就成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军队管理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立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目标的同时，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各个方面带有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其中，以法从严治军，加速实现军队管理正规化科学化，就是关键性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加强管理既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实现总体目标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措施。

一、注重管理是军队建设的普遍要求

邓小平同志说，“军队要象军队的样子。”（《邓选》第2页）军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军队，作为武装集团，它的组织形式、活动规范、领导机制、任务特点，同其他社会集团相比较，有其显著的不同特色。“军队是组织的一个好范例。这种组织所以好，就因为它灵活，同时又能供几百万人服从统一的意志。今天，几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动员令一下，他们就集合到了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蹲在战壕里，有时蹲上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以别的方式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在掩避的条件下创造奇迹，明天他们又在开阔地的作战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挥向前推进几十俄里。几百万人在同一意志的感召下，为了同一个目标，根据改变着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而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列宁军事文选》第211~212页）

军队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组织特征，是自然生就的吗？绝对不是。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没有纪律不行”，“要从教育训练着手。”（《邓选》第363、57页）这就是说，严明纪律、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的普遍要求。我国古代兵法十分强调“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于整纲纪”。著名军事思想家孙武早就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武经七书注释》第3页）他把从严治军作为军队将领的必备条件和必持操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外军的将领凡是有所作为的，也都主张严以治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战场上，美国第二军开始由于管理松散，士气低落，战斗失利。巴顿继任该军军长之后，立即从加强管理入手，整顿军纪，从而使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军威大震，迅速扭转了北非战场的战局，打败了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军名将隆美尔。对此，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人都不是逆来顺受的。纪律可以改变人固有的抵触天性。经常重申纪律，可以使人习惯地、下意识地服从他人……。没有正常人不怕打仗的，但纪律可以在人的心中建立起各种勇气……，自尊就直接来源于纪

律。”虽然其言失之偏颇，但也说明了管理与纪律对于军队的重要性。

注重管理，对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军在创建之时，其成分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这就使得注重教育、严肃纪律、严格管理、统一步调，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与其他军队所不同的，我们是自觉的纪律而不是“棍棒纪律”，我们是说服教育的管理而不是惩罚性管理。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我军建设中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其中条条都贯穿着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思想。刘伯承元帅把严格纪律列入组成军队战斗力的四个条件之一，明确指出：对于军队战斗力来说，“（1）政治质量，这是先决条件；（2）军事素养；（3）物质保证；（4）严格纪律。四者缺一不可，但纪律不是惩罚性纪律，而是建立在自觉自尊的基础上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19页）最具有代表性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我军在管理方面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这些正确理论和法规军纪的指导与约束，我军几十年来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著称于世，成为誉满中外的威严之师、文明之师。

邓小平同志从严以法治军的思想，是对古今中外治军规律的创造性运用，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搞好管理是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

管理，在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邓小平同志1978年3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小组会议上是这样讲的：“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于是，他号召全党全国全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邓选》第139页）很显然，邓小平同志不仅把管理看成是手段，是措施，而且把它提到了新时期在各项工作中都必须解决的全局性地位。

这是因为，从广义的管理来说，没有科学管理，就没有现代化大生产。现代管理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又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保障。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管理跟不上，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又从何说起？外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发展现代企业，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有的说，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是推动当代经济高速度发展不可或缺的车之两轮。也有的明确提出生产力四要素说，即劳动者、生产工具、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

这是因为，从军队管理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科学化、正规化管理，就没有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管理涉及到军队建设的一切领域、方方面面。首先，没有正规的科学管理，就没有正常的秩序。军队的一切活动都存在着确定目标、分配任务、组织指挥、统一步调、控制结果等集体活动的基本环节。如果没有对任务、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方面的科学管理，而要维持这些环节有秩序、高效率地运转，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没有正规的科学管理，就失去了目标实现的机制。我军的现代化，包括武器装备、体制编制、人的素质、军事理论等方面，其中任何一项都要在科学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我军的正规化，是要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制度、

统一编制、统一纪律和统一训练，其中任何一个“统一”都离不开科学管理；我军的革命化，是现代化、正规化的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然而，军队党的各级组织系统、政治工作系统以及政治工作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科学管理之中方能产生效力。第三，没有正规的科学管理，就适应不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新的历史时期，对军队管理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管理对象中的军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出现了与战争年代、建国初期大不相同的特点；管理对象中的物，特别是武器装备及其技术程度更加复杂；管理对象中的事，如教育、训练、后勤保障都处在不断地改革之中。面对诸如此类的变化，军队管理还停留在意志管理型不行，单靠经验管理不行，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加速军队管理的正规化科学化。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新时期军队的科学管理，并把它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之首，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

三、正规化科学化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极为关注的是经过三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军队还能不能打仗，还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在他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就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处理各种工作关系的基本依据，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根本尺度。向正规化、科学化管理要战斗力，就是其中的大政方针之一。

1. 从军队战斗力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环境既可以激发战斗力，也可以减弱战斗力；充分认识和平环境，从严治军，就能够消除不利因素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

“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邓选》第114页）把环境的不同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条件，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军队管理而言，一是在和平时期，军队的思想观念容易受到社会和平环境的影响。可能会以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后战争就会自然消失了，可能会以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备战、打仗就退居到次要地位。已经出现的重视“无工不活、无商不富、无农不稳”，而忽视无军不安的倾向，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而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淡化了从严治军的意识，成为滋生松散、放松管理的重要原因。二是在和平时期，军队中的违纪行为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容易在低标准中被疏忽。由于不打仗，即便是有违犯群众纪律的，人民群众可能会以“劳苦功高”为理由而原谅我们；即便是有违犯军事纪律的，可能会以“慢慢教育”为理由而搪塞；即便是有作风松散、管理松懈的，可能以“打起仗来就好了”为理由任之发展。这些没有战事情况下的治军弱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带兵打仗、当兵打仗的精神准备。而战争年代却与此相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都会立刻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三是在和平时期，从严治军、加强管理，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多方干扰。一方面，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军队，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更是无孔不入；另一方面，军队官兵自身也有更多的条件来考虑个人的各种问题。而战争时期，官兵处于血与火、生与死的拚搏之中，对集体的依赖性极为密切，任何有损于集中统一的行为，都会受到战争的报复。诸如此类的情况，就使得我军在新时期治军的方针、原则，在具体工作上落实的难度加大了。

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和平时期从严治军所面临的新情况的透彻分析，科学地阐明了治军不严是军队建设的腐蚀剂；如果不高度重视军队的管理，就会造成军队凝聚力、组织力、控制力和战斗力的减弱，就会造成官兵整体观念、纪律观念的淡化；只有坚持实行正规化科学化管理，从严治军，才能保证和平时期军队的战斗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2.从军队战斗力与人的关系来看，人是战斗力的主体；充分认识新时期官兵状况的变化，面对现实，从严治军，才能在能动的、自觉的基础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邓选》第78页）一语道破了军队管理的实质。人是战斗力中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然而，人是变化的、发展的。在新的时期，不仅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而且“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邓选》第115页）干部中，经受过战争考验的越来越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邓选》第78页）战士中，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视野、方式，与战争时代的兵员大不相同。过去是“参军光荣”，现在是“当兵尽义务”，过去是立功受奖吸引力大，现在是获得一技之长的心情迫切；过去只求穿暖吃饱，现在是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全面要求。

官兵状况的变化直接反映到官兵关系上，处理不好，就必然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战争年代，官兵关系每时每刻都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和锤炼，同志爱、战友情体现得明显直接，而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时却变得复杂多样；战争年代，官兵在恶劣的环境、艰难的条件下同舟共济，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出现了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异；战争年代，官兵都被紧紧地维系在战争的胜负上，而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现代化建设这个共同目标在本质上的—致，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非本质的差异。

如果我们不充分看到这些新的变化，“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邓选》第335页），那么，管理就会无的放矢，就可能抑制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官兵团结就没有基础，军队的战斗力就难以巩固和提高。

3.从军队战斗力与武器装备的关系来看，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物质基础；充分认识新时期军队物质基础的变化，从严治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历史到了今天，我军已经历了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由诸军兵种合成到组建合成集团军，加强新的技术部队和后备力量建设的阶段。我军的武器装备，已经改变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状况，依靠自己的力量，先后造出了新的大口径火炮、坦克、装甲车、飞机、舰艇等常规武器及相应配套的装备器材；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用于自卫的原子弹，氢弹、中程远程导弹等战略武器；随着对电子、激光等新技术的逐步掌握，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自动化指挥系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加大了战争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强化了战争的时间性、复杂性，在客观上需要增强官兵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服从命令意识，使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令行禁止，都能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指

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这就要求加强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协调一致，而“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邓选》第363页）；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带出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团结友爱、密切协同，步调一致、服从大局，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部队。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不仅要求通过管理工作培养军人的整体、协同、快速观念，而且还要求通过正规化的训练管理，熟练掌握现代武器装备的操作技能，把官兵的军事技术素质提高到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水平。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队教育训练着手？”（《邓选》第57页）很显然，要把教育训练落到实处，首先遇到的就是依法从严治训，按照条例条令的规定，全面落实部队训练的兵力、时间、内容和质量指标。

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并不排除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效能。依据条令条例，加强现有武器装备管理，使之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随时形成应付战争所必须的战斗力，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只能是现实水平的高低结合和新旧并存。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邓选》第74页）因而，向管理要战斗力，其中就包括了管好用好现有装备，立足于用现有装备取胜。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向正规化、科学化管理要军队建设的效益，要军队的战斗力，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行，军队成员状况的不断变化，武器装备的更新发展，等等，都对管理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全军同志务必明确认识，在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新形势下，管理教育的地位、作用更加重要，任务也更重了。任何忽视管理、放松纪律的现象都是不能容许的。

第二节 新时期军队管理的一般原则

加强军队管理工作，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长期的建军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理论上概括了具有我军特色的一整套管理军队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成为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建国以后，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反对正规化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毛泽东治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干扰，使我军正规化管理蒙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以其几十年治军的丰富经验，从整顿入手，以国法军纪为依据，以正规化建设为目标，开辟了以法从严治军的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重视从研究军队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

导现实的军队建设，是他从严治军思想科学性的集中表现。他提出的新时期军队科学化、正规化管理的一系列原则，不仅重新恢复和肯定了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的地位，而且结合新的实际，从拨乱反正和长远建设的需要出发，完善和丰富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法从严治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成为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大战略措施。

一、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

军队的管理，虽然是世界各国军队共有的、普遍的规律，但由于军队的性质不同，建设军队的目的不同，所以在同样的管理工作中就有其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的管理必须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

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军队管理，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正规化管理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同志多年来始终强调，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选》第159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邓选》第317页）对于军队来说，他尤其强调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一再重申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军队管理要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就是要听从党的指挥，把全军指战员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党所指引的目标上来，“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邓选》第79页）

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军队管理，就是要通过严格、正规、科学的管理，把军队的各级组织、官兵的思想政治建设、战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后勤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都紧紧地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都要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都要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出发，服从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军队建设的中心。

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军队管理，就是要清除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和影响，从严治军。邓小平同志经常讲，一个革命军人，只有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算够了格，只靠冲两个锋，是不够格的。针对十年动乱给部队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影响，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一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是自觉遵守纪律。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邓选》第78、80页）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影响，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邓选》第148页）实践表明，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严肃纪律、严格管理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讲政治纪律，松懈组织纪律，四项基本原则就必然受到干扰。

很清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都是从和平时期从严治军的需要出发，从保证四项基本原则的贯彻、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持军队集中统一的

高度出发提出来的。

二、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为目标

军队管理的目标是管理工作的起点和归宿。“军队是要打仗的”，这是邓小平同志逢会必讲的一贯思想。它指明了军队实现双重职能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也表明了包括管理工作在内的军队各项工作的整体性目标，即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把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管理的目标，就必须在军队各项工作中实行全方位的管理，因为战斗力是诸多因素、条件的有机融合。早在1952年7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培养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邓小平同志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具体地阐述了对军人、人事和人力的管理，对武器装备等物的管理，对军事经费即财的管理，对作战、训练、行政和政治工作的管理，等等，并强调通过这些具体的、全面的系统管理，达成有机的综合，即保证部队具有正规化的工作秩序、训练秩序、战备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持军人庄重、威严的形象，核心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管理的目标，就要求各级的决策管理无条件地服从军队建设的大局。邓小平同志认为，整顿纪律、抓好管理，对于负有决策职能的各级领导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邓选》第79~80页）这就是说，各级的管理工作要为战斗力服务，就要做到下级的管理决策与上级的总目标相一致；本单位各项工作的决策与本单位的总目标相一致；被管理者与管理者在目标认识上的完全一致。只有这样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才能达成军队管理应有的效益。

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管理的目标，就要求各级的管理者围绕整体目标，实行按级负责。邓小平同志十分赞赏列宁的名言，“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他强调指出：“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邓选》第140~141页）他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极为形象地告诉我们，工作要有秩序、高效率，“就要有分工负责，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这样才能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影响大局。“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邓选》第67页）邓小平把“抓头头”和“抓方针”作为领导实施管理的要诀，是现代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的重要原则。

三、实行正规的法制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军事法规的建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关军队建设法律近20个，由国务院、中央

军委颁布的单行军事、军队法规达 40 多个，总部机关重新修订和制定的军队具体法规就更多。这标志着我们以法治军的正规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以法治军，要有法可依。这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他认为，军队的管理必须法规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针对许多管理工作不落实的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选》第 136 页）这一重要思想，扬弃了传统的经验治军方法，用国家的法律、法令，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军队，把从严治军的方针奠定在严得合理、严得适度、严得科学的基础之上。

以法治军，要用法引导。军队管理工作的第一位是军法、军纪教育，而不是惩罚。邓小平同志历来把法纪教育作为管理工作的基础环节，他指出，“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改善。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邓选》第 319 页）注意以法引导，用法教育部队，是我军管理工作本质的要求。对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对一些错误现象、思想问题，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对待，“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邓选》第 335 页）“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邓选》第 337 页）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我军管理工作为官兵健康成长服务的目的，完全区别于军阀主义、惩办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管理。

以法治军，要赏罚严明。有法不依，形同虚设。因而，邓小平同志历来把赏罚严明作为以法治军的必备条件。他说，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按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行事，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要重申这个问题，这是传帮带的主要内容之一。”（《邓选》第 79 页）他要求，对于违反纪律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邓选》第 137 页）对于那些不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不服从命令的人，他严肃提出，“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邓选》第 79 页）

以法治军，尤其要注重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军队的各级组织、全体人员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们那一派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邓选》第 17 页）他严肃地批评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明确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提出要“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邓选》第 328 页）提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重申和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在党内、军内和政府系统，要坚决反对一切不遵守党纪、军纪、政纪的现象。”（《邓选》第319页）

四、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从严治官

军官在军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的“治军先治官、治军严治官”的思想。

之所以要“先治官，严治官”，是因为“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邓选》第119页）军队管理工作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去按级抓落实，然而，对于被管理者来说，不仅要接受权力的影响力，而且要接受行为的影响力；不仅要判断你管理的正确与否，而且要依据领导行为来决定自己行动与否。“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邓选》第119、120页）

之所以要“先治官，严治官”，是因为相对和平时期的军队管理中，“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邓选》第139页）。在整个军队管理系统中，各级军官都担负着相应的决策和执行的职能，而一切正确的决策都来源于官兵群众的实践，正确决策的执行，也同样产生于对官兵群众实践的正确指导。松、散、乱，是平时时期部队管理中的一大难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军官中出现的怕艰苦、不深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现代军队来说，这一点危害更大。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军官的管理工作就是为士兵服务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他批评说，有一个时期“连队的伙食普遍不好，花钱很多，吃得很差，这就是管理问题。”（《邓选》第200页、21页）他认为，军官的作风好，就可以解决管理工作的一切困难，“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邓选》第200~201页）

之所以要“先治官，严治官”，是因为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到军队管理的实际效益。现代化军队，对正规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正规化的实质就在于行动规范化、管理科学化，说到底是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解决“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1）通过院校严格训练，提高军官的管理能力。“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邓选》第57页）因为现在同过去不同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邓选》第21页）除了在职训练干部，还要送他们到院校解决“管理能力弱”的问题，使我们院校输送到部队的干部真正达到：“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邓选》第60页）（2）通过从严治训和传帮带，增强军官从严治军的意识。新时期的军队管理，既要强调一级做给一

级看的表率作用，又要注意在管理实践中一级带着一级干。正如杨尚昆同志在 1985 年 9 月 28 日的讲话中所说的：“老同志带班要带这个‘严’字，新同志接班也要接这个‘严’字，不能马马虎虎。”（3）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外军的管理经验，拓宽管理工作的视野。邓小平同志在讲到现代经济管理时，明确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号召广大干部“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邓选》第 143 页）。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军队管理。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十分重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选》第 371 页）这就是说，借鉴外军的经验，走我们自己的管理之路，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开口巴顿，闭口拿破仑，有的把简单粗暴视为“严格管理”，而对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知之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从严治军的科学性，其原因就在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开放等同于照搬。

五、在调动全体官兵积极性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

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军队管理，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军创建之始就提出来的。他指出：“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75 页）邓小平依据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光辉思想，把军队民主与集中在管理工作中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首先，治军从严，要正确认识官兵、对待官兵。邓小平认为，“就官兵关系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要很好地研究，”（《邓选》第 115 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官兵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他曾举例说，“兵里面有些人，科学知识比连长、指导员多，就得请他当教员。”（《邓选》第 80 页）根据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后出现的新情况，他又多次提醒“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对于部队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事故，他认为许多是“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邓选》第 78 页）。这些重要论述，都表达了一个鲜明的思想：新时期军队管理要客观地认识和对待军队的官兵，全面地把握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真正把全体官兵放在军队主人翁的地位。

其次，治军从严的主人翁精神，来自于军队的民主。军队的管理过程，实质上是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积极性的过程。各级干部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因而，它不是某一层某一个人的特定任务，而是人人有责。因而，调动全员积极性，实行民主管理尤为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邓选》第 80 页）他认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因此，“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邓选》第 134 页）他认为，管理者必须倾听被管理者的意见、建议和呼声，“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邓选》第 134、135 页）他认

为，管理者要自觉地接受和欢迎被管理者的监督和批评，对被管理者的不同意见，“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邓选》第135页），而是要“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邓选》第301页）。“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邓选》第133~134页）

第三，严格的管理，高度的集中，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条件和结果。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邓选》第246页）“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邓选》第161页）“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邓选》第319页）对于军队来说，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集中更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邓选》第363页）一句话，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是军队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

第四，科学化管理的前提在于正确的集中和决策。邓小平同志不仅对军队民主建设、集中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十分重视管理者集中和决策的正确性。他在批评一些人命令不执行、指挥不服从的错误时，非常严肃地指出，“当然，决定一项事情，领导上要慎重，要注意”（《邓选》第79页）。这一要求，说明集中和决策的正确与否，对执行和服从有直接的影响。他在讲到广开言路和集中的关系时又指出：“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邓选》第135页）这就告诉我们，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机械组合，而是在民主中辨别是非，在集中中形成正确的决策和指导，这是搞好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治理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相对和平时期的军队管理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回答和解决了军队管理工作中的许多新问题。尤其是他关于以法治军、科学管理、从严治官、集中统一的思想，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需要，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成为新时期军队管理工作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九章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

斯大林同志说过：“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3页）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肯定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才，干部，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兴亡、事业的成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十分重视人才、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为了实现国家的“四化”和军队的“三化”，他提出了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干部队伍的总体方针。这个方针为新时期我军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第一节 “四化”方针的提出及其战略意义

一、“四化”方针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军也进入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三化”成为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毛泽东同志说过：“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同样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善于治军的干部队伍。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我军干部队伍的严重破坏，我军干部队伍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同我军“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不相适应。

一是干部队伍不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揪军内一小撮”、“揪带枪的刘邓”，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我军大批干部。同时，在组织上拉山头，搞宗派，任人唯亲，封官许愿，排斥打击公道、正派、有能力、有作为的好干部，包庇重用投机钻营、卖身求荣、品质恶劣的“凤派”和“震派”人物，竭力拉拢和培植一批帮派人物。林彪、“四人帮”虽然先后垮台，但是，那些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反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有些仍然窃据着军内的领导岗位。这些人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给军队建设带来很大的祸害，根本不能指望他们来实现我军“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

二是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军干部队伍就存在老化问题。建国初期，县、地一级的领导干部，年龄多在20来岁，省和中央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多在40多岁。到了六十年代初，各级领导干部年龄比建国初期普遍提高了10多岁。军队，特别是军以上班子的情况也差不多。因此，邓小平同志在196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干部年轻化问题。他指出，干部年轻化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个带有方针性质的问题。干部中经常要有新的血液，要有新的接班人，要让比较年轻一点的、政治思想好的共产主义者来接班。那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干部年龄老化这个问题，但毕竟还不是十分严重和突出。经过“文化大革命”，干部年龄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1975年以后，部队几次实行精简整编，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多次大的调整，但是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并没有解决。据统计，1982年大军区

领导班子平均年龄 62 岁，比六十年代提高 11 岁；作战部队军级班子平均年龄 55.7 岁，比六十年代提高 8 岁；作战部队师级班子平均年龄 48.6 岁，比六十年代提高 6 岁；作战部队团级班子平均年龄 39.1 岁，比六十年代提高 1 岁。干部队伍年龄老化，必然使各级领导班子缺乏生机和活力，同我军“三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

三是干部队伍知识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本来就不高，有很大数量的干部文化水平偏低，还有些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为此，在五十年代初，全军就曾经大张旗鼓地开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运动，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后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了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对干部片面强调阶级成份，而忽视了干部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干部选拔不大胆，使用不放心，造成了各级领导班子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知识的状况。据 1966 年底统计，全军干部的文化程度，大学程度者占 7.01%，高中程度者占 14.8%，初中程度者占 52.7%，小学程度者占 25.5%。到 1982 年，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全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仅占 50.5%，在野战军班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 2.9%。而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美国军队中，98.6%的军官是大学毕业或肄业的文化程度，军官中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占现役军官总数的 89%以上。苏军中，90%以上的团级指挥员和全部旅以上的指挥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战略火箭军中百分之百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日本军队在 1984 年也把全部现役军官提高到大学毕业水平。我军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不仅同这些发达国家的军队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相比，也有明显的距离。这种状况已经明显地跟不上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已严重影响我军“三化”建设的进程。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在 1982 年 8 月 31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干部问题时，深刻地指出，“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邓选》第 283 页）对于选用人才的方针问题，他在这次讲话中初步提出了在德好（即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选》第 286 页）依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1980 年 6 月 27 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决定，要求全党“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1982 年 9 月，在党的十二大闭幕词中，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选》第 372 页）的号召，这就全面地、系统地形成并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

二、实现干部“四化”的战略意义

为了引起全党全军对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强调实现干部“四化”的重大战略意义。

1. 干部“四化”，关系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干部是建军之本。几十年来，我军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本的经验，一是靠党的正确领导，二是靠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建国初期，我军由战争年代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军委就一再指出，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首要的是大力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总任务，关键就是要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我军“三化”建设的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选》第175页）他还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邓选》第193页）这就告诉我们，确立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总任务以后，还要有人来干。但是，由谁来干？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不能干，年龄太大的人于不动，缺乏知识和能力的人又干不了。因此，只能由那些政治上可靠，年富力强，又有知识和能力的人来干。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就是为我军“三化”建设造就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以保证“三化”建设顺利实现。

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来看，我军现代化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二是军事人才的现代化；三是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这三个方面，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尤其是干部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干部，尤其是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政治合格、身体健康，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也就是要实现“四化”。可以说，没有干部队伍的“四化”，也就没有我们军队的“三化”。因此，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邓选》第351页），也是军队建设的战略需要。

2. 干部“四化”，关系到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的胜负

现代战争的实践表明，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仍然是人。但人的因素不仅仅是勇敢、不怕死，而且包括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技术熟练程度、组织指挥能力以及强健的体魄等等。知识就是力量，对军队来说，知识就是战斗力。要驾驭未来战争，熟练使用现代化的武器，都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今天我们则可以说，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军队，在未来战争中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为此，在几次军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都精辟地指出，现代战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军要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抓紧培养军事人才。他说：“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邓选》第253页）他还说：“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在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空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邓选》第228页）邓小平同志正是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看到了“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邓选》第58页），从而看到了实现干部“四化”，对于我军夺取未来战争胜利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告诫全党、全军，“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邓选》第286页），抓紧培养适应现代战争的“四化”干部。

3. 干部“四化”，关系到党和国家、军队的命运

干部问题，实质上是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它是关系党和国家、军队命运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立即着手在全党范围内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并且把它作为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他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接班的问题。”（《邓选》第176页）1975年，王洪文在上海跟人说：“十年后再看”。这件事，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几次对老干部们说：“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因此，“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邓选》第197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正是从领导权不能落到王洪文之类的坏人手里这样一件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上，强调了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邓选》第194页）。这件事情解决不好，“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邓选》第352页）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担负着抵御外来侵略，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重要职能。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军队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就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四化”顺利实现。因此，他非常关心和重视军队干部队伍建设，一再提醒我们：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邓选》第70页）“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邓选》第118页），并且特别强调枪杆子必须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我军的多次整顿，选拔人才进入领导班子，从根本上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

综上所述，干部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军队建设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我军干部队伍状况同“三化”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实现干部“四化”同实现党的路线和我军“三化”建设总目标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一项事关党和国家、军队命运的战略任务。他牢牢抓住人才是建军之本这一关键问题，致力于我军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观《邓小平文选》，在有关干部、人才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讲得最多，所占篇幅最突出。文选从开篇到结尾，贯穿着人才思想。这本身就足以引起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第二节 “四化”的内涵及真相互关系

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同志不仅阐明了实现干部“四化”的战略意义，而且对“四化”的主要内容及相互关系也作了具体的阐述，为“四化”规定了科学的内涵，明确了“四化”的内在联系。

一、革命化是用人的政治标准

革命化主要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备优良的思想作风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廉洁从政，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干部有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这是革命化的核心。

革命化标准也就是德的标准。不同阶级或政党都有自己不同的德的标准。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用人问题上都强调德。

德不是抽象的，它通过人的社会活动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其中主要表现为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在阶级社会里，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总是主要代表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志。强调德，也就是强调所用之人必须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在封建社会里，“忠君”，被封建统治者看作最美的德。姜子牙忠实于周文王、周武王，帮助周武王打下江山；管仲忠实于齐桓公，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文种忠于越王勾践，帮助越王复活了越国；诸葛亮为报刘备三顾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都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有德的楷模。封建统治者正是通过这种德，使人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用人的政治标准是无产阶级意志、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组织路线是力政治路线服务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党的政治路线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保证。在选拔使用干部时坚持革命化的标准，对干部提出革命化的要求，正是为了使进入领导班子的干部，都具有必备的政治素质，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使我军“三化”建设顺利进行。

在用人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政治标准，并且针对具体的历史条件，对政治标准作过许多具体的阐述。早在1975年，针对林彪、“四人帮”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以人划线，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同志就严正指出：“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邓选》第2页）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强调：“在调配领导班子时，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当然不能让他们进来。”“还有另外一种人，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但是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这种人不仅不能进领导班子，也不能留在军队。”（《邓选》第71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指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邓选》第141页）以后他又指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选》第177页）“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

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邓选》第 225 页）1985 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把这些政治标准具体归纳为四个要，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 151～152 页）

可见，在不同时期，革命化有具体的历史的内容。邓小平同志对它作了高度的概括，其基本点主要是：政治品质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道德品质好，不搞派性，任人唯贤，公私分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风正派，善于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办实事。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为我们培养、选拔、使用干部提供了政治标准，而且也是对干部的政治要求。

二、年轻化是对于都任职的年龄要求

年轻化主要是指对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身体素质和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要求，在领导班子中有老中青不同层次年龄干部的合理搭配，形成梯次配备，并且逐步使中青年干部占多数，以便保持领导班子的活力，使各级领导班子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够担负起繁重紧张的工作，并能顺利进行正常的新老交替。

年轻化的实质，首先在于解决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如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大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精简机构的必要性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仅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要亡党亡国。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把革命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保证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继往开来。

其次，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也是为了能够保持领导班子的活力和生机。在搞政治体制改革和考虑领导班子人选时，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从精力上说，能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这一点切不要忽略。”（《邓选》第 194 页）“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选》第 193 页）邓小平同志 1986 年 11 月 3 日在会见陈省身教授时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各级机构的活力。要保持活力，就要实行干部年轻化，不搞年轻化就不可能有活力。”所以，实行干部年轻化，才能使领导班子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起繁重的工作任务。

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军队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更要年轻些”（《邓选》第 60 页），“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邓选》第 38 页）但是从我军干部队伍情况来看，“特别还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军区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

过几年，统统老了，不但不能到军、师工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邓选》第 249～250 页）为此，邓小平同志从军队特殊使命和未来战争的要求出发，具体要求军队干部年龄达到“团级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军级五十岁左右。”（《邓选》第 342 页）这个年龄要求，经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实战要求的。

三、知识化、专业化是对干部的知识 and 能力要求

知识化和专业化主要是指，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职务相适应的理论政策水平；对所担负的工作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实际业务工作能力，成为本行的有专业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内行和专家。

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实质，就是要求干部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在人类历史上，大凡政治的革新，战争的胜利，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盛，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进步，无不和各个方面的人才所起的决策、发明、创造、实践等活动相联系。

因此，凡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才。历史上，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等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并取得辉煌业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识才用才，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以史为鉴，我军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一大批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人才，是决不能成功的。

邓小平同志对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问题非常重视，一再强调：“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选》第 37 页）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邓选》第 253 页）为此，他要求军队干部，“要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邓选》第 58 页）；要“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邓选》第 59 页）可见，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知识化、专业化，主要就是要求我军干部必须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化战争知识，并且掌握胜任本职工作必要的专业知识，具备胜任本职工作的业务能力和进行合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领导班子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将直接影响整体的效率和个体作用的发挥。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整个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并且领导广大群众，按照专业的要求，去学习和工作。”（《邓选》第 226 页）现代战争对干部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我军的专业技术干部既缺又弱。这种一般干部多、专业技术干部少的状况是同现代战争的要求很不适应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就是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量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并且在配备领导班子时，敢于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提拔到领导班子中来，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战争的需要。

四、“四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贯彻执行“四化”方针时，既不能用革命化来代替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不能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来降低革命化的要求。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四个方面就没有重点。“四化”之中，革命化始终是第一位的。它是选拔使用干部、配备领导班子最重要的前提。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过：“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邓选》第366页）“首先是要革命化”，“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邓选》第320页）这同邓小平同志坚持“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一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军队面临干部年龄老化、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建设最中心的问题是领导班子年轻化，其余的都好办。”从而提出：“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邓选》第366页），当然，干部年轻化必须遵循干部成长发展的规律，符合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不能脱离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孤立地搞年轻化。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邓选》第320页），“不排除个别身体好的人年龄也可以大一点”（《邓选》第61页）。这说明邓小平同志在考虑年龄要求时，并不是一味追求越年轻越好，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同其他三化一起通盘考虑，防止片面性。

知识化、专业化也是干部不可缺少的条件。邓小平同志强调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邓选》第226~227页）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化本身就应当包含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但革命化毕竟不能等同于知识化、专业化。它们之间也不能互相替代。

“四化”是对干部的全面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一化来代替其他的三化。同时，“四化”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是对干部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总的要求，不能简单地同选拔干部的标准划等号。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并不是说，不具备这三个条件或不合其中某一两个条件的德才兼备、善于学习、身体也好的同志就要调离。”（《邓选》第320页）这就告诉我们，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四化”方针。在选拔干部时，不能机械地套用“四化”，而是应当在“四化”方针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岗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来确定选拔干部的具体条件。这样，“四化”方针才能得到正确的贯彻和执行。

第三节 按照“四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四化”方针的同时，还对如何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作了全面、深刻、具体的阐述。

一、打破陈规陋习，更新用人观念

在用人问题上，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残留着许多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主要的，一是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阶级出身和使用工农干部，不敢放心大胆地提拔和重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二是论资排辈，只重资历，不重实际水平和能力，特别是看不起年轻人，认为“姜还是老的辣”、“嫩竹扁担挑不起重担”，因而不敢大胆提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三是求全责备，金要足赤，

人要完人，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把用人标准绝对化、理想化，不敢大胆使用那些虽有某些缺点，但确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之才。正是这些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成为贯彻执行“四化”方针的严重障碍。为了实现干部“四化”，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邓小平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冲破“左”的束缚，打破旧的框框，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用人观念。

1. 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大胆提拔和重用德才优秀的知识分子。针对“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称作“臭老九”，肆意践踏和摧残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选》第86页），“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邓选》第90页）。他充分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邓选》第46页）为此，他指出，“‘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要求全党“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邓选》第40页）。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邓选》第38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基本观点，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排除“左”的影响，大胆提拔和重用德才优秀的知识分子；对制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起了重要作用。

2. 破除“论资排辈”的旧观念，敢于选拔德才优秀的中青年人才。鉴于在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上“障碍重重”（《邓选》第368页），“做得不理想”（《邓选》第365页），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不是没有人才，“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邓选》第195页）是由于“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邓选》第284页）他尖锐地批评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邓选》第197页）要求老同志“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不如我们行。”（《邓选》第229页）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非常赞赏“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这种用人制度（《邓选》第197页），竭力主张“选拔人才可以破格”（《邓选》第195页），“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邓选》第93页），“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邓选》第197页）。针对一些同志在“台阶”问题上的误解，邓小平同志进一步解释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邓选》第284页）并不排除那些政治品质很好，思想路子对，又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可以破格使用。他说：“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邓选》第284页）“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邓选》第284页）针对军队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还强调说：“军队有它的特殊性，干部还是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提，但是也要打破老框框才行。”（《邓选》第195页）为此，他要求老同志在解决年轻化问题上要开

明，要带头，要有意识地让出位子，主动地荐贤举能，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再一次为党、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

3.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看干部的主流，用干部之所长。在选拔使用干部问题上，“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阻碍着我们更多更快地选拔人才。不少干部就是由于家庭出身，或者有历史问题，或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缺乏经验而影响了正常的使用。为了拓宽人才的来源，成千上万地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干部，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邓选》第48页）。他一贯认为：“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选》第90页）“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邓选》第35页）为此他竭力主张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对人才“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邓选》第90页）针对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说：“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称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79页）他还针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被人认为“骄傲”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骄傲’两个字我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邓选》第342页）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而且要看他在现实斗争中的表现，一个人只要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能说他是白，就应当大胆地使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为在新时期拓宽用人之道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二、严格按照德才兼备原则选拔培养干部

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的领导权交给什么人，直接关系到军队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人手里，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四化”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套选拔任用干部的具体标准。这就是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坚持选贤任能。

选拔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德才兼备最集中地反映了人才的本质属性。古今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在用人问题上，虽然说法不一、标准各异，但在坚持德才兼备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提出“举贤才”。孟子也提出“尚贤事能”。唐太宗李世民认为，用人应以“德行学识为本”。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在他的变法中也提出了“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低而官使之”的主张。可见，自古以来，都认为用人要用有德有才之人。

国外在用人问题上也是强调德才兼备标准的。斯大林同志1937年3月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

出：“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准，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他明确提出了政治与业务并重的标志，与我们所提的德才兼备原则相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喜欢微观地、具体地提出用人标准，条数很多、很具体、很细，有的多达二十几条，但是，不管提多少条，不外乎还是德和才这两个方面。

综上所述，德才兼备的原则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个阶级，尽管他们赋予德和才的内涵有所不同，但是都主张按照这一原则选拔人才。

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于部，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德与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离开德，才的发挥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重用了有才而德行不好的人，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没有才，德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就做不出应有的贡献；任用有德无才的人，就完不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同样要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几十年来，我们党正是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培养造就了一支能治党治国治军的干部队伍，保证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各项任务的完成。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更好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任用干部，才能为我军“三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德和才的内容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的任务及实现这种任务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不同，因而对干部德和才的具体要求也不完全一样。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时期的需要，对德和才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选》第286页）他还说：“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邓选》第355页）也就是说，依据“四化”方针，选贤任能，是邓小平同志选人用人思想的核心。它坚持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继承和发展了我党我军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优良传统，为新时期如何选拔和任用于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主要应做到：

第一，坚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注重从政治上选拔和使用干部。德和才比较，我们应更重视德。特别是军队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更应当重视干部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尤其要注意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现实表现，“一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邓选》第72页）把那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同时坚决把那些不符合政治条件的人调离或撤换，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我军的干部队伍，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

第二、在革命化的前提下，注意选拔和使用有真才实学的干部。要按照专业化的要求，把那些政治本质好，又确有知识、能力，能够带领官兵开创我军“三化”建设新局面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在对于部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上，既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不能只看文凭、学历，要注重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实际经验。

第三，在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也要注意年龄和身体条件。在身体素质上，要选精力充沛，能够担负和胜任繁重工作的人；在年龄条件上，要按

照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的标准选配干部和组建领导班子。

总之，人才的选拔，要坚持标准，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发挥每个干部的积极性。

三、完善干部制度，实现干部管理制度化

在新时期保证干部正确地选拔，合理地使用，干部管理要法规化、制度化。邓小平同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邓选》第342页）“现在军队里的干部问题很值得注意。怎样按照选拔干部的条件去做，这很重要。”（《邓选》第21~22页）为此，他提出了完善干部制度的一整套设想，并且作了很大的努力，要使干部管理制度化，从制度上保证我军干部队伍实现“四化”。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缺少必要的法规和制度，在选拔和使用干部问题上，主观随意性相当大，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有的人老以为自己一贯正确，闹新的山头主义，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好恶作标准来看干部，对自己好的就拉过来，不好的就排挤，总想自己搞一帮人，总以为不搞一帮人就办不成事情。”（《邓选》第72页）鉴于在干部问题上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选》第293页）他认为：“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邓选》第286页）“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选》第292页）“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邓选》第198页）对建立这样一个制度，邓小平同志作过许多具体的指示。他指出：“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邓选》第251页）他还提出：“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邓选》第252页）他要求有关部门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设想和我军“三化”建设的需要，我军制定和颁发了新的《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这三个条例成为我军干部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使我军干部工作制度化迈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干部工作要建立一系列基本法规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工作制度的设想，主要是：

1. 选拔制度。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经院校培训生长干部的制度。他说：“军官的晋升也要制度化。每个阶段的晋升都必须经过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知识。”“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排连干部要初级步兵学校毕业。”“营团干部要进过中级军官学校。”“军和师的领导干部也要进过高级军官学校的才能当。”（《邓选》第253页）由于坚持了这一制度，我军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的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86年，集团军班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2%；总部、大军区、军兵种一级的领导干部，60%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经过院校培训的占75%；在军事干部中，空军的全部会飞行，海军的大多数会操纵舰艇，二炮的大多数能组织指挥导弹发射。各级领导班子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2.考核制度。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邓选》第119页）对如何进行考核，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经过政治机关去考核、审查干部”（《邓选》第22页），在考核中，“我们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邓选》第71页），并且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邓选》第141页），把干部的考核，同教育、使用、奖惩结合起来。

3.升降制度。邓小平同志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提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邓选》第291页），“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邓选》第142页）对选错了的干部要坚决换下来，不能只能上不能下。

4.退休制度。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退休制度，并且强调：“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邓选》第252页）“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邓选》第198页）这样，才有利于解决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

5.交流制度。邓小平同志认为，干部“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邓选》第23页）因此他主张：对于干部要适当进行调整和交流，“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把干部交流一下，不要挤到一堆。”（《邓选》第23页）

6.监督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彻底解决少数干部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选》第292页）他主张：“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选》第292页）

四、重视培训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军指挥员，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勇气概，而且要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更高的指挥艺术，有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但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和科学文化知识，与现代战争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邓小平同志深感不提高全军干部队伍的素质，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他大声疾呼：“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选》第58页）他还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邓选》第58页）但是，承认现实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实。他认为：“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邓选》第58页）从这个起点出发，邓小

平同志提出了提高干部素质的多种途径。他主张在和平环境下，提高干部素质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靠训练，现在不打仗，提高干部素质，提高整个军队素质，主要靠部队训练。另一条是办好院校，加速干部培训和轮训，从而大大提高我军干部队伍的军政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干部的培训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不仅着眼于军队建设自身的需要，而且还着眼于军队干部转业后到地方工作的需要，提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设想。

1977年12月，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们说，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就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邓选》第76页）

1983年8月1日，邓小平同志又亲笔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人民日报》1983年8月2日）。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对于部队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指明了和平时期，军队干部培养的方向和路子。

五、加强干部部门自身的建设

党管干部是通过政治机关来实施的。政治机关管干部，是我军的传统。政治机关，尤其是干部部门作为党的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自身建设如何，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能否落实。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四化”方针的同时，对我军干部部门的自身建设十分关注，要求全军“特别要注意加强管干部的部门”（《邓选》第22页），并对干部部门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 强调要选好干部部门的干部。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邓选》第22页）因此，“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还要注意选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邓选》第73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干部部门选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且还规定了干部部门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这对于进一步改善干部部门的形象，树立干部部门的威信是十分必要的。

2. 强调干部部门要勇于改革，慧眼识人。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邓选》第286页）这就要求干部部门的同志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彻底转变陈旧的用人观念，坚决改革不合理的用人制度，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当好“伯乐”，使干部部门在识人用人问题上真正成为党委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3. 强调要严格按照组织原则选拔干部。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传统

历来是政治机关管干部，首长总要经过政治机关去考核、审查干部，这才符合组织原则。要把这个好的传统继承起来。”（《邓选》第 22 页）他尖锐地批评有些人闹新的山头主义，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好恶作标准来看干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选拔任用于部不能用个人的好恶作标准，而应当由干部部门去考核、审查干部，按照干部部门考核、提议，政治机关审查把关，党委讨论决定这样的程序来进行。这样就能有效地克服在于部问题上的不正之风。

第十章 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政治工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在履行抵御外来侵略、保卫人民和平劳动职能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匡“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面临着和平环境的考验。为了保证我军经受住这三个考验，保证我军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必须重视和加强我军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针对这一新的特点和要求，邓小平同志不仅对军队政治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且紧密联系军队建设的实际，对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精辟、科学的回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节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但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我军进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政治工作还是不是我军的生命线？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

一、生命线地位决不能动摇

邓小平同志是我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有深刻的体验。因此，他历来认为在我军建设中政治工作处于生命线的地位，这是人民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离开了这条生命线，我军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并且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命线的地位决不允许动摇。

其一，强调抓人的因素，做人的工作，以保持我军的政治优势。邓小平同志1986年11月9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时指出：“我们过去艰苦奋斗，就是用坚定的信念把人团结起来的。几十年艰苦奋斗，我们的信念就是搞共产主义。这个信念是共同的，不是一两个人的，要万众一心。有了这个信念，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的400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我们那时没有飞机，没有大炮，没有兵工厂，就是靠人的因素，这种人不是普通的人，是有坚定信念的人。这对我们军队来说，现在仍是一个建军的原则，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同日本不一样。”（《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232页）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49页）这就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因素仍然是战争胜负、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邓小平同志始终把人的因素摆在军队建设的第一位加以强调和予以高度重视，要求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把人武装起来，把人团结起来，以保持我军的政治优势，使

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破坏，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竭力主张“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邓选》第21页）。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部分同志中出现了埋头经济工作、忽视甚至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邓小平同志及时提醒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29页）鉴于军队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使命，强调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邓选》第254页）在我军面临“三个考验”，全党思想政治工作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失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一度有所削弱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反复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邓选》第301页），“决不能削弱。”（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50页）为新时期如何保证我军性质，保证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其三，充分肯定新时期政治工作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总结军队政治工作在建国以后的经验教训，面对社会上贬低政治工作地位、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对政治工作的冲击，邓小平同志在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对，对政治工作予以极大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重申：“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甚嚣尘上，极力否定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企图进而否定党的政治工作，而我们队伍中又存在一些同志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10月，在《悼伯承》一文中，高度赞扬刘伯承同志“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这样做，不止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是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1986年10月21日《解放军报》）借此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工作的根本态度，再一次肯定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从而号召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高度重视新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并身体力行。

二、生命线地位体现在服务保证之中

从五十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等传统提法不见了，代之以政治工作“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冲击一切”等错误提法，把政治工作抬到一个不适当的地位，严重败坏了政治工作的声誉，给人们造成了思想上认识上的混乱。在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的影响下，一些同志对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后勤工作间的相互关系在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忽视甚至

不愿讲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政治工作，首先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关于“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的影响，端正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恢复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正确地解决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威信问题，使政治工作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注释本》第263页）。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强调：

“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明确表示了政治工作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在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以及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完整的科学的概括，并作为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就是，“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显然，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是通过政治工作在各项工作中的服务和保证作用来实现的。

强调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并没有降低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是生命线与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生命线的基本含义就是强调政治工作要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为我军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精神动力。生命线的地位体现在服务保障之中，生命线的的作用要在服务保障中去实现。离开了服务保障，“生命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为此，邓小平同志对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

第一，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我军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邓小平同志1989年11月在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指出，我们军队要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邓小平同志始终重视我军的政治建设，把保证政治上永远合格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他历来主张“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邓选》第254页）。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红，也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在政治上合格，就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他强调“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为了使军队“又红又专”，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第二，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我们这个军队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担负着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双重职能。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和使命决定了我军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由政治工作来保证。为此，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为了保

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邓选》第 323 页）“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邓选》第 326 页）从而深刻阐明了政治工作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

第三，政治工作必须为我军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通过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向部队官兵灌输进步的思想意识，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部队官兵用进步的思想意识来武装，就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一。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大大增强，但是对精神的作用有所忽视。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提出我军“三化”建设要以革命化为首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两手抓，都坚持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重视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他大力倡导的培养“四有”军人，培养“五种革命精神”等等，既是为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是为了激发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军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精神动力。

三、生命线的地位要靠全党全军来维护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由我军建设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及“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工作并没有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或者抬得老高，高于一切；或者降得很低，几乎取消。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不会自发形成，而要依靠全党全军自觉地加以维护。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 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两手抓”的方针。针对一些同志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片面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甚至否定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坚决主张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1986 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重申：“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 156 页）1989 年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他又一次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严肃批评了在两手抓问题上所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要求全党同志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实践表明，只有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的思想，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和只见物质、不见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切实把政治工作放到生命线的位上。

2. 提出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为了引起全党对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选》第 324 页）他要求党

的各级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邓选》第324页）邓小平同志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就是为了表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提醒全党同志高度重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3. 号召全党尤其是军队所有干部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全党同志都有责任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广泛的群众性，决定了这项工作只靠少数政治工作干部和政工部门去做是不行的。为此，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50页）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邓选》第301页）他针对军队的特点尤其指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政治人员都要做。”（《邓选》第254页）邓小平同志把加强政治工作作为军队所有军事人员、政治人员共同的职责，这是坚持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保证这项工作有人抓、有人做的最重要的措施。

第二节 政治工作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创新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有力地冲击了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但是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存在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复杂现象，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趁虚而入，给军队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向何处去？这个十分现实的重大课题摆到了全军指战员的面前。针对这一新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是：“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年1月27日引）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革命和我军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经过不断总结、完善，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军政治工作最富有生命力的原则和内容，

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动力。正如杨尚昆同志所说：“这些优良传统，是我们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是用鲜血换来的，是我们的无价之宝。”（《红旗》1984年第15期）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曾一度出现了贬低甚至否定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使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究其原因，一是政治工作的实际状况同新时期的新情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领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必然强烈地冲击着军队，深刻地影响军人的思想、观念，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军队政治工作由于十年浩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邓选》第1页），“左”的思想影响也并没有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完全消失，甚至还有一些“左”的东西被一些人当作“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因此，政治工作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了“左”办法不能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迷惘。二是一大批年轻干部对优良传统理解不深。据统计，从1969年至1982年13年间，由于新老交替，干部队伍平均每年更新近10万人。如此大规模地更新干部，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不少年轻干部对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理解不深，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了，这就很难做到去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三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优良传统进行别有用心地贬低和攻击，给人们带来认识上的混乱。优良传统是我军的传家宝，只有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才能保持我们的政治优势。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为了推翻党的领导，也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拼命鼓吹“优良传统过时了”、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上述情况表明，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首先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原则立场，把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对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承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第一，充分肯定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是好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邓选》第1页）他还说：“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军队不管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邓选》第15页）邓小平同志肯定我军的传统是好的，就是要我们不要丢掉这些优良传统，而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第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良传统没有变，也不能变。邓小平同志认为：“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但是，“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邓选》第114页）他还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邓选》第115页）。这充分表明，邓小平同志坚持认为历史条件变了，但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及优良传统所反映的基本精神，任何时候也不能变，必须继承和发扬。

第三，告诫全党全军要警惕丢掉优良传统的危险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他从群众所说“雷锋叔叔不在了”

这个事情上，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谆谆告诫全党全军：“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邓选》第18页）他还特别指出，优良传统的丢失，不能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邓选》第200页）从而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丢掉优良传统的危险性，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原因，尤其是要看到我们自己应负的责任。

第四，强调发扬优良传统的教育要长期抓下去。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对全党、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在总结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时，他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着重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当抓紧优良传统的教育，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才能够保持我们的政治优势，经受住新的考验。

第五，要求军队老同志在继承优良传统问题上要搞好传帮带。邓小平同志认为，“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为此，他要求“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邓选》第120页）从而为我军老同志指出了在继承优良传统问题上应负的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始终把优良传统看作我军的传家宝，看作我军的政治优势所在。因此，不仅过去要坚持这些优良传统，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让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才能保持我们的政治优势，保证我军本质永远不变。

二、政治工作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军政治工作同其他任何工作、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担负的任务、工作的对象，同过去相比，部有了很大的变化。单纯强调情况变化而贬低甚至否定优良传统是不对的。但是，墨守成规，固守已有的经验，不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也是不对的。事实上，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本身就是改革创新的产物。不进行创新，就不会有我军的政治工作，也不会有“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内部建立民主制度”等优良传统。同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进行创新，就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更不能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因此，只有实现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才会有出路，才会有新的发展，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始终贯穿着求实精神。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历来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坚决反对僵死的教条，他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创新，发表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1. 阐明了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做任何工作，为的是解决问题，但是问题能否解决，解决得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邓选》第 108 页）“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选》第 133 页）政治工作也是这样，“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邓选》114 页）这就告诉我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历史毕竟翻到了新的一页。政治工作所面临的时间、条件、对象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创新，不仅新时期的政治工作得不到加强，而且优良传统本身也不能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为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军“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并且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仍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邓选》第 116 页）从而阐明了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既是政治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客观现实发展变化对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

2. 提出了改革创新的正确方针。早在 1978 年 6 月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邓选》第 113 页）政治工作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邓选》第 118 页）。这些重要的指示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和我军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新鲜经验，1987 年 1 月 27 日通过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方针。”

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选》第 39 页）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不能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是必须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改革创新中，我们提倡借鉴外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引进教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但是，这些借鉴和引进，决不能无选择无批判地照搬照套，更不能用它们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借口改革创新，贬低甚至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企图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必须尊重历史，正确分析和对待政治工作的历史传统。批判地继承我们的历史遗产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优良传统是我军的传家宝，更不能割断历史，随意丢掉。只能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加以充实、完善、丰富和发展。有的传统过去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今天的历史条件变了而不再适用，可以加以摒弃。但是决不能把许多

今天仍然适用的优良传统一起抛掉。那种把优良传统说成是“不科学的”、“过时的”，认为改革创新就必须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看法和作法都是错误的。

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必须立足现实，立足于解决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从当前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任务、方针，增添新的内容，创造新的方法，以提高政治工作的实际效益。邓小平同志认为：“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邓选》第114页）“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邓选》第116页）他还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邓选》第165页）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必须切实为我军“三化”建设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要研究军队在“三个考验”面前如何加强我军政治建设，保证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等问题，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

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必须着眼未来，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当前，而要着眼于发展，考虑未来的需要，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要密切注视国际国内的大气候、小气候，看到它们对我军官兵可能与现实的影响，对未来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和方法进行预测，提出种种改革创新的设想和方案。只有根据军队建设发展的规律，加强对未来情况的预测，掌握事物的发展趋向，事先提出相应的对策，政治工作才会有创造性的发展。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这一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坚持这一方针，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军建设实际统一起来，把继承优良传统同改革创新具体统一起来，这是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唯一正确方针。

3. 指明了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指明了新时期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改革创新必须着眼于提高我军战斗力。这是由军队的根本职能决定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342页）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也曾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战斗队职能，也就是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职能没有变，仍然是我军的根本职能。因此，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归根到底，就是要保证我军战斗力的提高，保证我军在履行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根本职能中打胜仗。否则，改革创新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改革创新必须致力于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过去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动力，今天仍然是我军“三化”建设强大的精神力量。要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我军永远打胜仗，就必须通过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真正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否则，我军就会丢掉政治优势，战斗力也不可能得到提高。

邓小平同志不仅原则上指明了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而且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对怎样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就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关于军民关系，他指出：“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关于军队内部关系，他指出：“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

——他还说：“就官兵关系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要很好地研究”等等。（《邓选》第114~115页）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设想，我军政治工作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创新，有了重大的发展。

第一，端正了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恢复了政治工作“服务”，“保证”作用的传统提法，摆正了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

第二，把保证政治上永远合格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突出抓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全面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使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政治上合格，经受住了“三个考验”。

第三，按照“四化”要求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干部管理实现了制度化，干部队伍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保证了枪杆子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

第四，开展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丰富了教育训练和政治工作的内容。

第五，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了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

第六，提出了“八个不准”，充实了新时期我军纪律建设的内容，密切了官兵关系。

第七，坚持“疏导”方针，采用启发、研究、讨论的方式组织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开展部队、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拓宽了教育的路子，改进了政治工作的方法。

第八，改进了政治机关的体制、工作作风及方法，恢复了政治机关的职能、威信和作用，提高了机关工作的效率。

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创新的思想，符合我国国情、军情，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把培养“四有”军人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建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人的因素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人的革命化建设，更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我们要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军队性质，保证广大指战员建设军队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克服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和艰难困苦，加速建设的步伐，就首

先要抓好人的革命化建设，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一、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坚持精神文明的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因此，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是否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邓小平同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始终坚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他对精神文明建设所作的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是指导我们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1. 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选》第326页）“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当然还有‘五讲四美’，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精神都一样，都是对的。”（《邓选》第363页）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阐明了以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四有”新人。从而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长远目标和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干部战士培养成为“四有”革命军人。

2. 端正了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对物质文明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始终认为经济上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国力的增强，而且，“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75页）即使是对刑事犯罪活动，“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真正解决根本问题要翻两番。”“这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做工作就好做了。”（同上）这就从根本上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他又高度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号召全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之所以效果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不够重视。为此，他尖锐地指出：“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49页）他针对有些人鼓吹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超越历史阶段的谬论，明确指出：“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邓选》第326页）他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邓选》第 326～327 页）在这儿，邓小平同志用历史事实批驳了“超越历史阶段”的谬论，回答了在物质文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纠正了在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

3. 坚持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始终一贯坚持两个文明要一起抓的思想。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选》第 180 页）他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选》第 326 页）因此，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他在 1982 年 4 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看来必须有两手，一手是开放和搞活，一手是反腐败。如果干部的头头脑里只想到开放和搞活，忘记或放松了反腐败的斗争，结果就必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四化也实现不了。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

4. 提出了建设精神文明“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 149 页）他认为抓党风和社会风气，实质是一个育人的问题，因此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就是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同上，第 156 页）对于如何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从具体事件抓起”，“抓住事件的主要问题，查清了就处理”，“必须狠狠地、一天不放松地抓。”（同上，第 154～156 页）他还提出了要从教育入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等具体措施。为如何抓紧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具体的途径。

二、突出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在育人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说：“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他认为，“四有”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他特别强调：“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这就告诉我们，政治工作注意解决干部战士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思想问题是必要的，但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更是第一位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这是使我军干部战士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最重要的保证。

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选》第 159 页）为此，他始终一贯地呼

吁全党，“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针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旗帜鲜明地重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立场，坚定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76页）“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正。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同上，第159页）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他严肃批评了某些党的领导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同上，第160页）。“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事实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正由于他始终把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的命根子，因此，他毫不动摇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始终不渝地强调要突出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针对我国国情，富有远见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他指出：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总结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时又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为此，他强调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邓小平同志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求全党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决不放松。

为了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进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解放军出版社，《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77页）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是不搞群众运动，而以经常性的说服教育为主。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使青年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同上，第162页）“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邓选》第161页）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理想、纪律的教育，“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通过这些教育，使大家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二是不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和纪律、法律手段。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触犯了纪律或法律的决不手软，要绳之以纪、绳之以法，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疏导，包

括法律的处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对贯彻疏导方针的一个重要思想。三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决不允许宣传、理论、文艺等思想战线领域搞精神污染，助长一部分人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发挥思想战线的理论导向作用。

三、发扬五种革命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我军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求干部战士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求干部战士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四有”本身就包含着对军人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重视政治方向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人的革命精神的培养。他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邓选》第136页）为此，他决不容忍某些人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庄严革命口号的“批判”。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邓选》第326页）从而阐明了革命精神对于指导革命行动的极端重要性。

为了弘扬革命精神，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党和军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集中抓住了革命精神传统中最本质的东西，概括为“五种革命精神”。他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邓选》第327页）他坚持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选》第327页）邓小平同志把五种革命精神提到我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的高度，是对我们培养“四有”军人的重要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临“三个考验”的时刻，我们人民军队更应当努力发扬这五种革命精神，并把它作为我军的主要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

邓小平同志强调革命精神的重要，但绝不搞精神万能。为了同精神万能论划清界限，他始终坚持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的辩证统一。他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选》第136页）“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

自己的利益。”（《邓选》第297页）从而阐明了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的正确关系，为我军官兵面对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发扬奉献精神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四节 加强政治机关建设

我军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它主要是通过各级政治机关去进行的。因此，重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也必须同时重视政治机关的建设。在我军历史上，政治机关曾经有过很高的威信，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受到削弱，威信受到破坏，严重影响了我军的政治工作效果。为此，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邓选》第118页）邓小平同志还就如何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

一、要明确政治机关的性质、职能和作用

要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实际上理顺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政治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

历史上，我军政治机关同军事机关、后勤机关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密切融洽的。它们互相配合、相输相成，为我军建设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虽然也曾一度有过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的倾向，但都很快得到了纠正。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开展了批判“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斗争，使政治机关同军事机关、后勤机关的关系紧张起来。特别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极力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把政治工作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仅损害了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的团结，也严重损害了政治工作本身的威信。现实状况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政治机关的性质、职能、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摆正政治机关同其他机关的关系，发挥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

为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郑重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邓选》第119页）对我军政治机关的性质、职能和应负的责任，作了明确的阐述。

其一，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机关的性质，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因此，不能把政治机关同党的领导等同起来。政治机关、军事机关、后勤机关都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它们是分工合作的关系，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领导谁的问题。从而澄清了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模糊不清的一个重大问题，理顺了政治机关同其他机关的关系。

其二，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机关的职能和应负的责任。政治机关作为党的工作机关，必须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开展工作，必须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此来体现党的领导。政治机关除了抓好自身建设以外，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还负有指导、督促检查的责任，但决不是领导一

切，更不能冲击一切。

其三，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因此，政治工作不仅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做，而且还要依靠党团组织，依靠军事、后勤干部共同来做。明确了以上这几个问题，也就为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要坚决克服政治机关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机关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是政治机关的职能与作用发挥得不好、威信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体制改革时多次指出机关工作中的种种问题。

一是机关庞大、臃肿。“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邓选》第73页）这就影响了机关工作的效率。

二是官僚主义严重。他指出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询私行贿，贪赃在法，等等。”（《邓选》第287页）实际上，这种种官僚主义的现象造成了党同群众的严重脱离。

三是缺少必要的规章制度。“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邓选》第288页）严重影响了机关职能、作用的发挥。“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邓选》第288页）这就“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邓选》第288页），不仅机关缺乏活力和生气，而且助长官僚主义作风。

以上这些问题，如不能彻底解决，就不可能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因此，邓小平同志主张要从思想作风上，尤其是从根本制度上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坚决克服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

三、要切实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邓选》第118页）他还指出：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邓选》第59页）为此，他要求军队各级领导和机关，“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选》第118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这些要求，是恢复政治机关职能、作用和威信的重要保证。

四、要注重报高政治干部的素质

邓小平同志认为，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邓选》第119页）干部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他尤其强调：“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邓选》第119~120页）“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邓选》第120页）这也就是说，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也要靠政治干部、特别是政治机关干部以身作则。然而，政治机关的干部能否以身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素质，特别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邓小平同志对如何提高政治机关干部的素质也特别重视，他强调指出：“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邓选》第21页）“加强政治机关，特别要注意加强管干部的部门。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这就是说，政治机关的干部一定要注意质量，要选那些政治上强，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担任，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保证政治机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

第十一章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特点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同志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卓越的领导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建立了丰碑。他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的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和平时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指引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探讨和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于加强我军建设，实现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特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理论和思想，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科学的继承性

任何先进思想都是在继承前人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就是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优良传统的实质内容，是完整准确地从思想体系上加以继承的，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紧密结合，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在我军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邓小平同志本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军队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这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优良传统，具有一切无产阶级军队共有的革命性，又具有我军的独创性，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显著特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就是在继承这些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同志十分珍惜毛泽东建军思想及其所培育的优良传统，把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奠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呈现出显著的继承性。

1978年3月15日，邓小平同志为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在1978年6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明确提出，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在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以科学的态度和无畏的精神，为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建军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比如，继承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工作，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一再重申：不管怎么样，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

1981年，他主持制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充分肯定“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疯狂叫嚣否定党的政治工作，丑化党的政治工作的严重关头，是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发表的《悼伯承》一文中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但是邓小平同志继承的是生命线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不是“左”的路线影响下出现的那些形式主义、绝对化的错误做法。他以革命的胆略，坚决地反对林彪搞的所谓“突出政治”和“四人帮”搞的庸俗化、简单化、绝对化，把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他极为深刻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邓选》第116页）“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邓选》第114页）随着时代特点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政治工作才会有生命力。这就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继承和创新指明了方向，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军队建设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科学的继承、贯彻和运用。

又比如，继承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思想。

1951年1月，中央军委在给军事学院的赠词中，首次提出“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1952年、1953年，毛泽东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作了一系列深刻系统的阐述，强调全军“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9页）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我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建设世界上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邓小平同志根据上述正确思想，结合我军发展的历史，联系国际政治军事发展趋势和未来战争的特点，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正式提出并号召全军：“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选》第350页），而且阐明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的科学内涵，明确规定了“三化”建设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使我军新时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邓小平同志还在我军教育训练的方针、武器装备发展原则以及治军方法等多方面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科学地继承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继承的典范。

二、彻底的求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邓小平同志把彻底的求实性贯串于他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始终，在军队建设的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同志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立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和可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因而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邓小平同志

从现实出发，同极“左”思潮和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还在“四人帮”横行的1975年，他就无所畏惧地针对部队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英明决策。同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阐明了把消除“肿、散、骄、奢、惰”作为“军队整顿的任务”。提出了军队整顿和改革的方针、原则及具体步骤，并卓有成效地组织和领导了军队的组织、思想、管理、装备等方面的整顿，调整和加强了武装力量及领导体制，为取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系列的整顿使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又以彻底的求实精神，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军队老干部，使他们继续为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邓选》第32页）这种面对现实，敢于解决问题，知难而进，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革命气魄，铸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特色。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享誉中外的话，是邓小平彻底求实性的生动反映。这句寓意丰富广泛、表达形象、深刻的格言，把办实事求实效的思想和求实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务实的作风作了生动概括。正是出于这种彻底的求实性，他一贯要求各级组织和领导，“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调“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邓选》第113页），要在结合上下功夫。“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邓选》第97页）

纵观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许多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针原则，这些方针、原则是完全符合军队实际的，因而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三、高度的全局性

全局是事物各个要素、各个部分、各个发展阶段的总和。全局性是指从相互联系的事物整体来考虑、分析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总是立足于党和国家这个整体，总揽全局，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科技革命新潮流，阐述军队建设问题。这种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领导谋略，与他的继承性、求实性相结合，促成了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同志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选》第4页）他又说：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忽视更不能忘记国防现代化，否则三化得不到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从全局的高度提出和解决关于军队建设方向性的问题。他着眼于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着眼于战争与和平的科学分析，果断地提出了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必须从过去的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建设轨道的重大的略决策，解决了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和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问题；他站在国

家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高度，向我军提出“军队要忍耐”的要求，并阐明了军队建设要服从并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大局好起来了，经济大大发展了，我们的国防、军队建设就更能搞好；他从实现军队建设总目标出发，提出了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是实现我军建设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根本途径等等诸如此类的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都是从全局的高度来分析考虑的。建国以后，特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是比较难以处理的一对矛盾。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以全局为本，给予了创造性的分析和筹划。我们理解，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大局，是全局利益一致性的服从。也就是说从国家根本利益考虑，经济建设直接反映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军队建设直接反映了国家安全的需要，两者都反映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奠定了两者必须协调发展的基础。从国家发展利益考虑，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在保障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前提下积极行动，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这就要求军队建设在能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压缩规模，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军队发展的需要来说，经济建设要支持军队建设，使军队建设相应发展，而且要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加强军队建设，给军队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提供条件。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从全局的高度来分析、处理问题，正确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使军队建设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鲜明的创造性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我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新见解、新论点，从更深层次上解决了军队建设的方向性问题。他反复强调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多方面的，内容广博，思想深邃。其主要方面有：

第一，在干部问题上，严肃地提出了军队领导权要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非常重视解决干部问题，特别是领导班子问题。在那难忘的1975年，“四人帮”横行，周恩来同志病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迫害。在这祖国和军队危难之际，邓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置“复辟回潮”的污蔑于不顾，置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于度外，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整顿军队的各级领导班子，“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好。”（《邓选》第117页）抓领导班子的整顿，是军队建设的要害问题，关系到军队领导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必须保持纯洁性。要挑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不能让“四人帮”之流的人进入领导班子。此后，他反复强调，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在军队贯彻落实的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纪要指出：部队的领导权交给什么人，直接关系到军队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平

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极少数干部包括个别高级干部，经不起考验，政治立场严重动摇。这就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从政治上选拔培养干部，使枪杆子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总之军队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

第二，在工作重点问题上，果断地提出了要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及时地提出了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任务，把军队建设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了军队建设的道路问题，但邓小平同志丝毫也没有忽视革命化、正规化建设，正确处理了现代化与革命化、正规化的关系。

第三，在教育训练问题上，及时地提出了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早在1975年就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及时提出了“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示，扭转了教育训练的被取消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又多次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主要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他的这些指示，是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要指导原则。深刻揭示了和平时期加强军队建设，提高战斗力的客观规律。

第四，在培养人才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战略措施。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12月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问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队和地方都适用的两用人才，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新时期面临的新情况，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是一个创造。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有利于军地结合、文武结合、平战结合。既可为战时培养、储备大批军事人才，又可为“四化”培养、输送建设人才。它把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统一起来了。这是利国、利民、利军、利兵的大好事。

第五，在武器装备发展问题上，科学地提出了依据现有国力，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非常重视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他指出：“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邓选》第75页）改进我军的武器装备，必须从实际出发，即必须在现有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装备。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现有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依据未来作战对象、战争特点，提出的武器装备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非常科学的，是切合实际的。

第六，在依法治军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依据法规制度治理军队的思想。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我国我军几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多次强调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选》第293页）他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毛泽东以法治军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指导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军队法律和法规，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也重新修订和制定了一些条例和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制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科学的规范性，为我军从严治军、以法治军，进行正规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

此外，邓小平同志在许多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内容，在世界各国军队建设中都别具一格，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二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军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新时期中国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但有其科学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多年来，我军建设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已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使我军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我军政治建设得到了加强

加强政治建设，发挥政治优势，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是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继承了古田会议所确定的根本原则，结合军队建设新的实际，做到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加强的前提下改进，不断在实践上有所创造，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形成了加强政治建设的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显示出了巨大威力。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倡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总结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使我军政治建设重新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1989年12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又作出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重要文件，针对国际国内情况的新变化，进一步明确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及主要任务，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军在新形势、新条件、新任务面前抓紧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狠抓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干部、战士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全军同志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勇于实践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勇于开拓，奋发进取，艰苦奋斗，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浊流中立场坚定，巍然不动。从边防部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无私境界中，从百万官兵在精简整编时正确对待个人去留的高尚风格中，从部队顾全国家建设大局，自觉忍耐的思想觉悟中，一直到首都戒严部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中，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忠诚保卫者，其政治素质堪称世界一流。

邓小平同志在平息暴乱后，给予了我们军队高度评价：“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军六十二周年电视讲话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军在新时期仍然是一支政治合格、素质优良的英雄军队。

二、我军正规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同时是一支正规化的军队。众所周知，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军队问题成堆，大有积重难返之势。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首先向“肿”字开刀，短短几年间，进行了多次精简。随后，在1985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震惊世界的重大决策，全军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减少员额100万，合并大军区，组建集团军，建立预备役部队，使我军体制、编制趋于合理，正规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军队院校逐步实现了高、中、初三级培训体制，从而基本适应了军队建设的需要，使我军向现代条件下的合成组合迈进了一大步。

在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之后，依法、从严、全面建设军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军法、军制建设取得了明显成绩。近几年我军陆续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军事训练条例》；1990年6月中央军委重新修定和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共同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1991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从而使我军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基本达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

三、我军军事训练有新发展

军事训练是部队工作的中心，是实现人和武器结合的桥梁，是军队在和平时期增强战斗力的主要手段。在邓小平同志“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指引下，全军从现代战争需要出发，通过对训练内容、方法、保障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形成了从单兵训练到战役训练的各个不同层次训练的内容体系；规范了不同层次的训练程序，检验性、对抗性演习开始普及，并逐渐由战术层次向战役层次发展，激光、电子模拟实兵对抗训练器材由地面发展到空中和海上，电化教学得到较广泛的运用；条令、条例、训练大纲、训练教材、训练法规、训练制度和各种考评标准逐步配套。陆军部队探索了一条符合实战的训练内容体系和方法，战役和合同战术训练质量有了新的提高；海军部队合格舰艇长成倍地增长，远海多兵种合同训练已达到相当水平；空军部队甲类战斗团大量增加，四种气象飞行员和指挥人员比10年前增长了近一倍，合同战术训练水平已大大提高。总之，我军训练已摆脱了低层次的循环，向高层次训练迈出了一大步。全军各部队正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组织了高、中级干部的战役集训和演习，提高了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加强了院校训练和以干部为重点的训练，经过严格训练和一定的实战训练，已有效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十多年来我军坚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英勇地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继解放战争、赴朝参战后，新时期我军

又取得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及边、海防武装冲突的胜利。特别是在去年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我军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英勇无畏，以生命和鲜血又一次挫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人民共和国的颠覆，充分显示我军是一支训练有素，军政素质都过硬的军队。

四、我军武器装备水平有一定提高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确立了正确的武器装备发展方针和原则，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研制和装备了一批新型武器。在突破尖端技术方面，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和核潜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三个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其中，战略导弹的技术有新的突破，形成了中程、远程、洲际等不同射程，空中、地面和水下等多种发射方式的战略核反击力量；常规武器的研制也有较大发展，多用途武装直升机、舰对空导弹的研制成功填补了空白；一批新型电子、通信、工程、防化器材陆续装备部队；长途地下电缆通信网和卫星通信相继投入使用。新研制的武器装备还应用了当代的一些高技术成果，缩短了与先进国家军队在武器装备水平上的差距。

五、我军后勤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后勤现代化建设。他明确指出：“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邓选》第115页）的确，现代战争对后勤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年来，我军后勤工作，在国家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坚持勤俭建军的原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节约，开源节流，管好用好国家提供的财力物力，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更好地为军队建设服务，对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实践意义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为我军建设总体规划的制定提供了许多新理论，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的客观规律，从而加快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指南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不仅要担负起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重任，而且还要起到遏制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因此，必须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是新时期我军发展的根本方向。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明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第一，规定了我军建设应具备的特色。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16、81 页) 我军建设一是应具备显著的政治特色, 也称政治优势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军政治工作独具特色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 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发展趋势。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如何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当今之所以要坚持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 还在于我军政治工作需要根据新时期特点和任务, 不断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和改进, 使之更加完善和科学。我军只有继承和发扬这一政治特色, 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政治教育的主体, 保证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 才能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 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舍此, 军队建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军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就会失去精神动力。二是应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要有新时代的特色, 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当今时代的主要特点之一, 是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 促进了军队建设的巨大变化, 使部队的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军事思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研制新的武器装备, 研究科学的体制、编制和先进的军事思想, 加强军队建设, 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我军建设当然不会象以往美苏那样搞武器装备竞赛, 但应该根据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基础、我军现有的武器装备和未来的作战形式等具体情况,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抓紧研究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军事思想, 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 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更新我军的武器装备, 加强我军建设, 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革命军队。三是应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在研究和加强军队建设中, 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我国诸方面的实际情况、需要和可能, 力求使军队“三化”建设同中国各方面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使军队的每“一化”中, 都深深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 体现和反映中国国情的要求。我国是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行的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建设上走的是自己的路, 党中央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 根据我国地大、人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 以及其他客观情况, 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提高生产力, 加速我国四化建设。我们军队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大胆改革, 走开拓创新之路, 把我军建成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革命军队。

第二, 规定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是在总体布局上贯彻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原则。精干的常备军, 就是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装备精良、编制科学、训练有素、指挥灵敏、快速反应能力和实战能力很强的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和其他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强大的后备力量, 就是拥有一支数量适当、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装备齐全、机构健全、动员快速的民兵、预备役后备军。这两者的结合, 就是对常备军和后备力量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体制、发展规模等, 通过周密筹划、科学组合、积极兼容、长远建设, 形成常备军和后备力量一体的现代国防整体力量。把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原则, 在当前我军建设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通过精简整编、体制改革, 常备军已经进一步精干化了;

通过后备力量体制改革，使民兵与后备役制度相结合，明显地加强了后备力量建设，组建了一大批预备役师、团部队，并纳入了统一的编制序列，形成了整体力量。二是在体制编制建设上贯彻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的原则。体制编制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现代战争对军队体制编制方面的根本要求就是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这也是当前各国军队建设的一种普遍趋势，所以我军在体制编制建设上应该遵循这个基本原则。三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贯彻自力更生、量力而行的原则。武器装备建设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军的装备现代化建设要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就必须确定正确的指导原则。自力更生，量力而行符合我国的客观情况。这样做可以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四是在工作安排上贯彻把教育训练作为经常性中心工作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主要依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一定要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这个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全军各部队在工作安排上，坚定始终把教育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并使它成为指导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五是在后勤建设上应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后勤工作很重要。现代战争对后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没有坚强的后勤保障，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六是在院校建设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把院校的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上来，要使院校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规定了院校教育改革，要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体制，进一步完善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力争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办好一定数量的高水平院校，培养出大批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人才。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还规定了其他方面一系列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我军建设的实践证明，这些原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仅要在理论上给予充分肯定，而且要在实践中自觉地贯彻和遵循。

二、我军改革的纲领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指引我军改革稳步健康进行的纲领，是军队改革的基本理论。

十多年来，我军在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我军的改革大体可分两个阶段。

1985年前，以精简“消肿”为重点，以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为基本标志；1985年后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为标志，以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改革使我军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就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地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对军队的改革有着一系列论述，贯穿着一些基本思想。这些基本思想是军队改革的纲领。

第一，军队的改革要与国家的改革协调一致地发展。军队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受国家的经济、政治所制约，国家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革，必将对军队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国家的经济、政

治体制的改革，也必然要求军队进行改革。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改革”。这就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技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军事领域。这几年来，我军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都紧紧地与国家整体改革相联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改革体制编制、减少员额等等，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科学判断基础上的、使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更好地协调发展的需要。军队后勤供应体制和供应方式的改革，国防科技工业和国防工业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方向转化等，既是军队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国家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也必然对军队的改革起推动和制约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军队改革，是在整个国家改革的大形势之下进行的。军队的改革有赖于国家的改革，要服从和顺应国家的改革。如在确定军队改革总体目标上，邓小平同志考虑了军队在实现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指出经济建设是三大任务的核心，军队要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世界各国在战后恢复经济时，一般都要裁减军队，在发展经济或进行经济改革时，也都必然要控制军队的规模和军备水平，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要求“军队要忍耐”，要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但是他又指出，军队还担负着统一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军队建设。总之，军队的改革必须与整个国家改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前进的目标更清晰，才能使军队的改革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和凝聚力。

第二，军队改革要与军队建设的自身规律相适应。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军队改革除了必须与国家的改革协调一致地发展之外，军队改革要与军队建设的自身规律相适应，要从军队的实际出发，从军队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使改革得以深化。邓小平等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军队的改革必须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发挥群众的改革创新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军队的改革与地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的和地方是一致的，可以吸取地方有关的经验，但是军队改革有许多特殊之点，它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应按军队的规律进行改革。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军队有军队的特点”，不能照搬地方。如地方搞权力下放、“松绑”、干部招聘等，军队就不能搞，因为军队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军队担负着特殊使命，军队在改革中一定要持慎重态度，改革的措施和步骤必须有利于安定军心，有利于部队的高度稳定，有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军队的稳定又反过来保证全国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军队的改革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军队改革是当今世界军事领域的共同趋势，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在进行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列宁曾指出，现代水平的武器装备，对于腐朽透顶的沙皇俄国军队来说，不过是一个“华丽的坟墓”。军队的使用价值主要在于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因此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要以现代化为中心，符合时代的需求。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时代的目光和标准，来审视和要求军队的各项改革。对于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改革和建设项目，应当保证重点，尽一切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象五十年代决定搞“两弹一星”那样，尽管

当时经济十分困难，但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仍坚决上马。试想，倘若没有那时的深谋远虑和果敢决断，现今我国国防的现代化水平将更加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如果只将自己的现在与自己的过去比，为自我的眼下成就而陶醉，那就永远落后于他人；只有瞄准世界最先进国家军队的水平，着眼于下个世纪的需要，强烈追求时代发展横轴上的驱动点，才能使自己在赶超中步入世界第一流强师劲旅之行列。

改革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理论，对我党、我国、我军的改革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央军委曾指出，我国经济建设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军队建设也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要善于站在世界舞台上观察问题，善于学习外国好的东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习和引进外国军队的先进东西。但是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军队的建设与改革遵照邓小平同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我军现代化水平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差距，看到了我们武器装备、战争手段、指挥系统的落后状况。实行开放，面向世界，一下子给我们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问题、许多经验、许多教训，我们应清醒地总结、探索前进的方向，少走弯路，多走捷径，适应时代的要求，加速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军队的改革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已经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并在军队建设方面继续深入展开。但应该看到，我军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主要是由我军的历史和环境决定的。目前我军现代化水平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希望通过改革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只有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总体构想，沿着其指引的方向，进行长期地、脚踏实地的工作，才能也一定能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任务。

后 记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概论》是全军“七五”规划重点科研课题。

1989年初课题下达后，海军指挥学院党委和首长、学院训练部领导十分重视，组织训练部第二政治教研室六位同志成立课题组，进行专门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正式定稿出版。

本书由秦耀祁任主编，李铁民、赵克舜任副主编。参加撰写的有：李铁民，第一、八章；史滇生，第二章；赵克舜，第三、七章；秦耀祁，第四、十一章；许遗锁，第五、六章；党良，第九、十章。全书由秦耀祁、李铁民、赵克舜统修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受到军委首长、海军党委的亲切关怀，受到海军机关尤其是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受到了我院李鼎文院长、康富泉政委以及部领导的直接而具体的指导；特别荣幸的是，军委刘华清副主席在百忙中为本书题词，海军魏金山政委为之作序。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先后组织初审和终审。一次在南京，由海军指挥学院组织，邀请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南京政治学院以及院内的专家、教授李孝民、徐执提、乔崖、刘声愕、吴树熙、赵克增、颜家桃、李宁等进行的初审；一次在北京，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组织，邀请军委办公厅、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以及海军的专家、教授徐长友、雷渊深、刘先廷、刘继贤、胡光正、王江琦、苗中琴、杜果、辛义昌等进行的终审。在评审中，专家、教授对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本书还大量参考了军内外有关的专著和研究成果，使我们得益不少，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书由于受编著者水平和资料占有量所限，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只是初步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作 者

1991年5月于南京

